

斯大林全集

第八卷

斯大林全集

第八卷

斯大林全集

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本定價三萬六千元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上 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 253,000 字

印數 1—38,000 冊

書號 1632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第八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包括約·維·斯大林同志從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的著作。

一九二六年是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總方針而展開鬥爭的第一年。

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和『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兩篇著作中，約·維·斯大林同志揭發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對列寧主義基礎的敵意歪曲，捍衛了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揭穿了『新反對派』把不相信社會主義能在蘇聯勝利的思想散佈到黨內來的企圖。

約·維·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和關於這一報告的結論，捍衛了布爾什維克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揭露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投降思想和破壞、分裂活動。

約·維·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著作發展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學說，論證了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國際意義，擬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實踐任務，規定了實現黨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總方針的具體道路和方法。

在『關於英國罷工和波蘭事件』、『關於英俄統一委員會』、『關於反對右傾和「極左」傾的鬥爭』、『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德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和其他著作中，約·維·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了必須爲工人階級的統一、爲反對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爲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危險而進行頑強的徹底的鬥爭，揭露了托洛茨基的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運動的冒險理論，指出了外國共產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反機會主義鬥爭的道路和方法。

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中，約·維·斯大林同志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它的性質和方向。

第八卷中第一次發表的文件有『關於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農民』、『關於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法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關於英俄委員會』的演說、『給斯列普柯夫的信』、『關於緩和黨內鬥爭的辦法』，約·維·斯大林同志『致美國工人黨中央機關報『工人日報』編輯部』的信。約·維·斯大林同志『致卡岡諾維奇同志和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的信是全文發表的。

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

目 錄

第八卷說明·····	一一二
關於反對右傾和『極左』傾的鬥爭（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共產國際 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兩次演說）·····	三一〇
『列寧主義問題』文集初版序言·····	一一三
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三一八
一 列寧主義的定義·····	二三
二 列寧主義的主要問題·····	一六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一八
四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三二
五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	三三
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	五九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奮鬥·····	七四

關於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農民（答波爾特涅夫、葉弗列莫夫、伊甫列夫三同志）……………九一—九二

關於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答坡柯也夫同志）……………九三—九四

紀念柯托夫斯基同志……………九五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法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九六—一〇一

（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一〇三

慶祝國際共產主義婦女節……………一〇三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德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一〇三—一〇八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一〇三—一〇八

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給列寧格勒……………一〇九—一四

黨組織積極分子做的關於聯共（布）中央全會工作的報告）……………一〇九—一四

一 新經濟政策的兩個時期……………一一〇

二 工業化方針……………一一三

三 社會主義積累問題……………一一三

四 積累的正當利用。節約制度……………一二九

五 要造就工業建設幹部……………一二五

六 要提高工人階級的積極性……………一二七

七 要鞏固工農聯盟	一六
八 要實行黨內民主	一〇
九 要保護黨的統一	三二
一〇 結論	三三
致卡岡諾維奇同志和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	三三
關於英國罷工和波蘭事件(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在梯弗里斯鐵路總工廠工人大會上的報告)	四〇
英國為什麼發生罷工?	四〇
英國總罷工為什麼失敗了?	四三
總罷工的教訓	四四
幾個結論	四八
關於波蘭最近的事件	五〇
對梯弗里斯鐵路總工廠工人歡迎詞的答詞(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	五一
關於英俄統一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五二
費·捷爾任斯基(悼費·捷爾任斯基)	五三

關於英俄委員會（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演說）	一五——一三
---------------------------------------	--------

致美國工人黨中央機關報『工人日報』編輯部	一三一——一八
----------------------	---------

給斯列普柯夫的信	一八——一六
----------	--------

關於緩和黨內鬥爭的辦法（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演說）	一八——一八
--	--------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提交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討論並經代表會議通過和聯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綱）	一九——二五
---	--------

一 『新反對派』在我國革命性質和前途的基本問題上轉向托洛茨基主義	二五
----------------------------------	----

二 反對派聯盟的實踐綱領	二七
--------------	----

三 反對派聯盟的『革命』言論和機會主義行為	二九
-----------------------	----

四 結論	三〇
------	----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三六——四〇
--	--------

一 反對派聯盟發展的幾個階段	四六
----------------	----

一、第一階段	四七
--------	----

二、第二階段·····	二〇八
三、第三階段·····	二一〇
四、第四階段·····	二一一
五、列寧和黨內聯盟的問題·····	二一三
六、反對派聯盟的瓦解過程·····	二一四
七、反對派聯盟指望什麼？·····	二一五
二 反對派聯盟的基本錯誤·····	二一七
一、幾點預先的說明·····	二一八
二、列寧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	二三三
三、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	二三五
四、「新反對派」轉向托洛茨基主義·····	二三八
五、托洛茨基的支吾搪塞。斯米爾加·拉狄克·····	二四二
六、我國建設前途問題的決定意義·····	二四八
七、反對派聯盟的政治前途·····	二五〇
三 反對派聯盟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	二五四
四 幾個結論·····	二六〇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二五—三〇

一 幾個一般性的問題……………二五至

一、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二六至

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幾點意見……………二七四

三、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二七九

二 加米涅夫在爲托洛茨基打掃道路……………二八三

三 不可思議的糊塗想法或季諾維也夫論革命性和國際主義……………二九一

四 托洛茨基偽造列寧主義……………二九六

一、托洛茨基的戲法或『不斷革命』的問題……………二九八

二、玩弄引文或托洛茨基偽造列寧主義……………三〇七

三、『小事』和笑話……………三二三

五 反對派的實踐綱領。黨的要求……………三三五

六 總結……………三八

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

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三二—三三四

一 中國革命的性質……………三三一

二 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	三三
三 中國的革命軍隊	三五
四 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	三七
五 中國的農民問題	三九
六 中國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權	三三
七 中國的青年問題	三四
八 幾個結論	三四
註釋	三五—三四
年表（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	三四—三四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

關於反對右傾和『極左』傾的鬥爭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兩次演說)

一

我認爲漢遜和路特·費舍所持的觀點是不正確的，他們要求在任何條件下隨時隨地都要所謂公平地用同等的打擊力量去反對右派和『極左派』。這種在任何條件下、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公平地和均等地打擊右派和『極左派』的觀點是幼稚的觀點。政治家是不能這樣提問題的。對於跟右派和『極左派』作鬥爭的問題，我們不應當從公平的觀點來考察，而應當從政治情況的要求、從每個時候黨的政治要求的觀點來考察。爲什麼目前法國共產黨迫切的突擊任務是和右派作鬥爭，德國共產黨的迫切任務却是和『極左派』作鬥爭呢？因爲法國共產黨和德國共產黨的情況不一樣。因爲目前這兩個黨的政治要求不同。

德國不久以前才度過了嚴重的革命危機⁽¹⁾，當時黨是以正面攻擊的方法進行鬥爭的。目前德國

共產黨正處在積聚力量和組織羣衆去迎接未來決戰的時期。爲了在新的環境中達到舊的目的，正面攻擊的方法現在已經不適用了。現在要求德國共產黨改用迂迴的方法，以便掌握德國工人階級的多數。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出現一個「極左派」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個派別像小學生一樣重複着舊的口號，它沒有能够適應或不想適應那種需要新的工作方法的新的鬥爭條件。於是「極左派」的政策就阻礙了黨去適應新的鬥爭條件，妨礙了黨爲自己開闢走向德國無產階級廣大羣衆的道路。德國共產黨如果粉碎「極左派」的反抗，那末它就會走上廣闊的大道，爭得工人階級的多數，德國共產黨如果不這樣做，那末它就會把目前的危機變成慢性的置黨於死地的危機。因此，德國共產黨的迫切任務就是和黨內的「極左派」作鬥爭。

在法國却是另外一種情況。那裏還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革命危機。那裏的鬥爭是在合法的範圍內用完全合法或者幾乎完全合法的鬥爭方法進行的。但是法國現在已經顯露出危機，我指的是摩洛哥戰爭、敘利亞戰爭和法國財政困難^(三)。這個危機究竟嚴重到怎樣的程度還很難說，但它畢竟是一個危機，它要求黨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鬥爭條件結合起來，要求黨最高度的布爾什維克化。在這種情況下，法國黨內出現一個集團（我指的是右派）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個集團沒有能够適應或不想適應新的鬥爭條件，它仍然堅持舊的鬥爭方法，把舊的鬥爭方法當做唯一正確的方法。這種情況自然不能不阻礙法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因此，法國共產黨當前的危險是右傾的危險。因此，法國共產黨的突擊任務就是和右傾危險作鬥爭。

從聯共（布）歷史中舉幾個例子來說吧。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我們黨內也曾形成一個叫做「召回派」的「極左派」，它沒有能够適應或不想適應新的鬥爭條件，它不贊成利用合法機會（例如杜馬、工人俱樂部、保險基金會等等）的方法。大家知道，列寧對這個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而黨是在戰勝了這個集團以後才走上正確的道路的。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我們這裏又發生過同樣的情況，當時「極左派」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大家知道，這個集團也被以列寧為首的我們黨打垮了。

所有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說明跟右派和「極左派」作鬥爭的問題不應當抽象地而應當具體地根據政治情況來提出。

法國同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出關於反對自己黨內右派分子的決議，而德國同志提出關於反對「極左派」的決議，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偶然的。誰害什麼病，誰就老談什麼病。

因此，公平地和同等地打擊右派和「極左派」的觀點是毫無根據的。

正因為如此，我建議從關於德國「極左派」的決議草案中把那句話說到在德國共產黨內必須同樣強調對右派和「極左派」作鬥爭的話刪去。我建議刪去這句話的理由，和從關於法國共產黨內右派的決議中把那句話強調反對「極左派」的話刪去的理由是一樣的。至於隨時隨地都應當同右派和「極左派」作鬥爭，那是絕對正確的。可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而在於目前在法國應當強調什麼問題，在德國又應當強調什麼問題。我認為在法國共產黨內應當強調和右派作鬥爭的問題，因為這是當前政治情況所要求的；在德國共產黨內却應當強調和「極左派」作鬥爭的問題，因為這是德國共產黨當前政治情

況所要求的。

假使用剛才講過的觀點來考察，那末，德國共產黨內的中間集團即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的現狀是怎樣的呢？依我看來，這個集團是在用外交手腕替蕭列姆的「極左派」打掩護。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雖然沒有公開表示同情蕭列姆集團，却竭盡全力去削弱黨對蕭列姆集團的打擊。這樣，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就阻礙着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去克服並消除德國共產黨內「極左派」的偏見。因此，德國共產黨必須和這個集團即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作堅決的鬥爭。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如果被打垮，那末黨就有可能在和蕭列姆集團的鬥爭中克服目前的危機；德國共產黨如果上了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的外交手腕的當，那末鬥爭的勝利就將屬於蕭列姆。

二

我覺得漢遜在黨內思想鬥爭的問題上是在宣揚某種完全不適合於共產黨的價值道德。看來他並不反對思想鬥爭，但是他想以絲毫不降低反對派領袖威信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鬥爭。我必須說，天下沒有這樣的鬥爭。我必須說，誰認為只有在絲毫不損害領袖威信的條件下才能進行鬥爭，誰就是實際上否認黨內可以進行任何思想鬥爭。我們是否必須揭露黨的某些領導者的錯誤呢？我們是否必須把這些錯誤公開出來，以便能夠用領導者的錯誤來教育黨員羣衆呢？我以為是必須的。我以為別的糾正

錯誤的方法是沒有的。我以為掩飾錯誤的方法不是我們的方法。由此可見，黨內的鬥爭和糾正錯誤不在某種程度上損害某些領袖的威信是不成的。這也許是可惜的，但是沒有別的辦法，因為我們沒有力量反對必然性。

漢遜問：我們是否必須一般地既反對「極左派」又反對右派呢？自然是必須的。這個問題我們老早就解決了。爭論的並不是這一點。爭論的是：在目前處在不同狀況下的兩個不同的黨內，即法國黨和德國黨內，我們現在必須強調對哪一種危險作鬥爭的問題。法國同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出關於反對右派的決議，德國同志却提出關於反對「極左派」的決議，這是偶然的嗎？也許法國同志強調和右派作鬥爭的問題是錯了吧？那末，為什麼漢遜不打算向主席團提出關於和法國「極左派」作鬥爭的對案呢？也許德國同志強調和「極左派」作鬥爭的問題是錯了吧？那末，為什麼漢遜和路特·費舍不打算向主席團提出關於強調和右派作鬥爭的問題的對案呢？問題在哪裏呢？問題在於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般地同右派和「極左派」作鬥爭的抽象問題，而是目前德國黨的迫切任務的具體問題。德國共產黨的迫切任務是克服「極左」傾的危險，正像法國共產黨的迫切任務是克服右傾的危險一樣。

例如英國、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在本國工會運動中已經有了真正據點，已經為自己開闢了走向廣大工人階級羣衆的道路，並且已經開始取得工人階級羣衆的信任，即使不是大多數也是相當多的工人階級羣衆的信任，可是德國在這方面還很弱，這種衆所周知的情況是由於什麼呢？這

種情況首先是由於德國共產黨內的「極左派」還很強，他們對工會、對統一戰綫的口號，對掌握工會的口號還抱着懷疑的態度。大家知道，不久以前「極左派」還堅持「退出工會」的口號。大家知道，這個反無產階級口號的餘毒，直到今天在「極左派」中間還沒有完全消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德國共產黨能夠迅速而堅決地掃除「極左派」在羣衆工作方法問題上的偏見，徹底粉碎蕭列姆集團，從思想上粉碎它；或者是德國共產黨不能做到這一點，那末黨內危機就會朝着極危險的方向發展。

有人說，在「極左派」那裏有誠實的革命工人，不能也不應當把他們推開。這是完全對的。我們並沒有提出要把他們推開。因此，在我們的決議草案中並沒有提出關於把任何一個「極左派」分子，尤其是工人，推開或開除出黨的任何建議。但是，怎樣才能把這些工人提高到列寧黨的覺悟水平呢？怎樣才能使這些受了「極左派」領袖的錯誤和偏見影響的工人走出迷途呢？這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從政治上否認「極左派」的領袖，揭露「極左派」的錯誤，因為這種錯誤把誠實的革命工人弄得糊里糊塗並阻礙他們走上廣闊的大道。在黨內思想鬥爭和羣衆政治教育的問題上，我們能不能容許玩弄陳腐的外交手腕和掩飾錯誤呢？不，不能容許。要是容許，就是欺騙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出路在哪裏呢？出路只有一條：揭露「極左派」領袖的錯誤，從而幫助誠實的革命工人走上正確的道路。

有人說，打擊「極左派」會引起別人的責難，說德國共產黨向右轉了。同志們，這都是無謂的話。

一九〇八年，列寧在黨的全俄代表會議^(三)上對俄國的「極左派」作了鬥爭並徹底打垮了他們，當時我們這裏也有人責難列寧，說他右傾，說他向右轉。但是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列寧當時是正確的，他的觀

點是唯一革命的觀點，而當時以『革命』詞藻自炫的俄國『極左派』實際上却是機會主義者。

不應當忘記，右派和『極左派』實際上是雙生子，所以他們都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不同的只是右派並不經常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左派却經常用『革命』的詞藻掩蓋他們的機會主義。我們不能根據某些造謠分子或庸人可能說我們些什麼話來決定自己的政策。我們應當堅定地滿懷信心地走自己的道路，不管那些遊手好閒的人還會造我們什麼樣的謠言。俄羅斯人有一句很好的諺語：『狗叫狗的，商隊走商隊的。』我們必須記住這句諺語，因為我們還會常常用得着它。

路特·費舍說，今後德國共產黨內會出現右傾的危險，它將成為黨的迫切問題。這完全可能，甚至一定會如此。但是，由此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路特·費舍由此得出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結論：對目前已經成為實際危險的德國『極左派』的打擊應當減輕，而對將來可能造成嚴重危險的右派的打擊現在就應當加重。不難了解，這樣提問題是有些可笑的，而且是根本不對的。只有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這樣目光短淺、玩弄外交手腕的集團才會落到如此可笑的地步；這個集團力圖削弱黨對『極左派』的鬥爭，從而搭救蕭列姆集團使它免受打擊。路特·費舍的建議的唯一意義就在這裏。我想，在法國也一定有這種玩弄外交手腕的、力圖以花言巧語來掩飾法國共產黨內右派分子的中間集團。因此，不論在德國黨內還是在法國黨內，和這些玩弄外交手腕的中間集團作鬥爭都是當前的迫切任務。

路特·費舍硬說通過反對德國『極左派』的決議只會使黨內情況更加緊張。我認為路特·費舍是要使德國共產黨內的危機延續下去，使它成為長期的危機，使它變成慢性的危機。因此，不管路特·

費舍怎樣玩弄外交手腕，不管她怎樣用花言巧語來談論黨內和平，我們是不能走她那條道路的。

同志們，我以爲德國共產黨內已經鍛鍊出一批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以爲目前德國共產黨的工人核心正是德國共產黨所必需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支持這個核心並幫助它和各種傾向首先和『極左』傾向作鬥爭，——這就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任務。因此，我們應當通過反對德國『極左派』的決議。

載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四十號

『列寧主義問題』文集初版序言^{〔五〕}

『論列寧主義基礎』^{〔六〕}這本小冊子應該看做本文集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這本小冊子在將近兩年前即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次出版，現在編入本文集，是第二次出版。這兩年來發生了許多事件：黨經過了兩次爭論，出版了許多關於列寧主義的小冊子和必要的讀物，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實際問題也提到日程上來了。很明顯，兩年來發生的新問題以及這本小冊子出版以後兩次爭論的結果都不可能包括在這本小冊子內。同樣很明顯，我們建設中的具體問題（新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中農問題等）也不是這本『扼要敘述列寧主義基礎』的小冊子所能完全闡明的。諸如此類的問題只能在著者後來寫的一些小冊子（『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七〕}、『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工作總結』^{〔八〕}、『問題和答覆』^{〔九〕}等等）中加以闡明，這些小冊子現已編入本文集，它們和初版的小冊子『論列寧主義基礎』中所闡述的基本原理有機地聯系着。由於上述情況，出版這一部統一的完整的論述列寧主義問題的文集是十分必要的。

最近一次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爭論，總結了最近期間即從第十三次到第十四次代表大

會這一期間黨在思想方面和建設方面的工作。同時，這次爭論在某種程度上審查了「新反對派」當時提出的論點。試問：這次審查的結果怎樣呢？

按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刊印

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獻給

聯共（布）列寧格勒組織

約·斯大林

一 列寧主義的定義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那本小冊子裏所下的衆所周知的列寧主義定義，看來已經得到公認了。這個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10）

這個定義是否正確呢？

我以爲是正確的。其所以正確，第一在於它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確定列寧主義是帝

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正和某些批評列寧的人相反，他們錯誤地認為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產生的。其所以正確，第二在於它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的國際性質，這正和社會民主黨人相反，他們認為列寧主義只適用於俄國一國的環境。其所以正確，第三在於它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和馬克思學說的有機聯系，確定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正和某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相反，他們認為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的發展，而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恢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實際情況中的應用。

所有這些似乎都不需要特別解釋了。

然而我們黨內竟有人認為必須給列寧主義下一個與此稍稍不同的定義。例如季諾維也夫認為：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在一個農民佔多數的國家裏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季諾維也夫所強調的幾個字有什麼意義呢？把俄國的落後性，把它的農民性放到列寧主義的定義中去，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把列寧主義從國際無產階級的學說變成俄國特殊情況的產物。

這就是為鮑威爾和考茨基效勞，因為鮑威爾和考茨基否認列寧主義能適用於其他資本主義較為發達的國家。

不用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有極重要的意義，我們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但是這個事實對於確定

列寧主義基礎能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根據俄國的條件、專爲俄國制定的，而不是根據帝國主義的條件、爲一般帝國主義國家制定的嗎？難道列寧的著作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國家和革命』(2)、『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3)、『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4)等等只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都有有意義的嗎？難道列寧主義不是各國革命運動經驗的概括嗎？難道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不是對於各國無產階級政黨都適用和必要的嗎？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供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〇頁)，難道不對嗎？列寧說『蘇維埃政權和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具有國際意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頁)，難道不對嗎？又如下面一段列寧的話難道說得不對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這種局限於一個國家範圍內的列寧主義定義怎能和國際主義相容呢？

二 列寧主義的主要問題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那本小冊子裏說：

『有人以爲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以爲列寧主義的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 and 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的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等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爲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派生的問題。』〔五〕

這個論點是否正確呢？

我以爲是正確的。這個論點完全是從列寧主義定義中得出來的。的確，既然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列寧主義的主要問題當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就是闡明這個問題，就是論證這個問題並把它具體化。

可是，看來季諾維也夫是不同意這個論點的。他在『紀念列寧』一文裏說：

『我已經說過，農民的作用問題是布爾什維主義即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①

可見季諾維也夫的這個論點完全是從他給列寧主義所下的不正確的定義中得出來的。因此，這

個論點也和他所下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內容』（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頁），這個論點是否正確呢？無疑是正確的。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這個論點是否正確呢？我以為是正確的。那末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應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的出發點，列寧主義的根基，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帝國主義問題，帝國主義發展的躍進性問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無產階級國家問題，這個國家的蘇維埃形式問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問題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途徑問題，——這些問題正是列寧都給闡明了的，這難道不對嗎？正是這些問題構成了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基礎和根基，這難道不對嗎？不闡明這些基本問題，就不可能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上去闡明農民問題，這難道不對嗎？

不用說，列寧是個精通農民問題的人。不用說，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有極重要的意義，並且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的組成部分。可是，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不擺着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就不會有無產階級的同盟者這個派生問題，即農民問題，這難道不明白嗎？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不擺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個實踐問題，就不會有和農民聯盟的問題，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難道不明白嗎？

如果列寧不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為基礎，並且不顧這個基礎而站在這個基礎以外來闡明農民問題，那他就不會是一個最偉大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像他確實是的那樣，而只會是一個平凡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那些庸俗文人時常把他描繪的那樣。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中的主要問題，那末，列寧主義對於那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對於那些非農民的國家，就是不適用的，就是不必要的；

或者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中的主要問題，那末，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的國際學說，對於世界各國——其中也包括那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是適用而且是必要的學說。

這裏必須加以選擇。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那本小冊子裏認為「不斷革命論」是對農民作用估計過低的「理論」。那裏面說：

「可見列寧和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作鬥爭並不是由於不間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主張不間斷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過低估計了農民這一無產階級最大後備力量的作用。」（二）

對俄國『不斷論者』的這個評語直到最近都是大家所公認的。然而這個評語一般說來雖然正確，但還不能認為是詳盡無遺的。一方面是一九二四年的爭論，另一方面是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分析，都已表明俄國『不斷論者』的錯誤不僅在於他們過低估計農民的作用，而且在於他們過低估計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因此，我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那本小冊子裏已擴充了這個評語，並且代之以另一個比較完全的評語。在那本小冊子裏是這樣說的：

『直到現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的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具有革命能力。現在為了公允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須補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有力量和有本領。』（三）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過去反對或者現在反對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提出的那個沒有帶引號的不斷革命的思想（四）。恰恰相反，列寧是唯一正確了解了並發展了不斷革命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和『不斷論者』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不斷論者』曲解了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思想，把它變成了毫無生氣的書本上的玄談，列寧則接受了原來的不斷革命思想並把它變成自己的革命理論基礎之一。必須記着，列寧遠在一九〇五年就已提出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

義革命的思想，就是馬克思不斷革命論的一個具體表現形式。請看列寧遠在一九〇五年關於這一點所寫的一段話：

『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並且恰恰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間斷的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

我們決不陷於冒險主義，決不違背自己的科學良心，決不追求廉價的聲譽，我們能夠說的而且要說的只有一點：我們將用全力幫助全體農民去實現民主革命，從而使我們無產階級的黨更容易儘快地過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務即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一三頁至第二一四頁）

再看，經過了十六年，即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列寧對於這一問題是怎樣寫的：

『考茨基之流、希法亭之流、馬爾托夫之流、切爾諾夫之流、希爾奎特之流、龍格之流、麥克唐納之流、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國際」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英雄們，不能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關係。前一革命轉變為後一革命。後一革命順便解決前一革命的問題。後一革命鞏固前一革命的事業。鬥爭，而且只有鬥爭，才能決定後一革命能夠超過

前一革命到什麼程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十二頁）

請特別注意前一段話，這一段話是從列寧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一文中引來的。我着重指出這一點是要一些人注意，因為他們直到現在還硬說列寧只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才有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即不斷革命的思想。這一段話毫無疑義地說明這些人是大大錯而特錯了。

四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的特徵和資產階級革命有什麼不同呢？

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可以歸結為下列主要的五點：

（一）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較為現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已經具備時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在公開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並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沒有具備或幾乎沒有具備時開始發生的。

（二）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奪取政權，並使這政權適合於已有的資產階級的經濟；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三）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却只是革命的開

始，並且政權是用作改造舊經濟和組織新經濟的槓桿。

(四)資產階級革命只限於以一個剝削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集團去執掌政權，所以它無須摧毀舊國家機器；無產階級革命却要一切剝削集團都從政權上推下去，並使全體被剝削的勞動羣衆的領袖即無產階級去執掌政權，所以它不能不摧毀舊的國家機器而代之以新的國家機器。

(五)資產階級革命不能把千百萬被剝削的勞動羣衆稍微長期地團結在資產階級的周圍，正因為這些羣衆是被剝削的勞動者；而無產階級革命要完成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並建成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這個基本任務，却能够而且必須使被剝削的勞動羣衆跟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正因為這些羣衆是被剝削的勞動者。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列寧說：『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就在於：對於從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還在舊制度內部，新的經濟組織就逐漸形成起來，它逐漸改變着封建社會的一切方面。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掃除、擯棄並破壞舊社會的一切桎梏。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了這個任務，也就是完成了它所應做的一切：它加強資本主義的發展。』

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後，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愈困難。這裏除破壞任務以外，還加上一些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

七頁)

列寧繼續說：『如果那種經歷了一九〇五年偉大試驗的俄國革命的人民創造力，不是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就建立了蘇維埃，那末蘇維埃在十月間無論如何也不能奪得政權，因為當時的成功全靠那包括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已經有了現成的組織形式。蘇維埃就是這種現成的形式，因此，我們在政治方面就能預期我們後來所經歷的那些輝煌成就和不斷的勝利進軍，因為新政權形式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只須頒佈幾道法令把蘇維埃政權從它在革命最初幾月間所處的胚胎狀態變成在俄羅斯國家內所奠定的法定形式，即變成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就行。』（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七頁至第六十八頁）

列寧說：『還剩下兩個非常困難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無論如何不能用我們革命在最初幾月間所經歷的那種勝利進軍的方式來解決。』（同上，第六十八頁）

『第一、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於：在資產階級革命時，現成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形式已經具備了；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却沒有這種現成關係，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包括一小部分工業上層而很少觸及農業的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形式。組織統計工作，監督各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整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放在我們肩上的巨大組織任務。根據目前勞動條件，這個任務無論如何不容許像我們從前解決國內戰爭任務那樣用

高呼「烏拉」的方式來解決。」（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八頁）

『……第二個極大的困難就是國際問題。如果我們很容易地戰勝了克倫斯基匪幫，如果我們很容易地在本國建立了政權，如果我們毫不費力地實施了土地社會化和工人監督制的法令，——如果我們很容易地獲得了這一切，那只是因為當時僥倖湊成的條件使我們一個短時間內免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害。國際帝國主義擁有極雄厚的資本，擁有組織得極其完備而成爲國際資本真正實力和真正堡壘的軍事技術，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無論按國際帝國主義的客觀地位來說或按它所體現的那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來說，它都不能和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處，——其所以不能，在於貿易關係，在於國際財政關係。在這裏，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這裏，俄國革命最大的困難，最大的歷史課題就是：必須解決國際問題，必須喚起國際革命。』（同上，第六十九頁至第七十頁）

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在性質和基本意義就是如此。

沒有暴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對資產階級舊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造呢？

顯然是不能的。如果以爲可以在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內，用和平方式來進行這樣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錯亂，神經失常，就是公然無恥地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

必須特別着重特別堅決指出這個原理，因爲無產階級革命暫時還只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被那些仇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而且國際資本又不會不幫助這個國家裏的資產階級。

正因爲如此，列寧說：

『被壓迫階級的解放不僅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六〇頁）

『那些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奴僕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說：「首先要使大多數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情形下，即在保存資本權力和資本壓迫的情形下，表示擁護無產階級政黨，——只有那時，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够並且應當奪取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二四九頁）

『我們說：「首先要使革命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摧毀資本壓迫，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那時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才能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的需要，才能迅速傳得這些羣衆的同情和擁護。」』（同上）

列寧繼續說：『無產階級爲要把大多數居民爭取到自己方面來，第一、應當推翻資產階級，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裏；第二、應當粉碎舊的國家機關，建立蘇維埃政權，這樣一舉而摧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中間的統治，破壞其威信和影響；第三、應當用革命手段、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的經濟需要，以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和小

○ 營業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二四二頁）

無產階級革命的特徵就是如此。

因此，既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那末，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特點又是什麼呢？

請看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最概括的定義吧：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獲得了勝利、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反對那雖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還沒有絕跡、還沒有停止反抗的資產階級，反對那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頁）

列寧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和『全民的』『普選的』政權、和『非階級的』政權混爲一談。他說：

『那個奪得了政治統治的階級是意識到它是獨自奪取政治統治時奪得了這個統治的。這一點是包括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之內的。只有當一個階級知道它是獨自奪取政權而不用什麼『全民的、普選的、全民視爲神聖的』政權的空話來自欺欺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才

有意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五〇頁）

但這並不是說，一個階級的政權，即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階級分掌政權的無產階級的政權，竟不需要其他階級被剝削的勞動羣衆的幫助，竟不需要和這些羣衆結成聯盟就能實現自己的目的。恰恰相反，這個政權，一個階級的政權，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和各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首先是和農民勞動羣衆結成的特種形式的聯盟，才能確立並貫徹到底。

這個特種形式的聯盟究竟是什麼呢？它的內容是什麼呢？這個和其他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的聯盟，一般說來，是否和一個階級專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這個特種形式的聯盟的內容就是：這個聯盟的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個特種形式的聯盟的內容就是：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的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決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分享領導。

可見這裏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外表上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與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分子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所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反抗並完全打破其復辟企圖而成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立的聯盟，是爲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而成立的聯盟。這是在特殊環境中，即在激烈的國內戰爭環境中形成的特種聯盟，這是社會主義堅定的擁護者和其動搖的同盟者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堅定的擁護者和「中立者」的聯盟（那時，聯盟就由鬥爭協定變爲中立協定），這是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以及精神上各不相同的階級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頁至第三五一頁）

加米涅夫在他的一個指示性的報告中反對這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他說：

『專政並不是①一個階級和其他階級的聯盟。』

我想，加米涅夫在這裏首先是針對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那本小冊子裏的一段話而說的。這段話如下：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老練的戰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選出來」並「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階層的普通政府的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在以無產階級爲領導力量的條件下，爲推翻資本和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而結成的階級聯盟。』②

我完全堅持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因爲我認爲它和剛才所引證的列寧的定義完全相符。

我斷定：加米涅夫的『專政並不是一個階級和其他階級的聯盟』這種武斷說法是和列寧的無產階

① ②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級專政理論毫無共同之點的。

我斷定：只有不懂工農結合的思想、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的思想、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的思想的意義的人才會這樣說。

只有不懂列寧的下面這個論點的人才會這樣說。這個論點就是：

『在其他國家的革命還沒有到來時，只有聯合農民才能拯救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二頁）

只有不懂列寧的下面這個原理的人才會這樣說。這個原理就是：

『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護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同上，第四六六頁）

列寧指出專政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鎮壓剝削者。他說：

『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程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二六頁）

『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永遠記着）不受限制的、憑藉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期，任何獲得了勝利的政權都只能是專政。』（同上，第三二〇頁）

① ②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固然沒有暴力就不會有專政，但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不只限於暴力。

列寧說：『專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前的組織更高級的勞動組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頁）

『無產階級專政……不只是對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這種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礎，它的富有生命力和獲得勝利的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代表着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形式的社會勞動組織。實質就在這裏。共產主義的力量源泉和必然會完全勝利的保證就在這裏。』（同上，第三八六頁）

『它（即專政。——斯大林註）的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者的先進部隊，其先鋒隊，其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無產階級的目的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消滅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現象，使社會所有成員都成為勞動者，剷除任何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基礎。這個目的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而是需要一個相當長久的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因為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根本改變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時間的，因為慣於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那種巨大的習慣力量只有經過長期的堅忍的鬥爭才能克服。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時期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同上，第三五八頁）

無產階級專政的特徵就是如此。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有三個主要方面：

(一)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保衛國家，鞏固和其他各國無產者之間的聯系，促進世界各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

(二)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被剝削的勞動羣衆完全脫離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和這些羣衆的聯盟，吸引這些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領導。

(三)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消滅階級，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所有這三方面的結合。其中無論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特徵，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個特徵，就足以使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成其為專政。因此，無論除去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的危險。只有把所有這三方面綜合起來，我們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有其各個時期，各種特別形式和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國內戰爭時期最明顯的是專政的暴力方面。可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期不進行任何建設工作。不進行建設工作就無法進行國內戰爭。反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明顯的是專政的和平工作、組織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同樣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期專政的暴力方面已經消失或可能消失。現在，在建設時期中，也像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鎮壓機關、軍隊和其他組織都是必要的。沒有這些機關，專政就不可能稍微有保證地進行建設工作。不應忘記，革命暫時還只是在一個國家內獲

得勝利。不應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也就有武裝干涉的危險和由這危險產生的一切後果。

五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

上面我已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的觀點，從其階級內容的觀點，從其國家性質的觀點，最後從其在整個歷史時期內即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所謂過渡時期內所執行的破壞任務和創造任務的觀點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需要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構的觀點，從其『機構』的觀點，從『引帶』、『槓桿』和『指導力量』的作用和意義的觀點來說明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引帶』、『槓桿』和『指導力量』綜合起來就構成『無產階級專政的體系』（列寧），而且無產階級專政的日常工作就是依靠這些東西來實現的。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這種『引帶』或『槓桿』是什麼呢？這種『指導力量』是什麼呢？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引帶就是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不依靠這些組織就無法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領導力量。

這些引帶、這些槓桿和這種指導力量是無產階級所必需的，因為沒有它們，無產階級在其爭取勝

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有武裝的資本面前，就會成爲手無寸鐵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所必需的，因爲沒有這些組織，無產階級在其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其鞏固自己政權的鬥爭中，在其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就必然要遭到失敗。這些組織的經常幫助和先鋒隊的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爲沒有這些條件，就不可能有稍微長期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工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脈，即許許多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和其他的組織。它們把各行各業的工人都聯合起來。這是非黨的組織。工會可以稱爲我國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全體成員的組織。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工會從自己隊伍中選拔出優秀分子來担任一切管理部門的領導工作。工會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和落後分子聯系起來。工會把工人羣衆和工人階級先鋒隊連接起來。

第二、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許許多多的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國家組織，再加上無數自動組織起來的、環繞着這些組織並把這些組織和居民連接起來的勞動者的羣衆團體。蘇維埃是全體城鄉勞動者的羣衆組織。這是非黨的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措施都通過蘇維埃來實現。無產階級對農民的國家領導是通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先鋒隊連接起來。

第三、就是各種合作社及其所有支脈。這是勞動者的羣衆組織，是非黨的組織。合作社首先把勞

動者作爲消費者聯合起來，然後把他們作爲生產者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泛的建設時期，合作社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合作社使無產階級先鋒隊便於和農民羣衆聯系，並有可能把農民羣衆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

第四、就是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的羣衆組織，是非黨的組織，但它是很靠近黨的。它的任務是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年輕的一代。它以青年後備軍供給一切管理部門中的所有其他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進行廣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就是無產階級的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的力量在於它從無產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中把無產階級所有優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黨的使命是把無產階級一切羣衆組織的工作毫無例外地統一起來，並把它們的行動引向一個目標，引向無產階級解放的目標。把它們統一起來並引向一個目標是絕對必要的，因爲不這樣就無法統一無產階級的鬥爭，因爲不這樣就無法領導無產階級羣衆去爲政權而鬥爭，去爲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可是能夠統一並指導無產階級羣衆組織的工作的，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黨。只有無產階級的黨，只有共產黨，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起這種主要領導者的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集合點，這些分子和無產階級的非黨組織有直接聯

系，並經常領導它們；第二、因為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集合點，所以它是培養能够領導本階級各種組織的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的學校；第三、因為黨既是培養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來說，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的領導集中起來的唯一組織，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使黨跟本階級連接起來的服務機關和引帶的唯一組織。」

（見『論列寧主義基礎』(1926)）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主要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列寧）

總之，工會是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它首先在生產方面把黨和本階級聯系起來；蘇維埃是勞動者的羣衆組織，它首先在國家事務方面把黨和勞動者聯系起來；合作社主要是農民的羣衆組織，它首先在經濟方面，在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和農民羣衆聯系起來；青年團是工農青年的羣衆組織，它的使命就是幫助無產階級先鋒隊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新一代並培養青年後備軍；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主要指導力量，它的使命是領導這一切羣衆組織，——大體說來，專政『機構』的情況，『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的情況就是如此。

沒有黨這個主要領導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長期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樣，用列寧的話來說：『整個來看，結果就是一個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比較廣泛的、很有力量的無產階級的機關，黨就是通過這個機關和本階級以及羣衆取得密切聯系的，階級專政就是在

黨的領導下通過這個機關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頁）

這一點當然不能了解爲黨能够或應當代替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羣衆組織。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它並不是直接實現這種專政，而是藉助於工會，通過蘇維埃及其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引帶』，就不能有稍微鞏固的專政。

列寧說：『沒有一些把先鋒隊和先進階級羣衆、把它和勞動羣衆連接起來的『引帶』，就不能實現專政。』（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頁）

『可以說黨是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的，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工會這樣的基礎，就不能實現專政，就不能執行國家職能。而要實現這些職能，就必須通過一系列的也是新式的特別機關，即通過蘇維埃機關。』（同上，第二頁）

例如在我們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我們的蘇維埃組織和其他羣衆組織，沒有黨的指示，就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這個事實應當認爲是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的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二）上如何說明這一點：

『坦納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不過他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了

解的一樣。他說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爲實質上^①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的、覺悟的少數的專政。

的確，在資本主義時代，即在工人羣衆不斷遭受剝削而不能發展其人類才能的時代，工人政黨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們所能包括的只是本階級的少數。政黨所能聯合的只是本階級的少數，正像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裏真正覺悟的工人都只佔全體工人的少數一樣。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些覺悟的少數才能領導廣大工人羣衆並引導他們前進。如果坦納同志說他是個反對政黨的人，但同時主張由少數最有組織最革命的工人給整個無產階級指出道路，那末我要說，我們之間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分歧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〇頁）

然而這一點決不應了解爲在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作用（黨『專政』）之間可以劃一個等號，可以把前後二者看做一個東西，可以用後者代替前者。例如索凌就說過『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專政』。這個論點顯然是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如果站在列寧主義的立場上，是不是可以認爲這種混同的看法是正確的呢？不，不可以。原因就是：

第一、上面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演說中引來的那一段話裏，列寧根本沒有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他只是說，『只有覺悟的少數（即黨。——斯大林註）才能

① 清楚是我加的。——斯大林。

領導廣大工人羣衆並引導他們前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爲實質上①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的、覺悟的少數的專政』。

說『實質上』，這還不等於說『完全』。我們往往說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還不等於說：農民問題可以代替民族問題，農民問題按內容來說和民族問題相等，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是一個東西。無須證明，民族問題按內容來說比農民問題更廣泛，更豐富。同樣，關於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也應該這樣說。如果說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而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黨『專政』，那末這還不等於說：『黨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東西，前者按內容來說和後者相等。無須證明，無產階級專政按內容來說比黨的領導作用更廣泛，更豐富。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別的什麼專政。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誰就是以黨『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羣衆組織的任何一個重要決定都非有黨的指示不可。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是黨的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的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呢？當然不是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黨的指示加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對這些指示的實行，再加上居民對這些指示的實行。由此可見，這裏有一系列的過渡和中間階段，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產階級專政很重要的因素。可見在黨的指示和這些指示的實施之間有被領導者的意志和行動，本階級的意志和行動，本階級決心（或不願意）擁護這些指示，本階級善於（或不善於）完全依照環境的要求來實行這些指示等等情況。未必用得着證明：負有領導責任的黨決不能不顧及被領導者的意志、情緒和覺悟程度，決不能忽視本階級的意志、情緒和覺悟程度。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誰就是以黨的指示代替本階級的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獲得了勝利，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頁）這種階級鬥爭會怎樣表現呢？它會表現為無產階級以一系列的武裝行動去反對那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的襲擊或外國資產階級的武裝干涉。在無產階級政權尚未鞏固時，它會表現為國內戰爭。在政權已經鞏固後，它會表現為無產階級進行廣泛的組織工作和建設工作，並吸引廣大羣衆參加工作。在所有這些場合下，活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黨，僅僅一個黨，沒有本階級支持而單靠自身的力量來進行所有這些活動，是從來沒有的。黨通常只是領導這些活動，它所以能領導這些活動，在於它有本階級的支持。因為黨不能包括本階級，不能代替本階級。因為無論黨有怎樣重要的領導作用，它畢竟是本階級的一部分。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誰就是以黨代替本階級。

第四、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黨是無產階級的直接執政的先鋒隊，是領導者』（列寧）（三）。在

這個意義上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然而決不能把這一點了解爲黨是越過國家政權，無須國家政權而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的，了解爲黨是越過蘇維埃，不通過蘇維埃而管理國家的。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把黨和國家政權看做一個東西。黨是政權的核心。但它和國家政權不是而且不能是一個東西。

列寧說：『我們是執政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上層」和黨「上層」融成一體，——它們現時在我國是融成一體的，而且將來也會如此。』（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五三頁）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決不是想藉此說我們所有一切蘇維埃機關，例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的機關，說黨能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說可以把黨和國家政權看做一個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體系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五頁和第四四三頁）；但他從來沒有說黨是國家政權，黨和蘇維埃是一個東西。擁有數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包括千百萬人——黨員和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脈，但黨不能夠而且不應當以自己代替它們。因此，列寧說：『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並受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現的』，『黨的全部工作都是通過①不分職業而把勞動羣衆團結在一起的蘇維埃來進行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九頁和第三十一頁），專

①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政是『必須……通過』蘇維埃機關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頁）。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誰就是以黨代替蘇維埃即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是個國家概念。無產階級專政本身一定包含暴力概念。如果按專政這個名詞的本義來了解，那末沒有暴力就不會有專政。列寧所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就是『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八十四頁）。因此，說黨對無產階級專政並把這種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那就等於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的領導者、領袖和導師，並且應當是對本階級使用暴力的一種專政者，這種說法當然是根本不正確的。因此，誰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誰就默認可以把黨的威信建築在對工人階級使用暴力的基礎上，而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是和列寧主義完全不相容的。黨的威信是由工人階級的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的信任却不是用暴力所能取得的（用暴力只能喪失工人階級的信任），而是要靠黨的正確理論，要靠黨的正確政策，要靠黨對工人階級的忠誠，要靠黨和工人階級羣衆的聯系，要靠黨有決心和本領說服羣衆相信它的口號的正確，才可以取得的。

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應該得出的結論是：

◎ 屠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 列寧使用黨專政這個詞並不是指專政這個詞的本義(『憑藉暴力的政權』)而言，而是指其轉義而言，即指黨獨掌領導而言；

(二) 誰把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誰就是曲解列寧的意思，就是錯誤地給黨加上對整個工人階級使用暴力的職能；

(三) 誰給黨加上這種黨本來所沒有的對整個工人階級使用暴力的職能，誰就是違背了先鋒隊和本階級間、黨和無產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的起碼要求。

這樣，我們就直接接觸到黨和本階級的相互關係問題，工人階級中的黨員和非黨員的相互關係問題了。

按列寧所下的定義，這種相互關係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和工人羣衆間的相互信任』(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八九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當傾聽羣衆的意見，應當重視羣衆的革命本能，應當研究羣衆的鬥爭實踐，並根據這些來檢查自己政策的正確性，所以它不僅應當教導羣衆，而且應當向羣衆學習。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當每天每天取得無產階級羣衆的信任，應當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羣衆

的擁護，黨不應當命令羣衆，而首先應當說服羣衆，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認識黨的政策的正確，所以它應當是本階級的領導者、領袖和導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破壞先鋒隊和本階級間的正確的相互關係，就是損害『相互信任』，就是既破壞階級紀律，又破壞黨的紀律。

列寧說：『大概現在幾乎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有思想、誠實、奮不顧身、有威信、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最完全最忠誠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甚至不能保持兩月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頁）

列寧繼續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進行頑強的鬥爭，進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沒有那在鬥爭中百鍊成鋼的黨，沒有那受到本階級全體忠誠分子信任的黨，沒有那善於注意羣衆情緒並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同上，第二十七頁）

可是，黨是怎樣取得本階級的這種信任和擁護的呢？無產階級專政所需要的工人階級內部的鐵

◎◎◎ 青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它是在什麼基礎上成長的呢？

請看列寧是怎樣說明這一點的：

『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紀律是靠什麼來維持的呢？是靠什麼來檢查的呢？是靠什麼來加強的呢？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它對革命的忠誠，它的堅毅、自我犧牲精神和英雄氣概。第二、是靠它善於和最廣大的勞動羣衆^①，首先是和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同樣也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和他們打成一片^②。第三、是靠這先鋒隊所實行的政治領導的正確，靠它的政治戰略和策略的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的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沒有這些條件，革命的政黨，真正能成爲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的政黨，就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沒有這些條件，所有要建立紀律的企圖必然變爲空談，變爲廢話，變爲裝腔作勢。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一下子能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艱苦的試驗，這些條件才能造成；只有用正確的革命理論，這些條件才容易造成，但革命理論又不是教條，它只有和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聯系起來才能最終形成。』（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八頁至第九頁）

其次：

① ②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爲了戰勝資本主義，就要求領導的政黨（共產黨）和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同羣衆（即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保持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它真是革命階級的先鋒隊，如果它包括革命階級中的一切優秀分子，如果它是由完全覺悟、忠心耿耿、受過頑強的革命鬥爭經驗教育和鍛鍊的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如果它能把自己和本階級全部生活密切聯系起來，而通過這個階級又和全體被剝削羣衆聯系起來，並取得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的完全信任，——只有這樣，黨才能領導無產階級去對一切資本主義勢力作最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另一方面，只有在這樣的黨的領導下，無產階級才能發揮它的革命進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那些被資本主義腐蝕了的極少數的工人貴族和工聯的、合作社的舊領袖等等方面必不可免的冷淡以至於反抗化爲烏有，只有在這樣的黨的領導下，無產階級才能發揮它那因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本身所致而比它在人口總數中所佔的部分大得無比的全部力量。』（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六三頁至第一六四頁）

從這些引文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黨的威信和工人階級內部的鐵的紀律，並不是建築在羣衆對黨的恐懼上，也不是建築在黨的『無限』權力的上，而是建築在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上，工人階級對黨的擁

○ 蒼蠅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護上；

(二) 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不是一下子取得的，不是靠對工人階級使用暴力來取得的，而是靠黨在羣衆中的長期工作，靠黨的正確政策，靠黨善於使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的政策的正確，靠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的擁護並善於引導工人階級羣衆來取得的；

(三) 沒有以羣衆鬥爭經驗爲基礎的黨的正確政策，沒有工人階級的信任，就沒有而且不能有黨的真正領導；

(四) 如果黨享有本階級的信任，如果黨的領導是真正的領導，就不能把黨及其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因爲沒有那深爲工人階級所信任的黨的領導（黨「專政」），就不可能有稍微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沒有這些條件，黨的威信和工人階級內部的鐵的紀律不是空話就是誇大和僥倖。

決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專政」）對立起來。其所以不能，在於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這裏指的是稍微鞏固的完全的專政，而不是像巴黎公社那樣不完全不鞏固的專政。其所以不能，在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可以說是站在一條工作路綫上按照一個方向行動的。

列寧說：「單從提出『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羣衆專政（羣衆的黨）？』這一問題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人們的思想糊塗到了難以置信的不可救藥的地步……誰

都知道，羣衆是劃分爲階級的……在大多數情形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爲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較爲固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如果一般地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那就荒謬愚蠢到令人發笑的地步了。』（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四頁和第二十五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個正確的原理所根據的前提是：先鋒隊和工人羣衆間、黨和本階級間有着正確的相互關係。它所根據的假設是：先鋒隊和本階級間的相互關係是正常的，是保持在『相互信任』的範圍內的。

可是，如果先鋒隊和本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被破壞了，如果黨和本階級間『相互信任』的關係被破壞了，那又怎麼辦呢？

如果黨這樣或那樣使自己和本階級對立起來，破壞了自己和本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的基礎，破壞了『相互信任』的基礎，那又怎麼辦呢？

這種情形一般說來是否可能呢？
是的，是可能的。

這種情形在以下的場合是可能的：

（一）如果黨在羣衆中的威信不是建築在它的工作和羣衆的信任上，而是建築在它的『無限』權

力上；

(二) 如果黨的政策顯然不正確，而黨又不願意重新審查並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 如果黨的政策一般是正確的，但羣衆還領會不了它的政策，而黨又不願意或不善於等待一下，讓羣衆有機會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的政策正確，却企圖強迫羣衆接受它的政策。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許多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所以土崩瓦解和煙消雲散，就在於它們犯了這三條中的一條，有時甚至這三條全犯了。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只要在以下的場合，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看，就不能認為是正確的：

(一) 如果不把黨對工人階級的專政了解爲這個名詞的本義的專政（『憑藉暴力的政權』）；而了解爲黨的領導，正如列寧所了解的那樣，了解爲決不容許對整個工人階級、對工人階級大多數使用暴力的那種領導；

(二) 如果黨有根據做本階級的真正領導者，就是說，如果黨的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是符合本階級利益的；

(三) 如果本階級，如果本階級的多數都接受這種政策，領會這種政策，並由於黨的工作而確信這種政策的正確，信任黨和擁護黨。

違背這三條就一定會引起黨和本階級的衝突，引起它們之間的分裂，引起它們彼此間的對立。

可以不可以用暴力強迫本階級接受黨的領導呢？不，不可以。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是不會維持長久的。黨如果始終做無產階級的黨，它就應當知道，它首先是並且主要是工人階級的領導者、領袖和導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和革命』一書中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一段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的勞動者在沒有資產階級參加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七六頁）

如果黨的政策不正確，如果黨的政策和本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可以不可以認為黨是本階級的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種情形下，黨如果始終做領導者，它就應當重新審查自己的政策，應當改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糾正這種錯誤。只要從我們黨的歷史中援引一件事實就可以證明這個原理的正確，例如在廢除餘糧收集制時期前，工農羣衆顯然不滿意我們的政策，當時黨就公開而誠懇地重新審查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對於廢除餘糧收集制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說了些什麼：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爽直地說：農民不滿意我們和他們之間所建立的這種關

◎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係，他們不要這種關係，並且不會再這樣生活下去。這是不容置辯的。他們的這種意志已經明確地表現出來。這是廣大勞動人民羣衆的意志。我們應當顧及這一點，而且我們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所以能够爽直地說：讓我們重新審查我們對農民的政策吧。」（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二頁至第一九三頁）

如果黨的政策，比方說，由於本階級政治上的落後而還沒有得到本階級的信任和擁護，如果黨，比方說，由於事件還沒有成熟而不能使本階級確信黨的政策正確，可以不可以認為黨只要以自己的政策一般是正確的爲理由，就應當負責發起並負責領導組織羣衆進行決戰呢？不，不可以。在這種情形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就應當善於等待，應當使羣衆確信黨的政策正確，應當幫助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這個政策的正確。

列寧說：『如果革命黨在各個革命階級的先進隊伍內和在全國範圍內沒有爭得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起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〇七頁）

『如果工人階級多數的觀點沒有轉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又是由羣衆的政治經驗造成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五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被我們爭取過來。這是主要的。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連向

勝利走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從這一點到勝利還距離得很遠。單靠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者至少沒有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的中立而對其敵人完全不予支持的立場上的時候，單把先鋒隊投入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要使真正整個階級、使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到這個立場上來，要做到這一點，單靠宣傳鼓動是不够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這些羣衆親身的政治經驗。」（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頁）

大家知道，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從列寧提出『四月提綱』到十月起義的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正因為黨依照列寧的這些指示而行動，所以它取得了起義的勝利。

先鋒隊和本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的條件大體上就是如此。

如果黨的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和本階級間的正确關係又沒有破壞，那末什麼是領導呢？

這種條件下的領導就是要善於說服羣衆，使他們相信黨的政策正確，提出並實行能把羣衆引到黨的立場上並使他們易於根據本身經驗認識黨的政策正確的一些口號，把羣衆提高到黨的覺悟水平，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的擁護並使他們具有堅決鬥爭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工人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假如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取得了對俄國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的兩年半的空前勝利以後，竟以「承認專政」爲加入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了蠢事，破壞了自己在羣衆中的影響，

幫助了孟什維克。因為共產黨人的整個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分子，善於在他們中間做工作，而不是憑空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和他們隔絕。」（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六頁）

這當然不應該理解成爲：黨應該說服所有工人，直到最後一個人爲止，只有到那時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到那時才能開始行動。絕不是這樣！這只是說，黨在採取決定性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期的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多數工人羣衆的擁護，至少取得本階級多數的善意的中立。否則，爭取工人階級多數到黨方面來是勝利的革命的必要條件這一系列的原理就毫無意義了。

可是，如果少數不願意，如果少數不肯自願服從多數的意志，那對他們該怎麼辦呢？黨既已得到多數的信任，它是不是可以，是不是應當強迫少數服從多數的意志呢？是的，是可以而且應當的。領導是以說服羣衆的方法（黨用以影響羣衆的基本方法）爲保證的。可是，這並不排斥而是預計到要實行強迫，只要這種強迫有工人階級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只要這種強迫是在說服了多數以後對少數使用的。

應當回想一下我們黨內在工會問題爭論時期關於這一點的爭執。當時反對派的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爲可以實行強迫呢？不是的，不在這裏。當時反對派的錯誤在於他們既不能使多數相信他們的立場的正確，既已喪失多數的信任，却還實行強迫，堅持『整刷』那些獲得多數信任的人。

請看列寧當時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工會問題的發言中的一段話：

『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那末爲了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和工人羣衆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信任，就必須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有人開始爲這種錯誤辯護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的根源了。如果我們看到庫圖佐夫在這裏所表現的那種情緒而不採取盡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陷於政治破產。首先我們應當說服，然後強迫。我們無論如何應當先說服，然後強迫。我們沒有能够說服廣大羣衆，於是破壞了先鋒隊和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八九頁）

列寧在他的『論工會』（『這本小冊子裏也這樣說：

『只有當我們善於先爲強迫奠定說服的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正確而有效地實行強迫。』（同上，第十四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沒有這些條件，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就黨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的一致；就整個階級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的一致。否則，工人階級的隊伍就會分裂、渙散並解體。

黨對工人階級的正確領導的原則大體上就是如此。

◎ 階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對於領導的任何其他見解都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說它是什麼都可以，但不可以說是布爾什維主義，不可以說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和工人階級間，在先鋒隊和工人羣衆間存在着正確的相互關係，那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專政』）對立起來。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尤其不能把黨和工人階級、把黨的領導（『專政』）和工人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索凌根據不能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做出了不正確的結論：『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專政。』

可是列寧不僅說這種對立是不可容許的，而且說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可容許的。那不是可以根據這一點就把領袖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嗎？如果我們循着這條道路走去，我們就一定會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領袖專政』。而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的政策，實在說，也就是要得出這種糊塗結論來的……

季諾維也夫對於這個問題是怎樣看的呢？

季諾維也夫實質上和索凌持着一樣的觀點，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不同的是索凌說得更直爽更明白，而季諾維也夫却在『兜圈子』。只要看看下面季諾維也夫所著『列寧主義』一書中的一段話就可以相信這一點了。

季諾維也夫說：『蘇聯的現存制度按其階級內容來看是什麼呢？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的直接動力是什麼呢？誰在行使工人階級的政權呢？共產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

專政。蘇聯政權的法律形式是什麼呢？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式國家制度是什麼呢？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一點也不相矛盾。」

如果把黨對整個工人階級的專政了解爲黨的領導，那末說二者不相矛盾當然是對的。可是，怎麼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專政」間、在蘇維埃制度和黨「專政」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曾把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他這種看法是對的，因爲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在黨的領導下把勞動羣衆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究竟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中，曾在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間、在黨「專政」和蘇維埃制度間劃過等號，像現在季諾維也夫所做的那樣呢？不僅黨的領導（「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不相矛盾，而且領袖的領導（「專政」）也是和無產階級專政不相矛盾的。那不是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就是黨專政的國家，也就是領袖專政的國家嗎？而季諾維也夫狡猾地胆小地推行的那個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的「原則」也就是要得出這種糊塗結論來的。

在列寧的無數著作中稍許涉及黨專政問題的，我只找到五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就是他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論戰。他在那裏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像你們所聽到的那樣——建立社會主義統一戰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錢時，我們就說：「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所依靠的就是一黨專政，而且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地，因為這個黨是在幾十年內爭得了整個工廠無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地位的黨。」（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四九六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就戰勝高爾察克專政工人和農民的信』。他在那裏說：

「有人（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全體，甚至其中的『左派』）把「一黨專政」即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的黨專政當做紙老虎來嚇唬農民。

從高爾察克的實例中，農民學會不怕紙老虎了。

或者是地主資本家專政（即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專政。」（同上，第五一七頁）

第三個地方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和坦納論戰時的演說。這篇演說我在前面已

經引證過了①。

第四個地方就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的幾行文字。這幾行文字在前面已

經引證過了②。

第五個地方就是載於『列寧文集』第三卷內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大綱的草稿，裏面有一個小標題

① 見本卷第三十六頁至第三十七頁。——編者註。

② 見本卷第四十三頁、第四十四頁至第四十五頁、第四十六頁至第四十七頁、第五十頁至第五十一頁、第五十一頁至第五十二頁。——編者註。

叫做『一黨專政』（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

必須指出，在這五個地方當中有兩個地方，即最後一個和第二個地方，列寧給『一黨專政』這幾個字加上了引號，顯然是着重指明這個公式含有不確切的轉用的意思。

同樣必須指出，列寧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都把『黨專政』了解爲對『地主和資本家』的專政（『鐵的政權』），而並不是對工人階級的專政，這和考茨基及其同夥的誣譏論調恰恰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在他解釋或一般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的主要著作和次要著作中，沒有一個地方暗示過『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專政』。恰恰相反，這些著作的每頁每行都是堅決地反對這種公式的（見『國家和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書）。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論政黨的作用的提綱中（三），沒有一個字、簡直沒有一個字說到黨專政。這個提綱是在列寧直接領導下擬定的，列寧在他的演說中一再地引證過並認爲它是正確地規定了黨的作用和任務的典範。

所有這些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

（甲）列寧並沒有認爲『黨專政』這個公式是無可指摘的、十分精確的公式，所以這個公式在列寧的著作中用得極少，有時還加上引號；

(乙) 在很少的地方，當列寧和敵人論戰而不得不說黨專政時，他通常說『一黨專政』，就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和其他政黨分享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說，必須把黨對工人階級的專政了解為黨的領導，黨的領導作用；

(丙) 凡是列寧認為需要科學地規定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時，他只說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種地方有幾千個）；

(丁) 正因為如此，列寧才沒有『想到』要把『黨專政』這個公式寫入論黨的作用的基本決議中，——我是指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戊) 從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看，那些把黨『專政』因而也就是把『領袖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一個東西或企圖看做一個東西的同志是不對的，並且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為他們這樣做就違反了先鋒隊和本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的條件。

至於沒有上述附帶條件的『黨專政』這個公式會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那就不用說了。單拿這個公式而不加附帶條件似乎就是：

(甲) 向非黨羣衆示意：千萬別辯駁呀，千萬別議論呀，因為黨是無所不能的，因為我們這裏是黨專政；

(乙) 向黨員幹部示意：幹得大胆些吧，壓制得厲害些吧，不傾聽非黨羣衆的呼聲也是可以的，因為我們這裏是黨專政；

(丙)向黨的上層示意，大可以自滿自足了，甚至可以驕傲自大了，因為我們這裏是黨專政，因而『也就是』領袖專政。

正是現在，在羣衆的政治積極性高漲的時期，提醒對這些危險的注意是很適宜的，因為現在黨決心傾聽羣衆的呼聲對於我們是有特殊價值的，現在關心羣衆的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訓條，現在黨在政策方面必須特別謹慎特別靈活，現在驕傲自大的危險是黨在正確領導羣衆方面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可不回想一下列寧在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至理名言：

『在人民羣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是滄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正確地表現人民所意識到的東西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於是整個機器就要毀壞。』（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三頁）

『正確地表現人民所意識到的東西』，這正是保證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起基本領導力量這一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版）那本小冊子裏，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

的問題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

『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要有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的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乎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從這種勝利的可能性出發，因為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那些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性矛盾的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見『論列寧主義基礎』（二六））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無須解釋的。這是用來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的，因為社會民主黨人認為：沒有在其他各國內同時勝利的革命，無產階級要在一個國家內奪得政權，那就是空想。可是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那本小冊子裏還有第二種說法。那裏說：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不能解決這個任務，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呢？不能。爲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爲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爲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

力。』（見『論列寧主義基礎』初版（二七））

這第二種說法是用來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的武斷的，是用來反對托洛茨基分子的，因為他們宣稱：當其他國家沒有勝利時，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就這一點而論（但只是就這一點而論），這種說法在當時（一九二四年五月）是足夠的，而且無疑地是有過一定好處的。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被克服時，當眼前已擺着一個新問題即沒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國的力量來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時，第二種說法顯然就有缺點了，因而也就不正確了。

這種說法的缺點在哪裏呢？

缺點就在於它把兩個不同的問題連接成一個問題：第一個是可能用一個國家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給以肯定的回答；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可以認為它無須革命在其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就有免除外國武裝干涉、因而免除舊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給以否定的回答。我且不談這種說法會引起一種想法，以為用一個國家的力量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當然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

根據這一點，我就在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那本小冊子（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裏改變了並糾正了這種說法，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一個是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的問題

題，另一個是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這是用以下兩種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解釋爲只是通過『幾國無產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舊制度恢復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據列寧的『論合作社』⁽²⁾那本小冊子宣佈的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我們擁有爲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見『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³⁾。

這個問題的新說法就成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任務』⁽⁴⁾這一著名決議的基礎，這一決議聯系着資本主義穩定的事實而詳細分析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一九二五年四月），並認爲用我國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這個新說法也是我的小冊子『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工作總結』的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即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閉會後立即出版的。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這一問題的提法，在這本小冊子裏說：

『我國有兩種矛盾。一種矛盾是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矛盾（這裏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而言。——斯大林註）。另一種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這裏是指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而言。——斯大林註）……』
『第一種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個國家的努力來克服的，第二種矛盾却需要幾個國家無產者的努

③ 後來，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以後各版中已用這個問題的新說法代替了舊說法。——編者註。

力才能解決，——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爲一談，誰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是糊塗蟲，或者是不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見『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工作總結』（1925）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裏說：

『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和農民一起去建設它』……因爲『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克服所有一切內部困難而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必要條件，因爲我們能够而且必須用自身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同上（1925））關於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裏則說：

『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就是有免除武裝干涉企圖，因而就是有免除復辟企圖的完全保障，因爲稍微嚴重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國際資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各國工人對我國革命的支援，尤其是這些工人的勝利，即使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是完全保障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是保證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同上（1925））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大家知道，在我的『問題和答覆』（一九二五年六月）那本小冊子裏，以及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1925年十二月）中，也是以這種精神來解釋這個問題的。事實就是如此。

這些事實，我想所有同志都是知道的，季諾維也夫也是知道的。

如果現在，在黨內進行思想鬥爭之後將近兩年，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通過了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後，季諾維也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做結論時，竟把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四月所寫的小冊子裏一個很不全面的陳舊的公式拖出來，作為解決這個早已解決了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基礎，——那末，季諾維也夫的這種特殊的手法就只是說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向前進展的時候又把它拉回去，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已由中央全會（四）批准以後又避開這項決議，這就是不可救藥地陷入了矛盾，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就是離開了列寧的道路，就是自己承認自己的失敗。

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可能用我國內部力量來解決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矛盾，這就是在其他國家無產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無須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預先勝利，無產階級可能奪得政權並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種可能，社會主義建設就是沒有前途的建設，就是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信心的建設。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要是不相信我國技術落後並非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條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礙，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否認這種可能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沒有其他國家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完全的最後勝利，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裝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否認這一個不容置辯的原理，就是離開國際主義，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我們不僅生活在一個國家裏，而且生活在許多國家所組成的體系裏，而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而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和資產階級國家間的一系列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只要願意統治並繼續統治下去，就應當也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三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我們面前有某種極不穩固但畢竟是毫無疑義、不容置辯的均勢。這是否會長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以為這是無法知道的。因此，我們必須極端謹慎。我們政策中的第一個訓條，從我們政府一年來的工作中所得出的第一個教訓，所有工人和農民都應當記取的教訓就是要時刻戒備，要記着，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極端仇恨我們的人、階級和政府包圍着的。必須記着，我們隨時都有遭受各種侵襲的危險。」（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二二頁）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季諾維也夫對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所持的觀點又是怎樣的呢？請聽吧：

『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至少應當了解爲（一）消滅階級，因而也就是（二）取消一個階級的專政，這裏指的是取消無產階級的專政』……季諾維也夫往下又說：『爲了更確切地弄清一九二五年我們蘇聯的問題是怎樣的，必須分清兩件事情：（一）建設社會主義的有保證的可能性，——這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當然在一國範圍內也是完全可以設想的；（二）最後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

所有這些能表明什麼呢？

就是表明季諾維也夫並不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最後勝利了解爲有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復辟的保障，而了解爲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至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季諾維也夫則把它了解爲不能夠而且不應當使社會主義建成的一種社會主義建設。碰運氣，茫無前途的建設，在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季諾維也夫的立場。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去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請看，季諾維也夫荒唐到什麼地步了。

但這是嘲弄問題，不是解決問題！

季諾維也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結論中還有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柯夫列夫同志在最近一次俄共（布）庫爾斯克省代表會議上竟胡說八道起來。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四面受着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的國家內，我們能不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上述一切，我們有理由說，我們不僅正在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時還是單獨的，我們雖然暫時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家，但我們一定能建成這個社會主義。」（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七九號）這難道是列寧主義對問題的提法嗎？難道這裏沒有民族狹隘性的氣味嗎？』^①

這樣，照季諾維也夫的說法，承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就是採取民族狹隘性的觀點，而否認這種可能却是採取國際主義的觀點了。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說來，還值得爲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而進行鬥爭嗎？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這種勝利沒有可能嗎？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投降，——這就是從季諾維也夫論據的內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季諾維也夫竟把這種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的謬論當做『國際主義』，當做『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呈獻給我們！

我肯定地說：季諾維也夫在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什維克

① 雷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蘇漢諾夫的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請教列寧吧。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在一九一五年八月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時，就已說過：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①，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列寧的這句加上着重號的話——「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獲得了勝利的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後，能够而且應當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未必用得着證明；列寧的這個明確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解釋的。否則，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對無產階級發出的奪取政權的號召就會是不可理解的。

可見列寧的這個明顯的原理和季諾維也夫的所謂我們能够在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在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糊塗「原理」是有天壤之別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即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說的。可是也許有了奪取政權的經驗以後，在一九一七年以後，他的觀點發生了變化吧？我們來看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小冊子「論合作社」。

列寧說：「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够而且應當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我們擁有爲建成這個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看來不容易說得更清楚了。

試把列寧這個經典性的原理和季諾維也夫用來反駁雅柯夫列夫的那個反列寧主義的論調比較一下，就會懂得雅柯夫列夫只是重複列寧認爲在一個國家內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言論，而季諾維也夫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反對這個原理，斥責雅柯夫列夫，因而背離列寧，採取了孟什維克蘇漢諾夫的觀點，採取了認為我國因技術落後而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

只是不明白，如果我們不打算建成社會主義，那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本來是不應當的，——這就是從季諾維也夫論據的內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其次，我肯定地說：季諾維也夫在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反對我們黨的明確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著名決議裏規定了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決議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在這個決議中是這樣說的：

『兩個直接對立的社會制度的存在，經常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種種經濟壓力、武裝干涉和復辟的危險。因此，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復辟的唯一保障。……』『列寧主義教導說：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即免除資產階級關係復辟的完全保障，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

家中，如果沒有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國家援助」（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①（見決議（五））

由此可見，決議是把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解釋為免除武裝干涉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保障，這和季諾維也夫在他的『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是完全相反的。

由此可見，決議認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中，沒有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國家援助』也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和季諾維也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做結論時用來反駁雅柯夫列夫的那個論調是完全相反的。

試問，這不是季諾維也夫反對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又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有時也免不了有差錯。有時候，黨的決議也含有錯誤。一般地說，可以假定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也含有一些錯誤。可能季諾維也夫認為這決議是錯誤的，那末他就應當像布爾什維克所應有的那樣明白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為什麼季諾維也夫沒有這樣做。他寧願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對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絕口不談，不作任何公開批評，却從背面襲擊這個決議。季諾維也夫大概以為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改善』決議並『稍微』修改列寧的話。未必用得着證明，季諾維也夫打算錯了。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季諾維也夫的錯誤是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這個錯誤的根源在哪裏呢？

據我看，這個錯誤的根源在於：季諾維也夫深信我國技術的落後對於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是不可克服的困難，深信無產階級因我國技術落後而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黨的四月代表會議^{〔三〕}前的一次黨中央會議上曾試圖提出這個論據。但是他們受到了反駁，不得不實行退却，表面上服從和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多數的觀點。季諾維也夫雖然表面上服從這個觀點，却始終和這個觀點作鬥爭。請看我們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在給俄共（布）列寧格勒省代表會議的『覆信』^{〔四〕}中是怎樣說明俄共（布）中央內的這次『事件』的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堅持過一種觀點：似乎國際革命不來拯救我們，我們就會因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的落後而不能克服內部困難。而我們和中央多數一樣却認為：雖然我國技術落後，但我們能够不管這種落後而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正在建設，並且一定會把它建設成功。我們認為：這樣進行建設，當然比在全世界革命勝利的條件下緩慢得多，然而我們還是在前進，而且要繼續前進。我們同樣認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觀點表現出不相信我國工人階級以及跟着我國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羣衆的內部力量。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是背離列寧主義的立場的。』（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最初幾次會議時出現在報刊上的。季諾維也夫當然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這個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沒有找到論據來反駁我

們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這一嚴厲譴責。這是偶然的嗎？我認爲不是偶然的。這種譴責看來是命中要害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緘默來『回答』這種譴責，正是因爲他們無法『招架』。

『新反對派』抱怨人們譴責季諾維也夫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獲勝利。可是，既然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已經討論了整整一年，既然季諾維也夫的觀點已被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五年四月）擯棄，既然黨關於這個問題的確定意見已經形成，並把這種意見載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一九二五年四月）的著名決議中，既然在這一一切之後，季諾維也夫還敢在他的『列寧主義』（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書中反對黨的觀點，既然他以後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複這種言論，——那末這一切，這種堅持自己錯誤的頑強性和固執性，如果不是因爲季諾維也夫中了毒，而且無可救藥地中了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獲勝利的毒，又是因爲什麼呢？

季諾維也夫可以隨便把他這種不相信的態度解釋爲國際主義。但是從什麼時候起，我們竟把那種在列寧主義的根本問題上背離列寧主義的行爲解釋爲國際主義呢？

在這裏，違反國際主義和國際革命的不是黨，而是季諾維也夫，這樣說不是更正確嗎？我們這個『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又是什麼呢？但是，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它不能成爲世界革命的真正根據地呢？如果它沒有能力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沒有能力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它能不能繼續成爲吸引世界各國工人的最大中心，像它現

在無疑地是這樣的中心一樣呢？我認爲是不能的。但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思想，結果就會使我國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的資格，而使我國喪失這種資格，結果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難道不應得出這樣的結論嗎？社會民主黨人是用什麼來恐嚇工人使他們離開我們的呢？就是鼓吹說『俄國人是完全做不成的』。我們現在用什麼來打擊社會民主黨人，把工人代表團一批一批地吸引到我們這裏來，因而鞏固全世界共產主義的陣地呢？就是用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績。既然如此，那末誰鼓吹不相信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績，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縮小國際革命運動的規模，誰就必然背離國際主義，——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由此可見，季諾維也夫的『國際主義』是和他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一樣惡劣的。

因此，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的觀點確定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確定爲『曲解列寧主義』⁽¹⁾，那是很正確的。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奮鬥

我認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够獲得勝利是『新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在我看來，這個錯誤所以是基本錯誤，在於『新反對派』的其他一切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產生的。『新反對派』在新經濟政策、

國家資本主義、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合作社的作用、對富農鬥爭的方法、中農的作用和比重等問題方面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從不相信可能用我國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產生的。

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夠獲得勝利，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這就是不相信由於我國發展中的一些條件，基本農民羣衆可以被吸引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第二、這就是不相信掌握着國民經濟命脈的我國無產階級能夠吸引基本農民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反對派關於我國發展道路的論斷就是默然從這兩個論點出發的，——他們是否有意識這樣做，反正都是一樣。

能不能吸引蘇聯基本農民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那本小冊子裏，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論點：

(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和西方農民有所區別，因爲蘇聯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的教訓，跟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裏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成爲無產階級的後備力量；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資產階級手裏獲

得了土地，並因此成為資產階級的後備力量。未必用得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他們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友誼和政治合作，並因這種友誼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就不會不是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最好對象。」

(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為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情況下發展的，一個極端是大田莊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另一個極端却是大衆貧窮困苦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解體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循着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為單是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就不容許循着這條道路去發展。俄國農業應當循着另一條道路，即循着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惠貸款的辦法來扶持的羣衆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論合作社的論文中正確地指出我國農業應當循着新道路去發展，即循着通過合作社吸引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循着把集體制原則逐步應用於農業，起初應用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應用於農產品生產方面這一道路去發展……』

未必用得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樂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三)

這兩個論點是否正確呢？

我認為這兩個論點對於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整個建設時期都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

這兩個論點只是表達下述的列寧的幾個著名論題：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結合，關於把農民經濟納入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體系，關於無產階級應當和基本農民羣衆一起走向社會主義，關於使千百萬農民普遍合作化是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關於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條件下，『在我國，單純的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四頁）。

那末，我國的農民經濟可能而且應當循着什麼道路發展呢？

農民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經濟按絕大多數農戶來說是小商品經濟。小商品農民經濟又是什麼呢？它是站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既可以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像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形那樣，也可以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像在我們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定要發生的情形這樣。

為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在哪裏呢？

原因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依賴城市，依賴工業，依賴信貸系統，依賴國家政權性質，最後還有一個大家知道的原因，即無論在物質方面，在文化方面，農村都是跟着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

農民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通過農民最深刻的分化去發展，——一個極端是巨大的大地產，另一個極端是大衆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農村，農民經

濟，是依賴城市，依賴工業，依賴城市的集中信貸和依賴政權性質的，而在城市裏統治一切的却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信貸系統和資本主義國家政權。

在我們國家裏，既然城市完全是另一種面貌，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信貸系統、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那末，農民經濟是不是一定循着這條道路去發展呢？當然不是一定的。恰恰相反，正因為城市是農村的領導者，而在我國城市裏統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國民經濟全部命脈的無產階級，所以農民經濟就應當循着另外一條道路去發展，即循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去發展。

這是一條什麼道路呢？

這就是用各種合作社的方式使千百萬農戶普遍合作化的道路，把散漫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周圍的道路，在農民中間，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和農戶所需要的城市產品供應方面，然後是在農業生產方面應用集體制原則的道路。

而且愈往前去，這條道路也就愈成爲在無產階級專政情況下不可避免的道路，因為銷售方面的合作化、供應方面的合作化、以至於信貸和生產方面的合作化（共耕社）是增進農民福利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羣衆免於貧困和破產的唯一方法。

有人說，我國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不能循着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既然證明農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在城

市裏指揮一切的又是社會主義工業，那末這就不成其爲反對農民經濟循着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論據了。在十月革命時，農民按其地位來說也是非社會主義性的，而且他們根本不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爭取的主要是消滅地主政權，結束戰爭，奠定和平。可是他們當時還是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走了。爲什麼呢？因爲推翻資產階級，由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在當時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方法，是奠定和平的唯一方法。因爲當時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因爲當時我們黨已摸索到、尋找到一種能把農民的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和全國共同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後者的標準。這種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的，並且是有利的。因此，農民雖有其非社會主義的性質，當時還是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走了。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於把農民引上這個建設的軌道也應當這樣說。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會主義性的。但是，他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因爲除了和無產階級結合，除了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除了通過農民普遍合作化把農民經濟引上社會主義發展的總軌道以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農民免於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爲什麼正是通過農民普遍合作化呢？

因爲普遍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找到的一種能把私人利益、私人商業利益和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結合起來的標準，能使這種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標準」（列寧〔30〕），這種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的，並且是有利的，這種標準保證無產階級有可能把基本農民羣衆吸引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

業。正因為農民通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商品和使自己的農莊得到機器供應是有利的，正因為如此，農民應當循着而且一定會循着普遍合作化道路走去。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領導下實行農戶普遍合作化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使小商品農民經濟離開那條必然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舊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即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正因為如此，我們黨的當前任務就是為爭取農民經濟的新的發展道路而奮鬥，為吸引基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奮鬥。

因此，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做得很正確，它決定：

『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基本道路，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國家信貸機關和無產階級所掌握的其他經濟命脈的經濟領導作用日益加强的條件下，吸引基本農民羣衆參加合作社組織，並保證這種組織循着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同時利用、克服並排擠這種組織裏的資本主義成分。』（見代表大會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四））

『新反對派』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相信農民這條新的發展道路，看不見或不懂得這條道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絕對不可免的道路。而他們不懂得這一點，是因為他們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夠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能引導農民跟着自己走向社會主義。

因此，他們也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的兩重性，誇大新經濟政策的消極方面，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

主要是退却。

因此，他們也就誇大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作用，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各個槓桿（社會主義工業、信貸系統、合作社、無產階級政權等等）的作用。

因此，他們也就不懂得我們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懷疑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的正確。

因此，他們也就誇大農村中的分化，在富農面前張皇失措，輕視中農的作用，企圖破壞黨關於保證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政策，並一般地在黨的農村政策問題上搖擺不定。

因此，他們也就不懂得黨爲了吸引千百萬工農羣衆來參加工業和農業建設，參加活躍合作社和蘇維埃，參加國家管理，參加反官僚主義鬥爭，參加爲改善並改造我們國家機關的鬥爭所進行的巨大工作。這種工作標誌着新的發展階段，沒有這種工作，任何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思議的。

因此，他們也就在我國建設中的困難面前灰心失望，茫無所措，懷疑我國工業化的可能，悲觀地胡說黨在蛻化等等。

在他們那裏，在資產者那裏，一切事情或多或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裏，在無產者這裏，一切事情却或多或少是壞的；如果西方不能及時發生革命，我們的事業就要破產，——這就是「新反對派」的一般論調，而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派的論調，但不知爲了什麼（大概是爲了安慰自己吧）反對派竟拿它來冒充「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季諾維也夫說新經濟政策主要是退却。所有這些說法當然都

是不對的。其實，新經濟政策是黨容許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鬥爭並預計社會主義成分要戰勝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其實，新經濟政策只是以退却為開始，但它預計在退却過程中重新部署力量並舉行進攻。其實，我們已經進攻幾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進攻着：發展我們的工業，發展蘇維埃商業，排擠私人資本。

可是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主要是退却，——這種論點的意義是什麼呢？這種論點是從什麼出發的呢？

它是從一種不正確的假設出發的，以為現在我們這裏發生的是單一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是單一的資本主義「回復」過程。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懷疑我國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在富農面前張皇失措。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那樣急急忙忙地抓住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不正確的數字。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對於中農是我國農業中的中心人物這一點特別健忘。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過低估計中農的比重，並懷疑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也只有用這種假設才可以「論證」「新反對派」那種不相信農村的新的發展道路，不相信能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觀點。

其實，現在在我國發生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的過程，而是雙方面的即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鬥爭的矛盾過程，是社會主義成分克服資本主義成分的過程。這無論對於以國營工業為社會主義基礎的城市，或是對於以和社會主義工業相

結合的羣衆性的合作社爲社會主義發展的主要據點的農村，同樣是不容置辯的。

單一的資本主義恢復是不可能的，這至少因爲我國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大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和信貸事業由無產階級國家支配着。

農村中的分化絕不能像先前那樣厲害，中農仍舊是基本農民羣衆，而富農不能再有過去那樣的勢力，這至少因爲我國土地已經國有化並禁止買賣，而我國的商業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農的剝削企圖，增進最廣大農民羣衆的福利、消除農村中的兩極對立爲目標的。至於我們現在和富農的鬥爭，不僅是按照老的路綫即按照組織貧農去反對富農的路綫進行，而且是按照新的路綫即按照鞏固無產階級同貧農和中農羣衆的聯盟去反對富農的路綫進行，這一點我就不說了。反對派不懂得按照第二條路綫去和富農作鬥爭的意義和作用，——這件事實再一次證實了反對派滾到農村發展的老路，滾到農村發展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了，在這條老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主要力量，中農却『被沖刷』。

反對派說合作社是變相的國家資本主義，同時援引列寧的『論糧食稅』⁽¹⁾，因而他們不相信可能利用合作社作爲社會主義發展的主要據點。反對派在這裏又犯了極大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社，在一九二一年，在『論糧食稅』寫就時，是足夠的，令人滿意的，當時我國還沒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是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爲可能的我們經濟工作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社和國家資本主義配合起來考察的。可是，這種解釋現在已經不夠了，已被歷史所超過了，因爲從那時起，情況改變了，我

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了，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培植到所預期的那種程度，而現在擁有一千萬以上社員的合作社却已經開始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

難道不就是這個緣故列寧才在『論糧食稅』發表後兩年即一九二三年用另一種看法考察了合作社，認為『在我國的條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嗎？（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頁）

難道不就是因為這兩年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壯大，國家資本主義却沒有培植到應有的程度，列寧才不把合作社和國家資本主義配合起來考察，而把它和社會主義工業配合起來考察嗎？

合作社的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對合作社問題的看法也應當有所改變。

例如請看列寧的『論合作社』（一九二三年）那本小冊子裏說明這個問題的一段精闢的話吧：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①，合作社企業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社企業第一是私人企業，第二是集體企業。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②，合作社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社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們和社會主義企業並無不同之處^③，如果它們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上的。』（同上）

在這一小段引文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是關於『我們的現存制度』並非國家資本主義的問

① ② ③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題。第二是關於同『我們的制度』配合起來的合作社企業和社會主義企業『並無不同之處』的問題。我認爲很難說得比這更明白了。

再看看列寧那本小冊子裏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國，單純的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了根本的改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四頁）

顯然，『論合作社』那本小冊子對於合作社已經有了新的估價，而這種新的估價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意承認的，是『新反對派』違反事實、違反明顯的真理、違反列寧主義而絕口不談的。

和國家資本主義配合起來的合作社是一回事，和社會主義工業配合起來的合作社又是一回事。可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論糧食稅』和『論合作社』這本小冊子之間隔着一道鴻溝。這當然是不正確的。例如，只要援引『論糧食稅』中下面一段話就可以立刻看出『論糧食稅』和『論合作社』在對合作社的估價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系的。請看這一段話吧：

『由租讓制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向另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由小業主合作社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小生產向大生產過渡，就是說，是比較複雜的過渡，但是它在成功時，却能包括更廣大的居民羣衆，却能把舊的關係，社會主義以前的，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即最頑強的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關係的更深固的根拔掉。』（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二

七頁)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列寧遠在寫『論糧食稅』時，即在我國還沒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時，就已經認為合作社在成功時能變為反對『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因而也反對資本主義關係的強有力的鬥爭工具。我認為正是這個思想後來成了他的『論合作社』這本小冊子的出發點。

可是，從這一切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就應當得出結論：『新反對派』不是馬克思主義地而是形而上學地看合作社問題的。『新反對派』不是把合作社看做和其他現象配合起來，比如說，和國家資本主義配合起來（一九二一年）或者和社會主義工業配合起來（一九二三年）的歷史現象，而是把它看做一種永恆不變的東西，看做『自在之物』。

因此，反對派在合作社問題上犯了錯誤，因此，反對派不相信農村可能經過合作社而向社會主義發展，因此，反對派滾到了老路上去，滾到了農村發展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

『新反對派』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實際問題上的觀點大體上就是如此。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的路綫（既然他們有路綫），反對派的游移和動搖，反對派的不相信我們的事業和在困難面前張皇失措，這一切將導致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投降。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因為既然新經濟政策主要是退却，既然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值得懷疑，既然富農幾乎萬能，合作社很少有希望，中農作用日益減少，農村發展的新道路很成問題，黨幾乎在蛻化，而西方革命還不怎么逼近，——既然如此，反對派的武庫裏究竟還剩下什麼呢？他們打算靠什麼去對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進行鬥爭呢？單靠一套『時代哲學』^{〔3〕}是不能作戰的。

很明顯，『新反對派』的武庫，即使它一般可以稱為武庫，也是不值得羨慕的。這個武庫不是為了進行鬥爭，更不是為了取得勝利的。

很明顯，黨如果靠這樣一個武庫去作戰，它『一下子』就會斷送自己，——它只好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投降。

因此，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做得完全正確，它決定：『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乃是我們黨的基本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所必需的條件之一就是『反對那種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態度，反對那種把我們的「徹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企業看做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企圖』；『這種思潮使羣衆不能自覺地對待一般社會主義建設，具體說來，不能自覺地對待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所以只能阻礙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而幫助私人資本來和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作鬥爭』；『因此，代表大會認為必須進行廣泛的教育工作去克服這種曲解列寧主義的觀點』（見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就聯共（布）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4〕}）。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徹底揭露了『新反對派』的錯誤，斥責了『新

反對派』的不相信的態度和叫苦的行爲，明確地指出了進一步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因而用對社會主義建設必獲勝利的堅強信念武裝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按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刊印

關於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農民

(答波爾特涅夫、葉弗列莫夫、伊甫列夫三同志)

對不起，答覆遲了。

在我的演說(註)中根本沒有說過，作爲工人階級同盟者的農民只在現時才是工人階級所必需的。那裏面並沒有說過，革命在歐洲的一個國家裏勝利以後，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就會是多餘的。我想你們沒有好好閱讀我在莫斯科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那裏面只是說：『農民是立刻可以給我國革命以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由此可以不可以得出結論說，在歐洲革命勝利以後，農民對於我國工人階級就會成爲多餘的呢？當然是不可以的。

你們問：『當世界革命實現的時候，當不再需要第四個同盟者——農民的時候，情況會怎樣呢？對農民的看法又將怎樣呢？』

第一、說『在世界革命以後』就不再需要農民了，這是不對的。其所以不對，是因為『在世界革命以後』，我們的經濟建設工作必然一日千里地前進，而建設社會主義沒有農民是不行的；同樣地，農民要擺脫貧困，沒有無產階級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在西方革命勝利以後並不會削

弱，相反地，一定會加強起來。

第二、『在世界革命以後』，當我們的建設工作百倍加強的時候，工人和農民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集團勢必消失，變成土地和工廠的勞動者，就是說，他們的經濟地位將是平等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將逐漸變成一個融合物，變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變成一個由過去是工人和農民後來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所組成的社會主義社會。

這就是我們對『世界革命勝利以後』的農民的看法。

在我的演說中所談到的並不是我們黨將來怎樣看待農民的問題，而是在此刻，在目前，當西方資本家開始稍微恢復元氣的時候，四個同盟者中間哪一個是工人階級最直接的同盟者和最直接的助手的問題。

為什麼我在演說中要這樣提問題呢？因為我們黨內有些人愚蠢地糊塗地認為農民不是我們的同盟者。我們黨內有這種人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這種人是有的。我的演說所反對的正是這種人，並因此證明：目前農民是工人階級最直接的同盟者，那些散佈不信任農民的思想的人會不自覺地斷送我們的革命事業，就是說，既會斷送工人的事業，又會斷送農民的事業。

這就是我所談到的。

我想，我把農民叫做不很堅強的同盟者和不像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那樣可靠的同盟者，你們是有些見怪的。我看得出你們是因為這一點而見怪的。可是，難道我不對嗎？難道我不應當直率

地說出真實的情況嗎？在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時期，農民往往一會兒動搖到工人方面，一會兒又動搖到將軍方面，難道這話不對嗎？而在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軍隊裏，農民，自願加入的農民還少嗎？我並不責備農民，因為他們的動搖是由於覺悟不夠。但我既然是共產黨員，就應當直率地說出真實的情況。列寧是這樣教導我們的。真實的情況就是：在困難的時候，當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向工人進攻的時候，作為工人階級同盟者的農民並不一向都表現出十分剛毅和堅定的精神。

這是不是說可以把農民攔在一邊，像某些根本不承認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者的糊塗同志現在所做的那樣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把農民攔在一邊，就等於對工人和農民犯罪。我們要採取一切辦法來提高農民的覺悟，教育他們，使他們靠近我國革命的領袖——工人階級，這樣，我們就會使農民成為我國無產階級更堅定的更可靠的同盟者。

將來革命在西方爆發的時候，農民就已經完全堅強起來，並成為我國工人階級最忠實的同盟者之一。

應該這樣來了解共產黨人對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農民的态度。
致
同志的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二月九日

第一次刊印

關於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答坡柯也夫同志）

坡柯也夫同志！

回信寫遲了，請你和你處的同志們原諒。

很遺憾，你不了解我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意見分歧。問題根本不在於似乎反對派斷定我們還沒有到達社會主義，而代表大會似乎說我們已經到達社會主義。這是不對的。我們黨內沒有一個人會說我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

代表大會上所爭論的根本不是這個問題。爭論的是：代表大會說，即使西方不能及時發生勝利的革命而給我們以援助，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結成聯盟也能徹底打敗我國資本案，也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反對派却說，在西方工人取得勝利以前，我們不能徹底打敗本國資本案，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可是，既然西方革命的勝利要延遲一些時候，看來我們只好開空車了。代表大會談到過，並且在它的關於中央總結報告的決議（略）中指出：反對派這種看法就是不相信我們能戰勝本國資本案。

親愛的同志們，爭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西歐工人的幫助。假定西歐工人不同情我們，不給我們以道義上的援助，假定西歐工人不阻止本國資本家進攻我們的共和國，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就會是資本家向我們進攻，把我們的建設工作根本破壞，甚至把我們完全打垮。如果資本家現在沒有做這樣的嘗試，那是因為他們害怕在出兵進攻我們共和國的時候，工人會在後方打擊他們。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西歐工人對我國革命的援助。

但是從西方工人的援助到西方革命的勝利是十分遙遠的。沒有西方工人的援助，我們未必抵抗得住包圍着我們的敵人。如果這種援助今後會變成西方革命的勝利，那就好了。那時社會主義在我們的勝利就會是最後的勝利。但是，如果這種援助不變成西方革命的勝利，那又怎麼辦呢？沒有西方革命的勝利，我們能不能建設並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呢？代表大會回答說：能。否則就用不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了。如果我們不打算徹底打敗我國的資本家，那末誰都會說，我們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是多餘的。反對派却說，我們用本身的力量是不能徹底打敗本國資本家的。

我們之間的差別就在這裏。

代表大會還談到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問題。社會主義最後勝利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有免除外國資本家武裝干涉的完全保障，有免除舊制度藉這些資本家的武裝進攻我國而在我國復辟的完全保障。我們用本身的力量能不能取得這種保障即能不能使國際資本無法進行武裝干涉呢？不，不能。這是我們和全西方的無產者的共同事業。只有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或者至少是歐洲主要國家工

人階級的力量，才能最後制服國際資本。在這方面沒有歐洲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是不行的，——沒有這一點，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不可能的。

歸根到底，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沒有西方革命的勝利，我們用自己的力量也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是要保障我國不受國際資本的侵犯，單靠我們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西方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可能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是一回事，可能保證我國不受國際資本的侵犯又是一回事。

在我看來，你和你處的同志們的錯誤就在於你們還沒有弄清這件事情而把這兩個問題混淆起來了。 致

同志的敬禮

約·斯大林

附言：你最好找『布爾什維克』雜誌（Б）（莫斯科）第三期讀讀我的文章。這對你是會有幫助的。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第一次刊印

紀念柯托夫斯基同志

我知道柯托夫斯基同志是一個模範黨員，是一個富有經驗的軍事組織者和卓越的指揮官。

我特別清楚地記得他一九二〇年在波蘭前綫的情形，當時布瓊尼同志突入波軍後方日托米爾，柯托夫斯基則率領他的騎兵旅萬分勇猛地襲擊基輔的波軍。他是波蘭白軍的大災星，因為正像當時紅軍戰士所說的他比誰都善於『斬殺』波蘭白軍。

我們謙遜的指揮官中最勇敢的指揮官，我們勇敢的指揮官中最謙遜的指揮官，——我所記得的柯托夫斯基同志就是這樣的。

願他的英名和光榮永垂不朽。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共產黨人報』（哈爾科夫）第
四十三號（總第一八二八號）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

(續)

法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同志們！很遺憾，關於法國的事情我不大熟悉。因此，我不能照這裏所需要的那樣詳盡地說明這個問題。然而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上聽了幾次發言以後，對於法國問題就有了一定的看法，所以我認為有責任根據這一點在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一些意見。

這裏我們要談的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法國的政治形勢。同志們在關於法國目前政治形勢的發言中所流露的那種滿不在乎的情緒使我感到有些不安。人們得到的印象是：法國的形勢多少是平穩的，一般說來，事情進行得還可以，固然有一些困難，但是這些困難大概不致引起什麼危機，如此等等。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雖然我不能說法國正面臨着自己的一九二三年^(五)，但是我以為它正在走向危機。在這方面，無論是委員會的提綱或某些同志的意見，我認為都是正確的。

這個危機很特別，因為在法國沒有失業現象。法國現在靠德國供給黃金，因此，危機得以緩和。

但是這種現象是暫時的，第一、因為德國的黃金不夠法國彌補內部的虧空和償還英美的債款；第二、因為失業現象在法國是不可避免的。當通貨膨脹刺激着輸出的時候，也許不會有失業現象，可是以後，當貨幣穩定而國際間債務清償發生自己的作用的時候，法國的工業集中和失業現象就不可避免了。法國統治集團的普遍驚慌和法國內閣的經常更迭就是法國走向危機的最確實的徵兆。

任何時候都不能把危機的發展過程描繪成直綫式發展着的失敗過程，任何時候也沒有這樣的危機。革命危機的發展通常是曲折的：小小的失敗，以後是情況好轉，以後是比較嚴重的失敗，再後是某種程度的高漲等等。不應當因為有了這種曲折的發展就認為資產階級的事情正在好轉。

因此，滿不在乎的情緒在這裏是危險的。其所以危險，是因為危機的發展可能比人們所想像的更快，那時法國同志就要手足無措。手足無措的黨是不能指導事變的。因此，我認為法國共產黨應當採取適應革命危機逐漸增長的方針。法國黨應當重視這方面的宣傳鼓動工作，使工人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有準備地迎接這次危機。

第二個問題是黨內日益增長的從右面來的危險。我認為無論在法國共產黨的周圍還是在黨內都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戰鬥性的右派集團，其領導者有的是被開除出黨的分，有的是沒有被開除出黨的分，這個集團將無時不消耗共產黨的力量。我剛才和克列梅談過話。他講到一個新的事實：不僅黨的系統，而且工會的系統都存在着右派集團，他們偷偷摸摸地進行工作，在某些地方則直接攻擊共產黨的革命派。甚至安格列爾今天的發言也含有這種意味，這一點必須引起同志們密切的注意。

在危機增長的時期，右派總是要抬頭的。這是革命危機的一般規律。右派所以抬頭，是因為他們懼怕革命危機，因此，他們情願用一切辦法拉着黨倒退而不讓增長着的危機發展下去。因此，我認為既然法國共產黨應當造就新的革命幹部並組織羣衆去迎接危機，那末，它的當前任務就是給右派以反擊，使他們孤立。

法國共產黨是否準備好了這種反擊呢？

現在我來講第三個問題，講法國共產黨領導集團中的情況。有些人說，要孤立右派，必須從法國共產黨領導集團中清除兩個雖和右派進行過鬥爭但犯過重大錯誤的同志。我所指的是特倫和修占努·日羅。我要直截了當地說話，因為有什麼就說什麼是再好不過的了。

從清除領導集團中那些對右派進行鬥爭的人來開始攻擊右派，我不知道這究竟有多少道理。我原以為會相反地提出另一種建議，比方這樣一種建議：既然右派變得厚顏無恥，既然他們把自己的機關報『共產黨人公報』停刊，發表了侮辱黨的宣言，那末未嘗不可作這樣處理，在政治上揭露右派中間的某些人，甚至把他們根本開除出黨。我原以為由於右傾的危險，問題定會這樣提出來。我原以為我將在這裏聽到的正是這種意見。然而事實不是這樣，有人倒向我們提議從孤立兩個非右派分子來開始孤立右派。同志們，我認為這是不合邏輯的！

但是在這裏，和這個問題，和反對右派的問題交錯着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內部缺乏一個團結的多數集團。黨的領導集團如果沒有一個能一致行動的緊密團結的多數，黨就

既不能進行反對右派集團的鬥爭，又不能進行反對『極左』集團的鬥爭，這是很對的。這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爲這種集團應當形成起來，並且我以爲它已經形成起來，或者很快就將在塞馬爾、克列梅、多列士、蒙穆索這樣的同志們的周圍形成起來。建立這種集團，或者設法使我所說的這些同志在一個領導集團中步調趨於一致，這就等於集中力量和右派作鬥爭。你們不能打敗右派，因爲右派正在發展，而且看來他們在法國工人階級中是有些基礎的，我說，如果你們不把領導集團內部一切決心和右派鬥爭到底的革命的共產黨員聯合起來，你們是不能打敗右派的。從分散自己的力量來開始和右派作鬥爭，這是不合理的，不聰明的。如果不把力量集中起來，你們既會削弱自己，又會在和右派的鬥爭中失敗。

當然，也許法國同志不認爲集中一切力量（特倫和修占努·日羅也包括在內）是可能的。也許他們以爲這是不可能的。那末就讓法國同志在自己的中央全會上或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對自己政治局的成分作相當的變更吧。讓他們不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而自己去做吧。他們是有權利這樣做的。

我們俄國同志不久前才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定的決議，使共產國際各支部能更多地自己領導自己。這一點我們是這樣理解的：應當盡量使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不直接干預各支部的事情，例如干預我們共產國際各支部領導集團構成的事情。同志們，不要迫使我們違反我們黨的代表大会剛剛通過的決議。當然，有時候處分個別同志是必要的，但是目前我看不出有這種必要。

因此，我以爲我們的委員會應當做下列幾件事情：

第一、對法國問題做出明確的政治決議，提出堅決和右派作鬥爭的口號，指出那些犯錯誤的同志的錯誤。

第二、勸告法國同志把法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集團團結在這個以反對右派爲目的的決議的周圍，也就是說，責成這一集團的成員同心協力地、忠誠地執行這個決議。

第三、勸告法國同志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不要醉心於割除的辦法、懲處的办法。

第四個問題是關於法國工會的問題。我有這樣一個印象：某些法國同志把這件事情看得太輕了。我認爲工聯代表方面可能犯過錯誤，但我同樣認爲法國共產黨中央方面在對待工聯上也可能犯過錯誤。蒙穆索同志希望黨少包辦些，這是十分自然的。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爲黨和工聯是兩個平行的組織，二者之間有時不能不有一些摩擦。這在我們俄國發生過，在各國共產黨內也發生過，——這是難免的事。但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對工會的一切小事情過問得愈少，摩擦也就會愈少。領導工會應當通過在工會中進行經常工作的共產黨員，而不應當撇開他們。在我們俄國黨內曾有對工會領導得過多的情形。在我們黨的檔案中，你們可以找到我們黨的代表大會關於黨對工會不要包辦、關於黨對工會要領導而不要包辦的問題所通過的許許多多決議。我就心在這方面法國黨——同志們，請原諒我這樣說——對於工會也有某些過錯。我認爲黨是工人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正因爲如此，對黨的要求就應當更高些。因此，首先應當消滅中央的錯誤，以便改善並鞏固對工會的關係，以便蒙穆索同志和其他工會工作者能根據共產黨認爲必需的方針去工作。

黨若沒有工會和工會領導者作爲極重要的支柱，它就不能向前發展（特別是在西方現在的條件下），它就不能鞏固。只有善於和工會及其領導者保持廣泛的聯系並善於和他們建立真正無產階級的聯系的黨，只有這樣的黨才能爭取西方工人階級的多數。你們自己知道，沒有爭取到工人階級的多數，想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歸結起來是什麼呢？

歸結起來就是：

（甲）法國正走向危機；

（乙）右派感覺到這個危機並懼怕這個危機，它正在抬頭並力圖拉着黨倒退；

（丙）黨的當前任務是消滅右傾危險，孤立右派；

（丁）爲了孤立右派，必須把黨的領導機構中能夠和右派鬥爭到底的一切真正共產主義的領導者集中起來；

（戊）爲了使力量的集中能在和右派的鬥爭中並在組織工人迎接革命危機方面得到滿意的結果，必須使領導集團依靠工會並善於和工會及其工作人員保持無產階級的聯系；

（己）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對個別同志不要醉心於割除的辦法、懲處的辦法，主要地應當利用說服的辦法。

慶祝國際共產主義婦女節

向正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周圍團結成一個勞動大家庭的全世界女工們和勞動婦女們致以熱烈的敬禮。

祝她們在下列事業中獲得完全勝利：

- (一) 鞏固全世界工人的國際團結和保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 (二) 把勞動婦女的落後階層從資產階級的精神束縛和經濟束縛下解放出來；
- (三) 把農婦們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者的周圍；
- (四) 把兩部分地位還不平等的被壓迫羣衆變成一支爲消滅任何不平等現象、爲消滅任何壓迫、爲爭取無產階級的勝利、爲在我國建成新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的統一的大軍。

國際共產主義婦女節萬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

「真理報」第五十五號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

德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

同志們！我只有幾點意見。

一、有些同志認為：如果蘇聯的利益要求的話，西方各國共產黨就應當採取右傾政策。同志們，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必須說，這個假定和我們俄國同志在工作上所遵循的原則是完全不相容的。我不能設想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什麼時候會要求我們的兄弟黨右傾。實行右傾政策是什麼意思呢？無論如何這就是出賣工人階級利益。我不能設想蘇聯的利益會要求我們兄弟黨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哪怕是一秒鐘。我不能設想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基地的我們共和國的利益所要求的不是最大限度地發揮西方工人的革命性和政治積極性，而是降低這種積極性，減弱這種革命性。這種假定對於我們俄國同志是一種侮辱。因此，我認為我有責任宣佈絕對不同意這種荒謬絕倫的完全不能容忍的假定。

二、關於德國共產黨中央。有些知識分子議論紛紛，說德國共產黨中央很弱，說它領導得很弱，說中央沒有知識分子以致工作做得不好，說中央並不存在等等。同志們，這一切都是不對的。我認爲這些說法是知識分子的胡言亂語，有失共產黨人的身分。本屆德國共產黨中央並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在反對右傾錯誤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它是在反對「極左」傾錯誤的鬥爭中壯大起來的。因此，它既不是右傾的，也不是「極左」傾的。這是列寧式的中央。這正是現在德國共產黨所需要的工人領導集團。

據說，本屆中央在理論知識方面並不出色。那有什麼關係，只要有了正確的政策，理論知識是不難掌握的。知識是可以求得的东西，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至於德國共產黨中央現在實行的正確政策，却不是某些誇誇其談的知識分子所容易領會的。本屆中央的力量就在於它實行正確的列寧政策，而這是那些誇耀自己的「知識」的書生所不願了解的。據某些同志看來，一個知識分子只要多讀兩三本書或多寫一兩本小冊子，就可以要求黨內的領導權了。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不正確到很可笑的地步。你可以寫一整套哲學書，但是，如果你沒有領會德國共產黨中央的正確政策，那就不能讓你去領導黨。

台爾曼同志！如果這些知識分子真願意爲工人事業服務，那你讓他們來服務好了，如果他們非要發號施令不可，那你可以叫他們滾開……本屆中央工人佔優勢這個事實，是德國共產黨的一個優點。

德國共產黨的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要開闢一條道路去接近那些具有社會民主主義情緒而在雜亂的社會民主主義叢林中迷失方向的工人羣衆，從而把工人階級的多數爭取到共產黨方面來。任務就是要幫助迷失方向的弟兄走上大道並和共產黨發生聯系。這裏可能有兩種對待工人羣衆的方法。一種方法是知識分子特有的方法，鞭笞工人的方法，可以說是拿着鞭子來『爭取』工人的方法。無須證明，這種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因為它不是爭取工人而是推開他們。另一種方法就是和那些處在社會民主主義陣營裏的迷失方向的弟兄取得相互的了解，幫助他們走出社會民主主義的叢林，使他們容易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共產主義的工作方法。本屆中央的成分是無產階級的成分，這個事實大大便利了在德國採用第二種方法。本屆德國共產黨中央在統一戰綫工作方面無疑是有成就的，而這些成就也應該用這一點來說明。

三、關於邁耶爾。我注意地聽了邁耶爾的聰明的演說。但是應當說，他的演說有一點我是不能同意的。在邁耶爾看來，不是他走到德國共產黨中央這方面來，相反地，是中央走到他那方面去。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一點他沒有率直地說出，但是他的全篇演說透露出這種思想。這是不對的，這是大錯特錯的。本屆中央是在反對右派的鬥爭中產生的，而邁耶爾不久以前還活躍在右派的隊伍裏。如果中央不願變質，如果中央不願扭轉德國共產黨的歷史車輪，那末它是不能右傾的。然而，如果邁耶爾已經開始向這個中央靠攏，那末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邁耶爾開始左傾了，他開始承認右派的錯誤

了，他開始脫離右派了。可見不是中央走向邁耶爾，相反地，是邁耶爾走向中央。他在走向中央，但他還沒有走到。他需要從右派方面向中央方面再走兩三步，才能完全走到德國共產黨現在的領導方面。我決不認為邁耶爾是一個患鼠疫的人，我不主張把邁耶爾推開，我只是說，他需要再向前走兩三步才能徹底靠攏本屆德國共產黨中央。

四、關於蕭列姆。我不多講德國的『極左派』和蕭列姆的政策。這一點這裏已經講得够多了。我只想指出蕭列姆演說中的一個地方並加以批評。蕭列姆現在主張黨內民主。因此，他建議進行普遍的爭論，邀請布蘭德勒和拉狄克，邀請所有的人——從右派到『極左派』，實行大赦並進行普遍的爭論。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我們不需要這個。從前蕭列姆反對黨內民主。現在他跑到另一個極端，主張沒有邊際的絲毫不受限制的民主。但願老天爺不要把這樣的民主給我們！俄國人說得好：『你讓傻子去禱告，他就會把額頭磕破。』（笑聲）不，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民主。德國共產黨已經害過右傾病了。我們現在用不着人為地給它培養這種病。德國共產黨現在正害着『極左』傾的病。我們現在用不着使這種病加重起來，應當根除它，不應當使它加重起來。我們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種爭論，也不是任何一種民主，而是對德國共產主義運動有好處的那種爭論和那種民主。因此，我反對蕭列姆的大赦。

五、關於路特·費舍集團。關於這個集團，這裏已經談得很多，我只要說幾句就可以了。我以為在德國共產黨所有不可容忍的惡劣的集團中間，這個集團是最不可容忍的和最惡劣的。一個『極左派』的無產者在這裏指出工人們對領袖逐漸不信任。如果這話不錯，那末這是極其可悲的。因為凡是

對領袖不信任的地方，那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黨。但這是誰的罪過呢？是路特·費舍集團，是它在政治上的兩面手腕，是它的言行不一致的做法，是這個玩弄外交手腕的集團在實際工作中言行的永不一致。凡是領袖在玩弄外交手腕方面腐朽透頂的地方，凡是諾言沒有行為做後盾的地方，凡是領袖言行不一致的地方，那裏的工人就不可能信任領袖。

爲什麼俄國工人無限地信任列寧呢？是不是僅僅因爲他的政策正確呢？不，不僅僅是這個原因。他們信任他，還因爲他們知道列寧言行一致，列寧『不騙人』。這就是列寧的威信所以建立起來的原因之一。這就是列寧用以教育工人的方法，這就是他使工人信任領袖的方法。路特·費舍集團的方法，玩弄腐朽透頂的外交手腕的方法，是和列寧的方法完全相反的。我可以尊敬並信任波爾迪加，雖然我不認爲他是列寧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我所以能信任他，是因爲他所說的就是他所想的。我甚至可以信任蕭列姆，雖然他所說的不總是他所想的，（笑聲）但他有時還是脫口說出真話。（笑聲）我無論怎樣願意，但是一秒鐘也不能信任路特·費舍，因爲她從來就不說她所想的。正因爲如此，我才認爲路特·費舍集團是德國共產黨所有惡劣集團中最惡劣的。

六、關於烏爾邦斯。我對於作爲革命家的烏爾邦斯滿懷敬意。我情願崇敬他，因爲他在法庭上表現得很好。但是必須說，單靠烏爾邦斯的這種品質是做不出什麼事來的。革命性是好的，堅毅精神更好。但是，如果除了這種品質以外，武庫裏再沒有什麼，那末，同志們，那就少了，太少了。這點本錢只够用一兩個月，如果不以正確的政策做後盾，那它以後就會用完，一定會用完。現時在德國共產黨

內，德國共產黨中央和卡茨匪幫之間正在進行着勢不兩立的鬥爭。烏爾邦斯擁護誰呢？擁護卡茨匪幫呢，還是擁護中央？擁護市僧哲學家柯爾什呢，還是擁護中央？這裏應該有所選擇。不能逗留在這兩種鬥爭勢力的中間。這裏要有勇氣公開地誠懇地說出烏爾邦斯擁護誰，擁護中央還是擁護那些反對中央的狂妄之徒。這裏需要十分明確的態度。烏爾邦斯糟糕的地方大概就在於他還沒有這種明確的態度，他患了政治上的近視病。政治上的近視，一次可以原諒，兩次可以原諒，但如果變成了政策，那就近乎犯罪了。正因為如此，我認為烏爾邦斯如果不願失掉他在黨內的最後一點威望，就應當公開地誠懇地表明態度。工人羣衆是不能靠回憶烏爾邦斯在法庭上表現得好來生活的。工人羣衆需要正確的政策。如果烏爾邦斯沒有明確的政策，那末不是先知也可以說：烏爾邦斯的威望就連回憶也不會給人留下的。

載於一九二六年三月

『共產國際雜誌第三期』

（總第五十二期）

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給列寧格勒黨組織積極分子做的

關於聯共(布)中央全會(三)工作的報告)

同志們！讓我開始報告吧。

我黨中央四月全會的議程有四項：

第一項——我國的經濟狀況和我黨的經濟政策。

第二項——根據精簡方針改組我們的糧食收購機關。

第三項——從解決我國經濟建設關鍵問題的角度來制定我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會一九二六年的工作計劃。

第四項——另派什維爾尼克同志接替葉甫多基莫夫為中央委員會書記。

如果除去最後一個關於更換書記的問題不算，那末成為中央全會主要討論中心的其他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即關於我國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的問題。因此，我在這個報告中只要講到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關於我國經濟狀況的問題。

一 新經濟政策的兩個時期

決定我們政策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我國在經濟發展上已進入新經濟政策的新時期，進入直接工業化的時期。

自從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宣佈新經濟政策以來，已經有五年了。當時擺在我們面前，擺在黨面前的基本任務，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大規模的商品流轉的條件下，建立我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這個戰略任務現在還是作為我們的基本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自一九二一年起，就從首先發展農業的角度來對待這一基本任務。列寧同志說，我們的任務是建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但是要建立這樣的基礎，必須有發達的工業，因為工業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開端和終結，而要發展工業就必須從農業開始。

爲什麼呢？

因為要在我們當時所處的經濟破壞的情況下擴展工業，首先必須給工業創造某些市場的、原料的和糧食的前提。在空地上發展工業是不可能的，如果國內沒有原料，如果沒有糧食供給工人，如果沒有稍微發達的農業作為我國工業的基本市場，要發展工業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發展工業，至少要有三個前提：第一，要有國內市場，而目前我們的國內市場主要是農民市場；第二，要在農業中有較為

發達的原料生產（甜菜、亞麻、棉花等等）；第三、要使農村能分出必要數量的農產品來供給工業，供給工人。因此，列寧說，我們要建立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要建設工業，就應當從農業開始。

當時許多人不相信這一回事。當時特別反對這一點的是所謂『工人反對派』。他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黨叫做工人的黨，而它發展經濟卻從農業開始。他們說，這怎樣理解呢？其他的反對派當時也表示反對，他們不願現實的可能性，認為在任何條件下，甚至在空地上也可以建設工業。可是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清楚地表明了黨是正確的，要建立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要擴展工業，就必須從農業開始。

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已進入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時期。現在我國經濟狀況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重心已轉移到工業方面了。如果當時，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因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依靠農業的，我們必須從農業開始，那末現在要繼續建設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要推進整個經濟，所需要的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業上。現在，如果不及時供給農業機器、拖拉機和工業品等等，農業本身就不能進展。因此，如果當時，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事業是依靠農業的，那末現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經依靠工業的直接擴展了。

二 工業化方針

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所宣佈而現在正在實現的國家工業化的口號和方針，其實質和基本意義就在這裏。本年四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工作就是從這一基本口號出發的。所以我們當前的基本任務就是加快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利用現有的資源來全力推進我國工業，從而加速整個經濟的發展。

正是現在，在目前，這一任務具有特別迫切的性質，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我國，由於經濟的一定方向的發展，在城鄉對工業品的需求和工業對這些產品的供給之間就形成某種不相適應的現象，對工業品的需求比工業本身增長得更快，我們現有的商品極其缺乏的現象和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都是這種不相適應的現象的表現和結果。幾乎無須證明，迅速發展我國的工業是消滅這種不相適應和商品極其缺乏的現象最可靠的手段。

有些同志認為工業化一般地就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甚至有這樣的怪人，他們認為在很早以前創造過某種工業胚胎的伊凡·雷帝就已經是工業化主義者了。如果以此類推，彼得大帝就應該叫做第一個工業化主義者了。這當然是不正確的。不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都算做工業化。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等），歸根到底，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本國

的機器製造業。工業化的任務不僅要增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中工業的比重，而且要在這種發展中保證受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我國在經濟上的獨立，使我國不致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品。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自己國內不能出產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如果停留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即不得不使國民經濟受制於那些出產並輸出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的階段，就不可能保持經濟上的獨立。停留在這個階段就等於讓自己隸屬於世界資本。

拿印度來說吧。誰都知道印度是一個殖民地。印度有沒有工業呢？無疑是有的。印度的工業不是在發展呢？是的，在發展。但是，那裏發展的是不出產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工業。那裏的生產工具是從英國輸入的。因此（當然不僅這一個原因），那裏的工業完全隸屬於英國的工業。這是帝國主義的特殊方法——在殖民地發展工業，使它受制於宗主國，受制於帝國主義。

由此可見，我國的工業化不能只了解為發展任何一種工業，比如說，發展輕工業，雖然輕工業及其發展是我們所絕對必需的。由此可見，工業化首先應當了解為發展我國的重工業，特別是發展我國自己的機器製造業這一個工業的神經中樞。否則就談不到保證我國在經濟上的獨立。

三 社會主義積累問題

可是，同志們，要推進工業化，就必須革新我們工廠的舊設備並建立新工廠。我們現在所處的我

國工業發展時期，其特點就是我們已經使沙皇時代資本家留給我們的舊工廠的設備能力充分利用了，而現在要繼續前進，就應該改進技術，就應該重新裝備舊工廠，建立新工廠。否則現在就無法前進。

同志們，要在技術基礎上革新我國工業，就需要大宗的、極大宗的資本。可是我們的資本很少，這是你們大家都知道的。今年我們對工業基本建設這一主要事業大約只能投資八億多盧布。這當然是很少的。但總算有了一些。這是我們對我國工業第一次較大的投資。我說這很少，因為我國工業隨便就可以吞下比這大幾倍的資本。我們必須推進我國工業。我們必須以儘快的速度擴大我國工業，把工人數量增加一兩倍。我們必須把我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而且愈快愈好。但是要做到這一切，就需要大宗的資本。

因此，積累資本以發展工業的問題，社會主義積累問題，現在對於我們就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我們專靠自己，不借外債，憑藉我國內部力量，究竟能不能保證我國工業擁有實行工業化方針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所必需的積累和後備呢？

這是一個應該特別注意的重大問題。

歷史上有過各種不同的工業化方法。

英國的工業化是靠數十年數百年掠奪殖民地，在那裏收集「追加的」資本，把它們投入本國的工業並加快自己工業化的速度來實現的。這是一種工業化方法。

德國由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對法戰爭的勝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業化。當時德國向法國人索取了

五十億法郎的賠款，把這筆賠款投入自己的工業。這是第二種工業化方法。

這兩種方法對我們都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們是蘇維埃國家，因為對殖民地的掠奪和以掠奪為目的軍事侵略都是和蘇維埃政權性質不相容的。

俄國，舊的俄國，在受奴役的條件下出讓經營權，在受奴役的條件下獲得貸款，它竭力用這種方法逐步爬上工業化的道路。這是第三種方法。但這是被奴役的或半被奴役的道路，是使俄國變成半殖民地的道路。這條道路對我們也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們進行了三年的國內戰爭，打退了所有的干涉者，並不是為了以後，在戰勝干涉者以後，自願地去受帝國主義者的奴役。

還有第四條工業化的道路，靠本國節約來發展工業的道路，即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列寧同志屢次指出這條道路是我國工業化唯一的道路。

那末，我國工業化是否可能靠社會主義積累來實現呢？

我國有沒有這種足以保證工業化的積累的來源呢？

是的，是可能的。有的，我國有這樣的來源。

我可以舉出這樣的事實，例如我國地主和資本家已因十月革命而被剝奪，土地、工廠等等已不屬於私人，而變成全民的財產了。幾乎無須證明，這個事實就是相當大的積累來源。

其次，我可以舉出這樣的事實，例如沙皇債務的廢除從我國國民經濟的肩上卸下了幾十億盧布的債務負擔。不應忘記，如果這些債務還存留下來，單是利息一項，我們每年就得付出幾億盧布，因

而使工業受到損害，使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受到損害。不用說，這種情況給了我們的積累事業以極大的便利。

我可以指出我們國有化的工業，它已經恢復起來，正在發展，並且提供進一步發展工業所必需的若干利潤。這也是積累的來源。

我可以指出我們國有化的對外貿易，它提供若干利潤，所以也是一種積累的來源。

可以舉出比較有組織的我們國營的對內貿易，它也提供一定的利潤，因而也是一種積累的來源。可以指出我們國有化的銀行系統這樣的積累槓桿，它提供一定的利潤，並盡力滋養我國的工業。

最後，我們有國家政權這樣的武器，國家政權支配着國家預算，並為整個國民經濟、尤其為我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積聚若干資金。

我國內部積累的主要來源大體上就是如此。

它們的意義就在於它們使我們有可能建立必要的後備，沒有這種後備，我國工業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同志們，可能性還不是現實性。如果不善於辦事，在積累的可能性和實際的積累之間就會有相當大的距離。因此，我們不能以僅有可能性為滿足。如果我們真想為我國工業建立必要的後備，我們就應當把社會主義積累的可能性變成實際的積累。

由此就產生一個問題：必須怎樣進行積累才能使工業得到好處呢？我們首先必須抓住經濟生活中的哪些關鍵才能把積累的可能性變成實際的社會主義積累呢？

積累的道路很多，其中必須指出的主要道路至少有下列幾條：

第一、爲了把國內餘資首先用在工業的需要上，必須不讓它分散，而讓它集合到我們合作社的和國營的信貸機關中，同時要採用發行國內公債的辦法。自然，存戶因此應得到一定的利息。決不能說我們這方面的情況多少是令人滿意的。改善我們的信貸網，提高信貸機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發行國內公債等等，顯然是我們當前的任務，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加以解決。

第二、必須嚴密地堵塞一切使國內一部分餘資流入私人資本的腰包因而損及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和漏洞。爲此必須實行一種使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不太懸殊的價格政策，必須採取一切辦法來降低工業品和農產品的零售價格，使餘資不再流入私商腰包，或至少使它減到最低限度。這是我們經濟政策中最重要問題之一，因爲從那裏會產生一種既有害於我們積累的事業又有害於切爾文的嚴重危險。

第三、爲了企業折舊、擴大企業和進一步發展企業，必須在工業本身，在工業每個部門中，積存一定的儲備。這件工作是必需的，是絕對需要的，無論如何必須加以推進。

第四、國家手中必須積蓄爲防備國家遭受任何意外（歉收），爲滋養工業、扶助農業、發展文化等等所必需的一定後備。現在沒有後備是不能生活和工作的。就連一個從事小經營的農民現在也非有一定的儲備不可，一個地廣人多的大國更非有後備不可。

我們在對外貿易方面首先需要有後備。我們需要把我們的出口和進口經營得使國家手中能保持

一定的後備，保持一定的對外貿易出超。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這不僅可以防備國外市場上的意外事情，而且是維持我們切爾文的手段。我們的切爾文暫時是穩定的，但是，如果我們不能達到對外貿易出超的話，它還可能波動。加強我們的輸出，使我們的輸入和輸出的能力相適應，——任務就是如此。

我們不能像舊時那樣地說：「自己吃不飽，也得要輸出。」我們不能說這樣的話，因為工人和農民要像人樣地吃飯，而我們在這一點上是完全支持他們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在不損害人民消費的條件下採取一切辦法使我國輸出增加，使國家手中能保有一定的外匯儲備。我們一九二三年能由蘇維埃紙幣進到穩定的貨幣，其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當時由於我國對外貿易出超而有一定的外匯儲備。如果我們想維持我們的切爾文，我們今後也應當把對外貿易事業經營得使我國手中能保有外匯儲備，作為我們切爾文的基礎之一。

其次，我們在國內貿易方面需要有一些後備。我所指的主要是國家手中要有糧食後備去干預糧食市場，以便跟那些肆意抬高農產品價格的富農和其他糧食投機者作鬥爭。即使為了防止各工業中心日用品的價格被人為地抬高和工人工資被破壞的危險，這也是必要的。

最後，我們需要這樣的稅收政策：把捐稅負擔轉嫁到有產階層的肩上，同時在國家預算方面使國家手中擁有一定的後備。我們四十億盧布的國家預算執行的進程表明，我們能達到收入超過支出大約一億或者更多些。同志們當中有人覺得這個數字太大。可是這些同志的眼光大概太短了，否則，他們會看到一億盧布的後備對於我們這樣的國家只是滄海一粟。有些人認為我們根本不需要這種後

備。好吧，如果我們今年遭到歉收或受到其他什麼災害，那怎麼辦呢？我們將靠誰的資金來周轉呢？要知道別人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白白給我們幫助的，所以我們必須有自己的一點儲備。如果今年不發生意外事情，我們就可以把這筆後備用於國民經濟事業，首先是用於工業。放心吧，這些後備是不會沒有用處的。

同志們，爲了把我國工業化所必需的國內積累的可能性變爲實際的社會主義積累，在我們經濟生活中首先必須抓住的幾個關鍵大體上就是如此。

四 積累的正當利用。節約制度

但是問題不只限於並且不能只限於積累，還要善於合理地、節省地支出積累起來的後備，使人民的財產一個錢也不白費，使積累主要用在滿足我國工業化最迫切需要的方面。沒有這些條件，我們所積累的資金就有被貪污的危險，就有被分散地使用在和發展工業、推進整個國民經濟毫無關係的各種大小開支上去的危險。善於合理地、節省地支出資金，——這是極其重要的藝術，並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決不能說，我們，我們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在這方面是特別高明的。恰恰相反，所有的材料都說明，我們在這方面還差得遠。同志們，承認這一點是很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是用任何決議都掩蓋不了的。有時我們的管理機關真像這樣一個農民：積蓄了一點錢，但不用這點錢去修理犁

頭，去改進自己的經營，却買了一架大留聲機，結果……破產了。至於所積累の後備被直接貪污的事實，我們許多國家機關大肆揮霍的事實，偷竊的事實等等，我就不說了。

因此，必須採取一系列的辦法來保護我們的積累不被分散，不被貪污，不被挪用在不必要的用途上，不離開我國工業建設的基本路線。

第一、必須使我國工業計劃不是按照官僚主義的臆想而是密切聯系我國國民經濟狀況、聯系對我國資源和後備的估計來制定的。不能在制定工業設計計劃上落後於工業發展。但也不能向前跑得太遠，脫離農業，不顧我國的積累速度。

我國國內市場的需求和我國資源的規模——這就是我國工業擴展的基礎。我國工業是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就這方面來說，我國的經濟發展很像美國，而不同於英國，因為美國工業是在國內市場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而英國工業首先是以國外市場為基礎的。英國許多工業部門的產品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輸往國外市場的。美國則相反，它一直以國內市場為基礎，其產品輸出國外市場的不過百分之十至十二。比起美國工業來，我國工業將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國內市場，首先是依靠農民市場。這就是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的基礎。

關於我國積累的速度，關於我們握有的用以發展我國工業的後備，也應該這樣說。我們有些人有時喜歡制定空想的工業計劃，而不顧我們的資源。人們有時忘記了，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資金，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後備，就不能制定工業計劃，也不能建設任何『規模宏大』和『包羅萬象』的企

業。他們忘記了這一點，向前跑得太遠了。在制定工業計劃上向前跑得太遠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不量力地建設。這就是高喊宏大計劃，招收成千上萬的工人到生產中來，大嚷大叫，到後來發現資金不夠，就解散工人，發遣散費，於是遭受極大的損失，給建設事業帶來失望，造成政治上丟臉的事情。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嗎？不，同志們，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既不需要落在工業發展進程的後面，也不需要向前跑得太遠。我們需要和工業發展在同一水平上前進，我們需要推進工業而又使它不脫離自己的基礎。

我國工業是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領導因素，它帶領着、它引導着我國國民經濟（包括農業）前進。它依照自己的面貌和模樣改組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它領導農業，通過合作社把農民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但是我國工業，只有在不脫離農業，只有在不撇開我國積累的速度，不撇開我們所握有的資源和後備的情況下，才能光榮地完成這個領導和改造的使命。軍隊中的指揮人員如果脫離自己的軍隊並失去跟它的聯系，就不再成其為指揮人員了。同樣，工業如果脫離整個國民經濟並失去同它的聯系，也就不再成其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因素了。

正確而合理地制定工業計劃是適當利用積累的必要條件之一，其理由就在這裏。

第二、必須自下而上地精簡並健全我們國家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我們各人民委員部的機關和經濟核算機關。我們管理機關的編制龐大和揮霍無度已成為大家談話的資料。難怪列寧曾幾十次幾次重複說，工人和農民忍受不了我們國家機關的機構臃腫和開支浩繁，無論如何要用一切辦法和一

切手段來加以精簡。最後，應該以認真的態度，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從事這種工作，實行極嚴格的節約制度。（鼓掌）最後，如果我們今後不願使我國的積累分散從而損害工業，就應該擔當起這項工作來。

這裏給你們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有人說我們的糧食輸出是無利的，不合算的。爲什麼這是無利的呢？因爲收購機關在收購糧食上花費了過多的錢。我們一切計劃機關查明，收購一普特糧食只需八個戈比。實際上呢，收購一普特所花的不是八個戈比而是十三個戈比，多花了五個戈比。怎麼會弄成這樣呢？因爲每個比較獨立的收購人員，共產黨員或非黨員都是一樣，在着手收購糧食以前，都認爲必須擴充自己的工作人員名額，添用大批速記員和打字員，一定要置備一輛汽車，造成一大筆非生產的開支，等到後來結賬時，才發現我們的輸出是不合算的。假如我們收購了幾億普特糧食，每一普特多花五個戈比，那末浪費的錢就達幾千萬盧布了。如果我們不採取最嚴厲的措施來對待我們國家機關的大肆揮霍的現象，我們積累起來的資金就會這樣花掉，而且將來還會這樣花掉。

我在這裏只舉了一個例子。但是誰不知道這樣的例子我們有幾百個幾千個呢？

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精簡我們的收購機關。全會通過的與此有關的決議（五），你們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決議已經在報刊上發表了。我們將十分嚴格地執行這個決議。但是，同志們，這還是不夠的。這只是我們國家機關的混亂狀況和缺陷的極小部分。我們應當更進一步，應當採取辦法來自下而上地精簡整個國家機關，各人民委員部的機關和經濟核算機關，所有的合作社機關和整個

商品流轉網。

第三、我們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來反對我們管理機關中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鋪張現象，反對我們這裏最近可以看到的對人民財產和國家後備所採取的犯罪的態度。我們這裏現在盛行着一種放蕩風氣，就是毫無節制地慶祝各種節日，舉行各種慶祝大會、紀念典禮、紀念碑揭幕式等等。幾萬幾十萬盧布白白糟蹋在這些『事業』上。各色各樣被紀念的對象和盛大儀式的愛好者在我們這裏如此之多，紀念半周年、周年、二周年等等典禮的心願如此之大，要滿足這種需要，真得有幾千萬盧布才行。同志們，應該結束這種共產黨員所不應有的放蕩行爲了。最後，應該明白，我們背後既有我國工業方面的需要，面前又有大批失業和兒童流離失所的事實，自然就不能容許而且沒有權利容許這種放蕩行爲和這種毫無節制的浪費行爲。

最值得注意的是非黨羣衆有時還比黨員更愛惜我們國家的資財。共產黨員在這種場合的行動是更勇敢更堅決的。他毫不在乎地發給許多職員補助金，稱之爲分紅，雖然這裏並沒有什麼紅利氣味。他毫不在乎地逾越法律，迴避法律，違犯法律。非黨羣衆在這方面倒是較爲小心較爲審慎的。這大概是共產黨員有時認爲法律、國家等等東西都是家裏事情的緣故。（笑聲）正因爲如此，有些共產黨員有時就不費什麼氣力，像豬一樣地（同志們，請原諒我這樣說）跨進國家菜園，在那裏飽吃一頓，或者是拿國家資財來表示自己的慷慨。（笑聲）同志們，應該消滅這種不成體統的現象了。如果我們想真正保存我們的積累以應我國工業的需要，那就應該展開堅決的鬥爭來反對我們管理機關和我們日

常生活中的放蕩行爲和鋪張浪費。

第四、我們必須和盜竊行爲，和我們國家機關、合作社、工會以及其他機關裏所謂『快樂的』盜竊行爲進行不斷的鬥爭。像報刊上所說的，有羞怯的隱蔽的盜竊行爲，也有勇敢的『快樂的』盜竊行爲。不久以前我在『青年團真理報』上讀了奧庫涅夫關於『快樂的』盜竊行爲的短文。原來有這樣一個瀟灑放肆的傢伙，一個留着小鬍子的年輕人，他在我們的一個機關裏快樂地進行盜竊，他經常地、不停手地進行盜竊，並且總是盜竊到手。在這裏值得注意的並不是盜賊本人，而是這樣的事實：周圍的公衆明明知道他是盜賊，可是不僅不和他鬥爭，反而覺得可以拍拍他的肩膀，稱讚稱讚他的手法高明，因而盜賊在公衆眼裏成了一種英雄。同志們，這是值得注意的，這是最危險的。當捉到一個奸細或叛徒的時候，公衆有無限的憤怒，都要求槍決他。可是當盜賊公然橫行，盜竊國家財產的時候，周圍的公衆却只是和善地笑笑，拍拍他的肩膀。其實很明顯，盜賊既然盜竊人民的財產，損害國民經濟的利益，也就是奸細和叛徒，甚至比奸細和叛徒還壞。當然，這個留着小鬍子的瀟灑放肆的傢伙終於被逮捕了。但是逮捕一個『快樂的』盜賊有什麼意思呢？這樣的盜賊在我們這裏何止千百。單靠國家政治保衛局是不能把他們全部除盡的。這裏必須採取另外的辦法，採取更有效更認真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在這些小偷周圍造成公衆普遍的道德抵制和憎恨的氣氛。這種辦法就是在工人和農民中間掀起一個運動，造成一種道德氣氛，使盜竊行爲絕無發生的可能，使盜竊和貪污人民財產的分子，不論『快樂的』或『不快樂的』，都不能生活並存在下去。和盜竊行爲作鬥爭是保護我們的積累不被貪污

的手段之一，——任務就是如此。

最後，我們必須進行一個運動來消滅工廠裏的曠工現象，提高勞動生產率，鞏固我們企業中的勞動紀律。曠工現象使工業喪失幾萬以至幾十萬個工作日。因此，白白地丟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盧布的工業，我們就不能提高工資。應該向工人們特別是向才進工廠不久的工人們說明，要是聽憑曠工現象存在而不提高勞動生產率，他們實際上就是損害共同事業，損害整個工人階級，損害我國工業。爲了我國工業的利益，爲了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必須對曠工現象作鬥爭，爭取提高勞動生產率，——任務就是如此。

爲了保護我們的積累和我們的後備不被分散，不被貪污，爲了使這些積累和這些後備用在我國工業化方面，其必需的辦法和手段就是如此。

五 要造就工業建設幹部

我已經講過工業化的方針，講過積累後備來開展工業化的道路，最後，講過合理地使用積累來滿足工業的需要的辦法。但是，同志們，這一切還是不够的。要實現黨關於我國工業化的指示，除了這一切以外，還必須造就新的幹部，新的工業建設幹部。

任何一種任務，特別是像我國工業化這樣的巨大任務，如果沒有活的人，沒有新的人材，沒有新的建設幹部，那就不可能實現。從前，在國內戰爭時期，我們特別需要建軍和作戰的指揮幹部，需要團長和旅長、師長和軍長。沒有這些出身下層和因為有才幹而提升起來的新的指揮幹部，我們就不能建立軍隊，我們就不能戰勝我們的許許多多的敵人。是他們這些新的指揮幹部當時挽救了我們的軍隊和我們的國家，——當然這是在工人和農民共同支持之下的。但是我們現在是處在工業建設時期。現在，我們已從國內戰爭的戰綫轉到工業戰綫了。與此相適應，現在我們需要新的工業指揮幹部，需要優秀的工廠經理，優秀的托拉斯領導幹部，能幹的貿易工作人員，聰明的工業設計計劃人員。現在我們需要鍛鍊出經濟方面和工業方面新的團長和旅長、師長和軍長。沒有這樣的人材我們就不能進一步不能前進。

因此，任務就在於從工人和蘇維埃知識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運和工人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並且跟我們一道建設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的蘇維埃知識分子——隊伍中，造就大批的工業建設幹部。

任務就在於造就這樣的幹部並把他們提拔到重要的崗位上，給他們一切幫助。

近來我們老是愛斥責經濟工作人員，說他們腐化墮落，而且愛把個別不好的現象推廣到一切經濟工作幹部身上。無論是誰，只要他高興，往往就會認為必須把經濟工作人員痛罵一頓，斥責他們犯了萬惡不赦的罪過。同志們，應該把這種惡劣習慣永遠拋掉。要知道，醜事家家有。要知道，我國工

業化和提拔新的工業建設幹部的任務，不是要求責罵經濟工作人員，恰恰相反，而是要求在我國工業建設方面給他們一切幫助。使經濟工作人員處在信任和支持的氣氛中，在造就新的工業建設人材方面幫助他們，使工業建設者的崗位成為光榮的社會主義建設崗位，——這就是我們黨組織的工作現在應有的方向。

六 要提高工人階級的積極性

由於我國採取了工業化方針而擺在我們面前的最近任務就是如此。

沒有工人階級的直接幫助、直接支持，能不能實現這些任務呢？不，不能。推進我國工業，提高工業生產率，造就新的工業建設幹部，正確地進行社會主義積累，合理地使用積累來滿足工業的需要，建立極嚴格的節約制度，整頓國家機關，使它精簡廉潔，清除國家機關在我國建設時期所沾染的惡習和污穢，經常對貪污和浪費國家財產的人作鬥爭，——所有這些任務，如果沒有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直接的和經常的支持，任何政黨都是不能解決的。因此，任務就在於吸引千百萬非黨工人羣衆來參加我國的全部建設工作。需要使每個工人和每個誠實的農民都幫助黨和政府實行節約制度，對貪污和分散國家後備的現象作鬥爭，驅逐戴着各種假面具的盜賊和騙子，健全並精簡我們的國家機關。在這方面生產會議給予不可估價的幫助。有一個時候，生產會議在我國非常盛行，不知道爲什麼，現在

却不聽說了。同志們，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無論如何要使生產會議活躍起來。在生產會議上需要提出的不僅是小問題，比方說，衛生問題。必須使生產會議討論的內容更廣泛些，更豐富些。應該在生產會議上提出工業建設的基本問題。只有用這樣的辦法才能提高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的積極性，才能使他們成爲自覺的工業建設的參加者。

七 要鞏固工農聯盟

但是在談到提高工人階級的積極性時，也不可把農民忘掉。列寧教導我們說，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這是我們不應當忘記的。發展工業，實行社會主義積累，實行節約制度，——所有這些任務，如果不加以解決，我們就不能戰勝私人資本並消滅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困難。但是，如果沒有蘇維埃政權存在，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這些任務就一個也不能解決。而無產階級專政是依靠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的。因此，如果我們破壞或削弱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我們的一切任務就會懸在空中。

我們黨內有一些人把勞動農民羣衆看成異類，看成工業的剝削對象，看成我國工業的殖民地之類的東西。同志們，這些人是危險的人。對於工人階級來說，農民既不能是剝削對象，也不能是殖民地。農民經濟是工業的市場，正像工業是農民經濟的市場一樣。但農民對於我們不僅是市場，而且是

工人階級的同盟者。正因為如此，農民經濟的提高，農民的普遍合作化，農民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是一種前提，沒有它就不能保證我國工業有較大的發展。反過來說，發展工業，生產農業機器和拖拉機，以大量工業品供給農民，又是一種前提，沒有它就不能推進農業。這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極重要的基礎之一。因此，我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見，他們時常要求用過多增加稅收、提高工業品價格等辦法來加緊壓榨農民。我們不能同意他們，因為他們是在不自覺地破壞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動搖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所要做的是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而不是破壞這種聯盟。

但是我們所捍衛的不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任何一種聯盟。我們所主張的是領導作用屬於工人階級的這種聯盟。為什麼呢？因為沒有工人階級在工農聯盟體系中的領導作用，被剝削的勞動羣衆就不可能戰勝地主和資本家。我知道有些同志是不同意這一點的。他們說，聯盟是好事情，但是，為什麼還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呢？這些同志大錯特錯了。他們錯了，因為他們不懂得只有久經考驗和最革命的階級即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工農聯盟才能取得勝利。

為什麼普加喬夫或拉辛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失敗了呢？為什麼當時農民沒有能够把地主趕走呢？因為他們沒有而且當時也不可能像工人階級這樣的革命領導者。為什麼法國革命是以資產階級勝利和早先被趕走的地主的返回而結束呢？因為當時法國農民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像工人階級這樣的革命領導者，——當時領導農民的是資產階級自由派。我們國家是世界上工農聯盟戰勝了地主和資本家的唯一國家。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過去領導並且現在繼續領導我國革命運動的是在戰鬥中久

經考驗的工人階級。只要破壞我們的工人階級領導權這一思想，工農聯盟就會完全垮台，資本家和地主就會重回自己的老巢。

正因爲如此，我們應當保持並鞏固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

正因爲如此，我們應當保持並鞏固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體系中的領導。

八 要實行黨內民主

我已經講過提高工人階級積極性的問題，講過吸引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來參加我國經濟建設事業、參加工業建設事業的問題。可是提高工人階級積極性是一件嚴肅而重大的事情。要提高工人階級積極性，首先必須使黨本身積極起來，必須使黨本身毅然決然走上黨內民主的道路，必須使我們的各級組織吸引那些決定我們黨的命運的廣大黨員羣衆來參加我國建設問題的討論。否則就談不到工人階級的積極化。

我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爲我們的列寧格勒組織不久以前經歷了這樣一個時期，當時某些領導者不願談黨內民主，不然就是帶着嘲笑的口吻來談它。我所指的是黨代表大會即將舉行時，代表大會期間以及代表大會剛開完之後的那個時期，當時在列寧格勒不許黨組織集會，當時黨組織的某些領導者對於黨組織儼然一個小警長（請原諒我的直率），禁止黨組織開會。以季諾維也夫爲首的所謂『新

反對派』就是在這一點上碰了釘子的。

如果說，我們中央委員們在列寧格勒積極分子幫助下，兩周內就能把你們這裏那個反對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決議的反對派擠到一邊並使它孤立，那末，這是由於代表大會決議的解釋運動符合民主趨向，這種趨向在列寧格勒組織內曾經有過，它竭力要表現出來，而且終於表現出來了。同志們，我希望你們接受不久以前的這個教訓。我希望你們接受這個教訓，忠實而堅決地實行黨內民主，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吸引他們來討論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問題，並說服他們相信我們黨中央四月全會所通過的決議的正確性。我所希望的就是你們要說服黨員羣衆，因為說服的方法是我們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

九 要保護黨的統一

有些同志認為黨內民主就是各派別集團的自由。在這一點上，同志們，那可要請原諒了！我們不是這樣理解黨內民主的。黨內民主和派別集團的自由之間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共同之處。

黨內民主是什麼呢？黨內民主就是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並加強黨的統一，加強黨內自覺的無產階級紀律。

派別集團的自由是什麼呢？派別集團的自由就是瓦解黨的隊伍，把黨分裂為各個中心，削弱黨，

削弱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裏，它們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我們黨內有一些人，他們在睡眠中也夢見全黨展開了爭論。我們這裏有一些人，他們不能想像黨會沒有爭論，他們滿想得到職業爭論家的頭銜。讓這些職業爭論家離開我們這些吧！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臆造出來的爭論，不是把我們黨變成爭論的俱樂部，而是加緊我們的整個建設工作，特別是加緊工業建設，把堅定而滿懷信心地領導我國建設工作的黨，戰鬥的團結的統一而不可分割的黨鞏固起來。誰力圖進行永無止境的爭論，誰力圖爭取派別集團的自由，誰就是破壞黨的統一，誰就是損害我們黨的實力。

我們過去的强大是靠什麼，我們現在的强大又是靠什麼呢？就是靠正確的政策和我們隊伍的統一。正確的政策已由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給我們制定出來了。現在任務就在於保證我們隊伍的統一，保證我們黨的統一。我們黨決心不顧一切來實行黨代表大會的決議。

我們黨中央全會的決議的意義基本上就是如此。

一〇 結 論

現在讓我來做結論吧。

第一、我們應當推進我國工業，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引導整個國民經濟前進的領導力量。

第二、我們應當造就新的工業建設幹部，因為他們是工業化方針的直接執行者。

第三、我們應當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積累的速度，應當積累後備以應我國工業的需要。

第四、必須正確使用積累起來的後備，並建立最嚴格的節約制度。

第五、必須提高工人階級的積極性，並吸引千百萬工人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第六、必須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以及工人階級在這一聯盟中的領導。

第七、必須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實行黨內民主。

第八、我們應當保護並鞏固我們黨的統一、我們隊伍的團結。

我們是否能完成這些任務呢？是的，能完成，只要我們願意這樣做。而我們是願意這樣做的，這一點大家都看得出來。是的，能完成，因為我們是布爾什維克，因為我們不怕困難，因為困難的存在就是爲了讓人跟它作鬥爭並克服它。是的，能完成，因為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知道我們是在往哪裏走。我們堅定地滿懷信心地向着目標前進，向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前進。

同志們！九年以前，一九一七年二月，我們在列寧格勒是一個小小的集團。年老的黨員都記得，我們布爾什維克當時在列寧格勒蘇維埃中佔極小的少數。年老的布爾什維克應當記得，當時布爾什維主義的許許多多敵人都譏笑我們。但是我們前進了，奪取了一個陣地又一個陣地，因為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是以團結的隊伍來進行鬥爭的。後來這個小小的力量發展成一個偉大的力量。我們

粉碎了資產階級並推翻了克倫斯基。我們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我們粉碎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我們從我國境內趕走了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強暴者。我們克服了經濟破壞狀態。最後，我們恢復了我國的工業和我國的農業。現在，我們面前擺着一個新任務——我國工業化的任務。最嚴重的困難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可以懷疑我們能完成我國工業化這個新任務呢？當然不可以。相反地，我們現在有一切條件來克服困難並實現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向我們提出的新任務。

同志們，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在新的工業戰綫上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熱烈鼓掌）

載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列寧格勒真理報』第八十九號

致卡岡諾維奇同志和烏克蘭共產黨（布） 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

（五）

我和舒姆斯基談了一次話。談話時間很長，繼續了約兩個多鐘頭。你們知道，他是不滿意烏克蘭的現狀的。他不滿意的理由可以歸結爲下列主要的兩點：

一、他認爲烏克蘭化進行得很勉強，大家把烏克蘭化看做一種負擔，執行起來勁頭不大，執行時間拖得很長。他認爲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知識界發展得非常快，如果我們不掌握這個運動，它就會不按照我們的方向去發展。他認爲領導這個運動的人應當對烏克蘭文化事業有信心，懂得並且願意懂得這種文化，擁護並且能夠擁護日益高漲的爭取烏克蘭文化的運動。他特別不滿意在他看來是阻撓烏克蘭化的烏克蘭的黨和工會上層領導的行爲。他以爲黨和工會上層領導的主要過錯之一在於他們不吸引那些跟烏克蘭文化有直接聯系的共產黨員參加領導黨和工會的工作。他以爲烏克蘭化首先應該在黨的隊伍內和無產階級中間推行。

二、他以爲要改正這些缺點，首先必須從烏克蘭化的觀點來改變黨和蘇維埃上層領導的成分，只

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使我們烏克蘭工作幹部向烏克蘭化方面轉變。他建議提升格林柯担任人民委員會主席，提升邱巴爾担任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政治書記，改善書記處和政治局的成分等等。他以爲如果沒有這樣或類似的改變，他舒姆斯基今後就無法在烏克蘭工作。他說，如果中央堅持，那末，即使目前工作條件照舊不變，他也準備回烏克蘭去，但他確信這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特別不滿卡岡諾維奇的工作。他認爲卡岡諾維奇確實安排好了黨的組織工作，不過他覺得卡岡諾維奇同志在工作中主要是採用組織方法，因而使得工作不能正常進行。他肯定說，卡岡諾維奇同志在工作中使用組織壓力，對最高蘇維埃機關和這些機關的領導者採用排擠方法，其後果在最近的將來就會顯現出來，同時他不担保這些後果不會成爲嚴重的衝突。

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下：

一、在舒姆斯基的第一點聲明中具有若干正確的思想。說廣泛的爭取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社會人士的運動在烏克蘭已經開始並在發展，這是對的。說無論如何不能把這個運動交給異己分子，這是對的。說烏克蘭許多共產黨員不了解這個運動的意義和作用，因而沒有設法掌握它，這是對的。說必須改變我們黨和蘇維埃的工作幹部在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社會人士問題上仍舊在透露着的那種譏諷和懷疑的情緒，這是對的。說應該細心地選拔並造就能够掌握烏克蘭新運動的幹部，這是對的。這一切都是對的。但同時舒姆斯基至少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

第一、他把我們黨的機關和其他機關的烏克蘭化跟無產階級的烏克蘭化混爲一談。在保持一定

速度的條件下，我們爲人民服務的黨機關、國家機關和其他機關可以而且需要烏克蘭化。但是決不能從上面使無產階級烏克蘭化。決不能強迫俄羅斯工人羣衆放棄俄羅斯語言和俄羅斯文化，而把烏克蘭文化和語言認做自己的文化和語言。這是跟各民族自由發展的原則抵觸的。這不是民族自由，而是一種獨特形式的民族壓迫。無疑地，隨着烏克蘭工業的發展，隨着烏克蘭工人從城郊的鄉村流入工業，烏克蘭無產階級的成分將發生變化。無疑地，烏克蘭無產階級的成分將要烏克蘭化，正像拉脫維亞和匈牙利無產階級的成分一個時期具有德國人性質而後來也開始拉脫維亞化和馬札兒化一樣。但這是一個長期的、自發的、自然的過程。企圖從上面以強制無產階級烏克蘭化的辦法來代替這個自發的過程，這就等於實行一種空想而有害的政策，這種政策會在烏克蘭境內非烏克蘭的無產階級階層中引起反烏克蘭的沙文主義。我覺得舒姆斯基沒有正確了解烏克蘭化，而且沒有注意到這後一種危險。

第二、舒姆斯基強調在烏克蘭爭取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社會人士的新運動的積極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沒有看到這個運動的陰暗面。舒姆斯基沒有看到，在烏克蘭本地共產黨員幹部力量薄弱的情況下，這個往往由非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領導的運動就會在某些地方帶有使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社會人士離開全蘇聯文化和全蘇聯社會人士的性質，帶有反對一般「莫斯科」、反對一般俄羅斯人、反對俄羅斯文化及其最高成就——列寧主義——的性質。我不想證明這種危險在烏克蘭是愈來愈成爲現實的了。我只想說，甚至某些烏克蘭共產黨員也不免犯這種毛病。我指的是大家都知道

的一件事，即著名的共產黨員赫維列沃依在烏克蘭報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赫維列沃依要求在烏克蘭『立即使無產階級非俄羅斯化』，他主張『烏克蘭詩歌應當儘快地擺脫俄羅斯文學及其風格』；他說『就是沒有莫斯科的藝術，我們也知道無產階級思想』；他迷戀着烏克蘭『青年』知識分子的什麼救世主的作用；他懷着使文化脫離政治這種可笑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企圖——現在這個烏克蘭共產黨員所唱的這一切和許多類似的調子，聽起來是（不能不是！）非常奇怪的。正當西歐各國無產者和他們的共產黨都對『莫斯科』、對這個國際革命運動和列寧主義的堡壘深表同情的時候，正當西歐各國無產者都懷着讚美的心情仰望飄揚在莫斯科的旗幟的時候，烏克蘭共產黨員赫維列沃依却號召烏克蘭活動家『儘快地』擺脫『莫斯科』，除此以外竟沒有講一句擁護『莫斯科』的話。這也叫做國際主義！如果共產黨員都開始講赫維列沃依這樣的話，而且不僅在口頭上講，甚至還在我們蘇聯報刊上寫文章，那末，關於其他非共產主義陣營中的烏克蘭知識分子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舒姆斯基不懂得，在烏克蘭要掌握爭取烏克蘭文化的新運動，只有反對共產黨員隊伍中的赫維列沃依的極端行動才有可能。舒姆斯基不懂得，只有和這種極端行動作鬥爭才能把日益增長的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社會人士變成蘇維埃文化和蘇維埃社會人士。

二、舒姆斯基斷言烏克蘭的上層領導（黨的和其他的）都應當烏克蘭化，這是對的。但是他在速度方面却錯誤了。而這一點現在是主要的。他忘記了要完成這一事業，純粹烏克蘭族的馬克思主義幹部暫時還不夠。他忘記了不能勉強造就這樣的幹部。他忘記了這樣的幹部只能在工作進程中成長

起來，爲此就需要時間……現在提升格林柯担任人民委員會主席是什麼意思呢？全黨，特別是黨的幹部會怎樣估計這件事呢？他們不會把它了解爲我們採取降低人民委員會作用的方針嗎？因爲格林柯的黨齡和參加革命的年限比邱巴爾短得多，這是瞞不過黨的。現在，在活躍蘇維埃、提高蘇維埃機關作用的目前時期我們能不能採取這樣的步驟呢？爲了工作，爲了格林柯，暫時放棄這樣的計劃不是更好嗎？我贊成增加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以及蘇維埃上層領導中的烏克蘭人成分。但是決不能把事情說成好像黨和蘇維埃的領導機關裏面就沒有烏克蘭人似的。斯克雷普尼克和查東斯基、邱巴爾和彼得羅夫斯基、格林柯和舒姆斯基，他們難道不是烏克蘭人嗎？舒姆斯基在這裏的錯誤就是：他雖然對將來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沒有注意到速度。可是速度現在是主要的。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次全文刊印

關於英國罷工和波蘭事件

(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在梯弗里斯鐵路總工廠
工人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讓我來報道英國發生罷工^{〔舊〕}的情況和波蘭最近的事件^{〔善〕}吧。大會主席齊赫澤同志樂意把這個報道叫做報告，可是它只能叫做報道，不能有別的叫法，因為它很短。

英國為什麼發生罷工？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英國罷工的原因。英國這個資本主義勢力雄厚、最富於妥協性的國家，近來怎麼會變成了最大的社會衝突的舞台呢？『大英帝國』、『海上霸王』怎麼會變成了總罷工的國家呢？

我想指出決定英國必然爆發總罷工的幾種情況。詳盡地回答這個問題還不到時候。可是指出決定罷工必然爆發的某些具有決定性的事件，我們是能夠的而且是必須的。從這些情況中可以指出主要的四種：

第一、早先英國在資本主義國家行列中是佔壟斷地位的。它握有許多大塊的殖民地，擁有當時最完備的工業，它有可能自命爲『世界工場』並攫取大量的超額利潤。這是英國的『和平繁榮』時代。資本攫取了超額利潤，超額利潤的零頭落入英國工人運動的上層分子的腰包，英國工人運動的首領逐漸爲資本所馴服，而勞資衝突則通常以妥協方式解決。

但是世界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德國和美國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的發展（它們都是英國在國際市場上的新競爭者）根本破壞了英國舊日的壟斷地位。戰爭和戰後的危機又給英國的壟斷地位一個決定性的打擊。超額利潤減少了，落入英國工人首領腰包的零頭快要沒有了。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下降的呼聲愈來愈頻繁了。『和平繁榮』的時代已爲衝突、同盟歇業和罷工的時代所代替了。英國工人開始左傾，愈來愈頻繁地採取和資本直接鬥爭的方法了。

不難了解，在這種情勢下，英國礦主以同盟歇業相威脅的粗暴叫喊，是不會不引起煤礦工人的反應的。

第二、第二種情況是國際市場聯系的恢復和由此而來的各資本主義集團奪取市場的鬥爭的尖銳化。戰後危機的特徵是它幾乎破壞了國際市場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所有聯系，而以國際關係中的某種混亂代替了這些聯系。由於資本的暫時穩定，現在這種混亂退到次要的地位，而國際市場原來的聯系就逐漸恢復起來了。幾年以前的問題是如何恢復工廠並吸引工人爲資本工作，現在的問題則是如何爲恢復起來的工廠保證市場和原料。因此，奪取市場的鬥爭更加尖銳了，而在這個鬥爭中佔上風的是

那些商品較爲低廉、技術較爲高明的資本家集團和資本主義國家。市場上現在出現了一些新力量：美國、法國、日本、德國、英國的自治領、英國的殖民地，它們在戰爭期間發展了自己的工業，現在正進行着奪取市場的鬥爭。既是這樣，現在英國要像歷來那樣輕而易舉地從國外市場攫取利潤自然就不可能了。壟斷地掠奪市場和原料產地的舊殖民方法，必須讓位給以廉價商品佔有市場的新方法了。因此，英國資本竭力縮減生產，至少是不籠統地擴大生產了。因此，英國工人大批失業成了最近幾年來的經常現象。因此，失業的威脅使英國工人皇皇不安，並推動他們走上戰鬥的道路。因此，同盟歇業的威脅飛快地激動了全體工人，特別是煤礦工人。

第三、第三種情況是英國資本力求以犧牲英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來降低英國工業產品的成本，減低商品價格。煤礦工人成了目前主要打擊的對象，這一事實決不能認爲是偶然的。英國資本所以進攻煤礦工人，不僅因爲煤炭工業技術裝備很壞而需要『合理化』，而且首先因爲煤礦工人過去和現在一直是英國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制服這支先進部隊，減低工資，延長工作日，爲的是把這個基本部隊壓制下去以後再去對付工人階級的其他部隊，——這就是英國資本的戰略。因此，英國煤礦工人英勇地舉行了罷工。因此，英國工人以無比的決心舉行總罷工支援煤礦工人。

第四、第四種情況是保守黨在英國執政。這個黨是工人階級最兇惡的敵人。不用說，任何其他資產階級政府，在鎮壓工人階級這一點上的所作所爲，基本上也會和保守黨政府一樣。可是同樣不容懷疑，只有像保守黨人這樣的工人階級的死敵才會如此輕易地無恥地以同盟歇業的威脅手段向整個英

國工人階級進行史無先例的挑戰。英國保守黨不但歡迎同盟歇業和罷工，而且爲這件事準備了將近一年，這一點現在必須認爲是完全得到證明了。它延遲了去年七月對煤礦工人的進攻，認爲時機『不適宜』。可是它在這一整個時期進行了準備，貯藏了煤炭，組織了工賊，相應地製造了社會輿論，以便在今年四月打擊煤礦工人。只有保守黨才會採取這種陰險的辦法。

保守黨靠偽造的文件和挑釁的手段鑽進了政府。它在執政後的第一天就利用一切挑釁的手段進攻埃及。它使用屢試有效的殖民地掠奪和壓迫的方法對中國人民直接作戰已有一年了。它不惜採取各種手段使蘇聯人民和大不列顛人民無法接近，一步一步地準備可能的武裝干涉的因素。現在它在進攻本國的工人階級，它用了整整一年的工夫苦心孤詣地準備這種進攻。保守黨沒有英國國內外的衝突就不能過日子。既然如此，英國工人以打擊還打擊，又有什麼可驚奇的呢？

決定英國必然爆發罷工的幾種情況基本上就是如此。

英國總罷工爲什麼失敗了？

英國總罷工是由於許多種情況而遭受失敗的，其中應該指出的至少有以下幾種：

第一、正像罷工進程所表明的，英國資本家和保守黨比起英國工人及其領導者總委員會和所謂工黨來，一般是更有經驗，更有組織，更堅決，因而也是更有力量的。工人階級的領導者沒有担負得

起工人階級的任務。

第二、英國資本家和保守黨有把握地、有充分準備地迎接了這次大規模的社會衝突，而英國工人運動的首領們却沒有或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工作就突然受到礦主同盟歇業的襲擊。同時必須指出，在發生衝突前不過一個星期，工人階級的首領們還表示他們深信衝突不會發生。

第三、資本家的大本營保守黨團結一致地有組織地進行了鬥爭，在鬥爭的帶決定性的方面施以打擊，而工人運動的大本營工會總委員會及其「政治委員會」（工黨）內部却是墮落腐化的。大家知道，這個大本營的主要人物，不是英國煤礦工人和整個工人階級的公開叛徒（湯姆斯、韓德遜、麥克唐納及其伙伴），就是那些懼怕鬥爭尤其懼怕工人階級獲得勝利的叛徒的毫無氣節的同道者（柏塞爾、希克斯等人）。

有人會問，英勇無比地進行過鬥爭的強大的英國無產階級，他們的領袖怎麼竟不是出賣工人就是怯懦畏縮，或者簡直是毫無氣節的人呢？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這樣的領袖不是一下子產生出來的。他們是從工人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上過培養英國工人首領的一定的學校，上過那樣一個時期的學校，當時英國資本攫取到超額利潤，能够籠絡工人首領並利用他們來和英國工人階級取得和解；這些工人階級首領既然在生活和地位方面近似資產階級，也就脫離了工人羣衆，和工人羣衆背道而馳，不再了解工人羣衆了。就是這樣的工人階級的首領被資本主義的光輝晃得眼花撩亂，爲資本的威勢所壓倒，夢想『出人頭地』，夢想和『富裕的人』結成一體。毫無疑問，這些所謂首領是舊時代的渣滓，

已經不適合新環境了。毫無疑問，他們將來必定讓位給那些符合英國無產階級的戰鬥精神和英雄氣概的新領袖。恩格斯把這樣的舊首領稱為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級領袖^(卷三)是很對的。

第四、英國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保守黨懂得英國工人大罷工是一樁重大的政治事件，只有用政治手段才能對這種罷工進行嚴重的鬥爭，要鎮壓罷工，既必須利用英王的權威，又必須利用下院和憲法的權威，不動員軍隊和宣佈非常狀態，罷工是不可能鎮壓下去的。可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大本營總委員會却不懂得這種簡單的事理，或者不願意懂得它，或者不敢承認它，却硬要每個人都相信：總罷工僅僅是經濟方面的手段，總委員會不願意而且不打算把鬥爭轉上政治鬥爭的軌道，總委員會不想打擊英國資本的大本營保守黨，總委員會不打算把政權問題提到日程上來。

這樣一來，總委員會就使罷工必然遭到失敗，因為歷史證明總罷工不轉上政治鬥爭的軌道是必然要遭到失敗的。

第五、英國資本家的大本營懂得國際上給英國罷工的援助對於資產階級是一個致命危險，可是總委員會不懂得或者裝做不懂得只有在國際無產階級同情協助的條件下，英國工人的罷工才能獲得勝利。因此，總委員會拒絕了蘇聯工人的^(卷三)和其他國家工人的財政上的援助。

像英國總罷工這樣的大罷工，要想產生顯著的效果，至少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使罷工轉上政治軌道，使罷工變成一切先進國家的無產者和資本作鬥爭的行動。但是英國總委員會由於它所固有的特殊的『聰明』，放棄了這兩個條件，因而就註定了總罷工的失敗。

第六、毫無疑問，在援助英國總罷工方面，第二國際和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的極其曖昧的行爲起了相當壞的作用。其實這些社會民主黨組織對於援助罷工所做的空頭決議，就是事實上拒絕給予任何財政援助，因為歐洲和美洲的工會所給予英國兄弟的財政援助總共不過蘇聯工會所能給予的八分之一，這一事實除了用社會民主黨國際的曖昧行爲來解釋以外，是不能有別種解釋的。至於其他方面的援助，像停止運煤這樣的援助（在這方面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的行爲簡直和工賊一樣），我就不說了。

第七、同樣毫無疑問，英國共產黨的軟弱對於總罷工的失敗有相當大的關係。必須說，英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優秀的支部之一。必須指出，在英國罷工的整個期間，它的立場完全正確。但是也必須承認，它在英國工人中的威信還不高。而這一情況在總罷工進程中不能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這就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得清楚的，決定了英國總罷工的壞結局的一些情況，至少是其中主要的情況。

總罷工的教訓

英國總罷工的教訓，至少其中最重要的教訓是什麼呢？這些教訓可以歸結爲如下的幾點：

第一、英國煤炭工業的危機和由它引起的總罷工，正面地提出在建立工人監督的條件下在煤炭

工業方面實行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問題。這是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未必用得着證明，要根本克服煤炭工業的危機，除了英國共產黨提出來的辦法以外，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別的辦法的。煤炭工業的危機和總罷工使英國工人階級直接接觸到實際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

第二、英國工人階級不能不親身體驗到，在走向目的地的道路上主要的障礙是資本家的政權，在目前就是保守黨及其政府。既然工會總委員會像怕瘟疫一樣地怕承認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不可分的聯系，英國工人現在就不能不了解，在他們和有組織的資本進行艱苦的鬥爭中，政權問題就是現在的基本問題，不解決政權問題就不能克服煤炭工業的危機，也不能克服英國整個工業的危機。

第三、總罷工的進程和結局不能不使英國工人階級確信，國會、憲法、英王以及資產階級政權的其他表現形式不過是資本家階級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擋箭牌而已。罷工剝下了國會和憲法這類偶像和不可侵犯的聖物的外衣。工人會明白現今的憲法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工人的武器。工人不能不明白他們也需要工人自己的憲法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我以為領會這個真理對英國工人階級將是一個最大的收穫。

第四、罷工的進程和結局不能不使英國工人羣衆確信，舊的領導者是不中用的，在舊的英國妥協政策的學校裏成長起來的舊的領袖是不中用的。他們不能不明白必須以新的、革命的領袖代替舊的領袖。

第五、英國工人現在不能不明白，英國煤礦工人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因此，支持煤礦工

人的罷工並保證它獲得勝利是整個英國工人階級的事情。罷工的全部進程向英國工人階級指明這一教訓是絕對無可爭辯的。

第六、在總罷工的艱難時刻，在各種政黨的立場和綱領受到實際考驗的時候，英國工人不能不確信，能够徹底地、勇敢地、堅決地捍衛工人階級利益的唯一政黨就是共產黨。

英國總罷工的主要教訓大體上就是如此。

幾個結論

現在我來講講幾個有實踐意義的結論。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穩定局面問題。英國的罷工證明，共產國際關於穩定局面的暫時性和不鞏固性的決定^(五)是完全正確的。英國資本對英國煤礦工人的進攻是企圖把暫時的不鞏固的穩定局面變成鞏固的和永久的穩定局面。這一企圖沒有成功，而且也不可能成功。用大罷工來回答這一企圖的英國工人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表明，要在戰後時期的條件下建立資本主義的鞏固的穩定局面是辦不到的，像英國的這種試驗是包藏着摧毀資本主義基礎的危險性的。但是：如果說資本主義穩定局面已經鞏固的論點是不正確的，那末，與此相反的論點，說穩定局面已經結束，穩定局面已經消除，我們現在似乎已經進入了革命風暴最高漲的時期，也是不正確的。資本主義的穩定局面是暫時

的，不鞏固的，但畢竟是穩定局面，目前還存在着。

其次，正因為現在這種暫時的不鞏固的穩定局面還存在，所以資本今後還要力圖向工人階級進攻。當然，英國罷工的教訓一定會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表明，像保守黨在英國所作的這種試驗對於資本的生存有多麼大的危險。恐怕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懷疑這種試驗不會不給保守黨帶來惡果。同樣不能懷疑，全世界的資本家都會考慮這個教訓。雖然這樣，資本還是會企圖再向工人階級進攻的，因為它感到自己不鞏固，所以不能不感到有使自己更加鞏固的必要。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準備力量來回擊這種對工人階級的進攻。共產黨的任務就是今後要繼續組織工人的統一戰綫，竭盡全力把資本家的進攻變成工人階級的反攻，變成工人階級的革命進攻，變成工人階級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爭取消滅資本主義的鬥爭。

最後，爲了完成當前這些任務，英國工人階級首先必須擺脫他們現在的那些領導者。有了湯姆斯之流和麥克唐納之流的領袖，是不能和資本家作戰的。後方有了韓德遜和克萊因斯之類的叛徒，是不能指望勝利的。英國工人階級應當學會優秀的首領去代替這類首領，因爲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英國工人階級學會撤去湯姆斯之流和麥克唐納之流的職位，或者是他們永遠看不到自己的勝利，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樣。

同志們，這是自然而然得出的幾個結論。

現在讓我來講講關於波蘭事件的問題。

關於波蘭最近的事件

有人認為皮爾蘇茨基領導的運動是革命運動。據說皮爾蘇茨基擁護波蘭的革命事業，擁護農民，反對地主，擁護工人，反對資本公司，擁護波蘭各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反對波蘭的沙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據說，因此，皮爾蘇茨基值得共產黨人來支持。

同志們，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事實上，波蘭現在發生的鬥爭是兩個資產階級政派——以坡茲南派為首的大資產階級政派和以皮爾蘇茨基為首的小資產階級政派——之間的鬥爭。鬥爭的目的是為鞏固、穩定資產階級國家，而不是為保護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不是為保護被壓迫民族的利益。鬥爭是由於鞏固資產階級國家的方法不同而引起的。

問題在於波蘭這個國家已經進入徹底腐朽的階段。財政破產。茲羅蒂貶值。工業癱瘓。非波蘭民族備受壓迫。而在上層，在接近領導階層的各集團中，正像議會中一切派別^(註)的代表所公開談論的那樣，貪污之風非常盛行。因此，資產階級只好二者擇一：或者是讓國家繼續腐朽下去，結果促使工人和農民睜開眼睛，推動他們必然用革命的方法來改造政權以反對地主和資本公司；或者是資產階級應當趕快設法中止崩潰狀態，肅清貪污之風，從而及早防止工農革命運動的可能爆發。

現在，問題在於由哪一個資產階級政派担负穩定波蘭國家的工作——是皮爾蘇茨基派呢，還是坡茲南派？

毫無疑問，工人和農民是把根本改善自身狀況的希望和皮爾蘇茨基的鬥爭聯在一起的。毫無疑問，正因為如此，工人階級的和農民的上層分子無論如何都支持這個代表小資產階級和小貴族階級的皮爾蘇茨基去反對代表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坡茲南派。但是，同樣毫無疑問，波蘭勞動階級中的某些階層的希望，現在沒有被用在革命事業上，而被用在鞏固資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秩序上。

當然，某些外部的因素在這裏也起着作用。波蘭是一個不大的國家，它在財政方面是和協約國的某些集團有聯系的。它，資產階級的波蘭，處在目前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不借外債當然不行。但是所謂列強是不能貸款給一個連領導集團都一致承認整個國家機構中盛行貪污之風的國家的。爲了獲得外債，首先必須『改善』國家機構，遏止貪污之風，創造某些能够支付債款利息的保證，如此等等。因此必須使波蘭國家『合理化』。

引起波蘭兩個主要資產階級政派現在這場鬥爭的內部和外部的前提基本上就是如此。

波蘭目前有許多根本矛盾，這些矛盾再發展下去，必然要在波蘭造成直接的革命形勢。這些矛盾貫穿在三個主要方面：工人問題方面，農民問題方面，民族問題方面。如果波蘭要進行軍事冒險，如果它不能够和它周圍的國家建立善鄰關係，所有這些矛盾就會馬上暴露出來，並引起爆發。皮爾蘇茨基能不能、成分複雜的皮爾蘇茨基集團能不能解決這些矛盾呢？這個小資產階級集團能不能解決工

人問題呢？不，不能，因為它這樣做，就一定要和資本家階級發生根本的衝突；它既然不願失掉列強方面的財政援助，所以它就不會，無論如何也不會和資本家階級發生根本衝突。它，這個集團，能不能採取沒收地主土地那樣的方式來解決農民問題呢？不，不能，它既然不願使幾乎全由中小地主組成的皮爾蘇茨基軍隊的指揮機構完全瓦解，它就不會那樣做。它，這個集團，能不能給烏克蘭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等等被壓迫民族以民族自決的自由來解決波蘭的民族問題呢？不，不能，它既然不願在它自己存在的精神方面的主要來源——大波蘭沙文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的心目中失去任何一點信任，它就不會那樣做。

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出路呢？

出路只有一條：在軍事上戰勝大資產階級政派之後，政治上就服從這一個政派，做它的尾巴。當然，這是假定波蘭工人階級和波蘭農民中的革命部分最近期間不用革命方法改造波蘭國家，不驅逐波蘭資產階級的兩個政派——皮爾蘇茨基派和坡茲南派的。

因此就產生了關於波蘭共產黨的問題。怎麼波蘭大部分工人和農民的革命的不滿情緒竟有助於皮爾蘇茨基，而無助於波蘭共產黨呢？其原因之一是波蘭共產黨軟弱，非常軟弱，是它對皮爾蘇茨基的軍隊採取了不正確的立場而在這次鬥爭中更加削弱了自己，所以無法領導那些具有革命情緒的羣衆。

不久以前，我在我們蘇聯報刊上讀到了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台爾曼同志寫的一篇論波蘭

問題的文章(8)。台爾曼同志在這篇文章中談到波蘭共產黨人提出支持皮爾蘇茨基軍隊這一口號的立場，並批評這種立場不是革命的立場。很遺憾，我應當承認台爾曼同志的批評是絕對正確的。我應當承認我們的波蘭同志在這件事上犯了極大的錯誤。

同志們，關於英國發生總罷工的情況和波蘭最近的事件，我要向你們報道的就是這些。(熱烈鼓掌)

獻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

『東方曙光報』(梯弗里斯)

第一一九七號

對梯弗里斯鐵路總工廠工人歡迎詞的答詞

(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

同志們！首先讓我對工人代表們在這裏所致的歡迎詞表示同志的感謝。

同志們，我應當告訴你們，憑良心說，這裏對我的頌揚，我連一半也不敢當。原來我又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又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者，又是共產國際的領導者，又是神奇的勇士，又是什麼等等。同志們，這都是無謂的話，都是絕對不必要的誇張。這種話通常是在革命烈士靈前講的。但是我還不算死呢。

因此，我不得不追想一下真正的情形，看看我從前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及我今天在我們黨內所以得到這樣的地位應當歸功於誰。

阿拉凱爾同志^①在這裏說過，過去他認為我是一個老師，而我是他的學生。同志們，這是完全正確的。我過去的確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梯弗里斯鐵路工廠先進工人的一個學生。

① 即奧庫阿什維里。

讓我來談談過去吧。

我想起了一八九八年，當時我第一次接受一個鐵路工廠工人小組的工作。這是大約二十八年前的事情。我想起了我在司徒盧阿同志的家裏，在季布拉澤（他當時也是我的一個老師）、喬德利什維里、齊赫澤、波喬利什維里、尼努阿以及梯弗里斯其他先進工人面前，怎樣受到實際工作的初步教育。跟這些同志比較，我當時是一個年輕人。也許那時我讀的書比這些同志中的許多人稍微多一些。但是作為實際工作者來說，毫無疑問，我那時還是一個剛剛開始的人。就在這裏，在這些同志中間，我受到了第一次戰鬥的革命洗禮。就在這裏，在這些同志中間，我成了革命事業中的一個學徒。由此可見，我最初的老師是梯弗里斯的工人。

讓我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鼓掌）

其次，我想起了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當時黨派我到巴庫去工作。在石油工人中間的三年革命工作，把我鍛鍊成一個實際的戰士和實際的地方工作領導者。一方面，在和巴庫先進工人如瓦澤克、薩拉托維茨、菲奧列托夫等的交往中，另一方面，在工人和石油業主最激烈的衝突的風暴中，我第一次知道了領導廣大的工人羣衆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就在那裏，在巴庫，我受到了第二次戰鬥的革命洗禮。就在那裏，我成了革命事業中的一個幫工。

讓我向我的巴庫老師們表示由衷的感謝。（鼓掌）

最後，我想起了一九一七年，當時，我在經歷了牢獄和流放所的轉徙流離的生活以後，奉黨的命

令轉到了列寧格勒。就在那裏，在俄羅斯工人中間，在全世界無產者的偉大導師列寧同志身邊，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大搏鬥的風暴中，在帝國主義戰爭的環境下，我第一次懂得了做偉大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一個領導者是怎麼一回事。就在那裏，在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者和世界各國各民族無產階級鬥爭的急先鋒——俄羅斯工人中間，我受到了第三次戰鬥的革命洗禮。就在那裏，在俄羅斯，在列寧的領導下，我成了革命事業中的一個師傅。

讓我向我的俄羅斯老師們表示由衷的同志的感謝，並俯首默念我的偉大導師列寧。（鼓掌）

從學徒的稱號（梯弗里斯），經過幫工的稱號（巴庫）而到我國革命的一個師傅的稱號（列寧格勒），——同志們，這就是我學習革命的經歷。

同志們，如果毫不誇大地憑良心說，我原來是怎樣一個人以及我成了怎樣一個人的真正情形就是如此。（鼓掌，轉為熱烈歡呼。）

載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

『東方曙光報』（梯弗里斯）

第一一九七號

關於英俄統一委員會

(英二〇)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英三)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們正處於積聚力量的時期，爭取羣衆並組織無產階級進行新戰鬥的時期。但是羣衆在工會裏。而西方的工會，其中多數現在多少是反動的。那末，我們對這些工會怎麼辦呢？我們共產黨人應不應、能不能在這些反動的工會裏工作呢？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在『真理報』上發表的一封信，向我們提出的其實正是這個問題。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什麼新東西。早在托洛茨基之先，大約五年以前，德國的『極左派』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托洛茨基認為有必要把它重新提出來。他究竟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讓我來引托洛茨基信中的一段話吧：

『不列顛工人階級目前的全部「上層建築」，不分色彩和派別，毫無例外地都是阻礙革命的機構。這預示着：在長時期內，自發的和半自發的運動將壓迫舊的組織形式，並在這種壓迫的基

◎這裏刊載的是演說的摘要。

關於英俄統一委員會

礎上形成新的革命的組織。」（見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真理報』第一一九號）

這樣說來，如果我們不願意『阻礙』革命，就不應當在『舊的』組織內工作。或者這裏是說：我們已經處於直接革命形勢的時期，因此，我們應當立刻建立獨自行動的無產階級組織來代替『舊的』組織，代替工會。這當然是不對的，是愚蠢的。或者這裏是說：我們應當在『長』時期內用『新的革命的組織』來代替舊的工會。

這就是要組織『革命的工人聯合會』來代替現存工會的信號。關於這種『革命的工人聯合會』，大約五年以前，德國『極左派』共產黨人曾經談論過，而列寧同志在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曾堅決地反對過他們。這其實是要用『新的』、似乎是『革命的』組織來代替現在的工會的信號，因而也就是退出工會的信號。

這個政策是否正確呢？它是根本不正確的。其所以根本不正確，是因為它和列寧式的領導羣衆的原則相抵觸。其所以不正確，是因為西方的工會不管多麼反動，却是最基本的、為最落後的工人所最了解的，因而也是最有羣衆性的無產階級組織。撇開這些工會，我們就不能接近羣衆，我們就不能爭取羣衆。採取托洛茨基的觀點就等於把共產黨人接近千百萬羣衆的道路堵死，就等於把工人羣衆交給阿姆斯特丹⁽⁵⁾去任意宰割，交給查辛巴赫之流和烏捷格斯特之流⁽⁶⁾去任意宰割。

在這裏，反對派分子引證了列寧同志的話。讓我也來援引一下列寧的指示吧：

『德國左派所發表的那種莊重的、非常淵博的、極端革命的論調，說什麼共產黨人不能而且

不應在反動工會中工作，說什麼可以拒絕這種工作，說什麼必須退出工會，必須建立一種嶄新的、極純粹的、由非常可愛的（大概大部分都是很年輕的）共產黨人臆造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我們也不能不以為是一種幼稚可笑的胡說。」（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一頁至第三十二頁）

其次：

『我們和「工人貴族」作鬥爭，是代表工人羣衆進行的，是爲了吸引工人羣衆到我們這方面來；我們對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作鬥爭，是爲了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這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起碼最明顯的真理，那就是愚蠢。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以工會上層分子的反動性和反革命性爲理由，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在工會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造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行爲，這無異是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的最大效勞。』（同上，第三十四頁至第三十五頁）

同志們，我認爲在這裏解釋是多餘的。

這裏就產生了關於跳過西方工會的尚未根絕的反動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季諾維也夫搬到這裏的講壇上來的。他引證了馬爾托夫的話並且要人相信：不跳過的觀點，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容許跳過羣衆的落後性、跳過羣衆領導者的落後性和反動性的觀點，似乎是孟什維克的觀點。

同志們，我肯定說，季諾維也夫這種引證馬爾托夫的話的卑鄙醜態的手腕只證明一點：季諾維也

夫完全離開了列寧主義的路綫。

下面我就盡力來證明這一點。

一般地說，我們列寧主義者，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可以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運動，跳過羣衆的落後性，我們可以背向它們，撇開它們呢，還是我們應當在羣衆中不倦地進行反對這些現象的鬥爭來根絕這類現象？這是共產黨政策的基本問題之一，是列寧式領導羣衆的基本問題之一。反對派在這裏談到了列寧主義。讓我引證一下原著，引證一下列寧的話吧。

事情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當時列寧和加米涅夫發生爭論。列寧不同意加米涅夫過高估計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作用。但列寧也不同意托洛茨基過低估計農民運動的作用和『跳過』俄國的農民運動。請看列寧說的話吧：

『托洛茨基主義——「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的，決不可把它一筆勾銷。但它有兩部分。它的貧苦的部分是跟工人階級一道走的。』（見列寧的演說，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代表會議記錄第十七頁（六））

『如果我們說：「不要沙皇，而要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這就是躍過小資產階級。』（見列寧的演說，一九一七年四月全俄代表會議記錄第七十六頁（六））

其次：

「但是我們會不會有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陷入希望『跳過』尚未完成的（農民運動尚未失去作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走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危險呢？如果我說：『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末我就有這種危險。但是我說的不是這回事，而是另一回事……在我的提綱中，我絕對担保自己不會有陷入任何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農民運動或一般小資產階級運動的危險，不會有陷入任何以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為兒戲的危險，不會有陷入任何布朗基主義的冒險行動的危險，因為我會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經驗。」（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八頁和第二十九頁）

看來是清楚的了。這種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運動的理論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列寧是不同意這種理論的。他認為這是冒險的理論。

請再看從其他著作中引來的幾段話，這些著作是一位「很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寫的，他的姓名我暫時不想說出來，但他也是反對跳過理論的。

「在托洛茨基總是『跳過』的農民問題上，我們會犯極大的錯誤。現在我們有的將不是結合的萌芽，而是很嚴重的分離。」

◎ 蒼蠅是我加的。——斯大林。

關於英俄統一委員會

其次：

『這就是帕爾烏斯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基礎。這個「理論」基礎後來又改鑄成一些政治口號，例如「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這樣的口號。現在，我們經過了十五年的時間，在和農民結成聯盟的條件下奪得了蘇維埃政權以後的現在，這個口號聽起來是十分響亮的。不要沙皇！——好。工人政府——更好。但是，如果想起這個口號是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那末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都會同意：當時這個口號完全「跳過了」農民。』

其次：

『而「不斷論者」在一九〇五年會想強迫我們接受「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這個口號。那末，農民在哪裏呢？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裏，完全不了解並忽視農民的事實，豈不令人痛心嗎？如果這不是「跳過」農民又是什麼呢？』

其次：

『托洛茨基主義既然不了解農民在俄國的作用，既然在農民的國家裏「跳過」農民，也就更不能了解農民在國際革命中的作用了。』

你們要問：這些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和反對托洛茨基的跳過理論的聲色俱厲的引文的作者究竟是誰呢？這些聲色俱厲的引文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季諾維也夫。這些引文是從他的『列寧主義』一書和『布爾什維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一文中引來的。

一年以前，季諾維也夫懂得跳過理論是反列寧主義的，而現在，過了一年，他却不懂得這一點了，怎麼會這樣呢？他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他當時是所謂列寧主義者，而現在却不可救藥地一隻腳陷入了托洛茨基主義，另一隻腳陷入了施略普尼柯夫主義即陷入了『工人反對派』^(註)。他就是這樣在兩個反對派之間掙扎，現在又不得不借用馬爾托夫的話在這裏，在這個講壇上發言了。他發言反對誰呢？反對列寧。擁護誰呢？擁護托洛茨基分子。

你們看季諾維也夫墮落到什麼地步了。

有人會說，這一切所涉及的都是農民問題，和英國的工會無關。但是，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上面說到的關於跳過理論在政策上行不通的話，和英國的工會，一般說來，和歐洲的工會是有直接關係的，和領導羣衆的問題，和把羣衆從反動的改良主義首領影響下解放出來的方法問題是有直接關係的。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違背跳過理論，企圖跳過英國工會的落後性，跳過它們的反動性，竭力設法使我們在沒有英國工會的羣衆參加下從莫斯科去推翻總委員會。我們却肯定說，這種政策是愚蠢，是冒險主義；英國工會運動的反動首領是應當由英國工會的羣衆在我們的幫助下自己去打倒的，我們不應當跳過工會首領的反動性，而應當幫助英國工會的羣衆去根除這種反動性。

由此可見，一般政策和對工會羣衆的政策之間的聯系是絕對存在的。

關於這一點列寧有沒有指示呢？

請聽吧：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會乃是工人階級的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工會是工人由散漫無力進到初步階級聯合的過渡。當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羣衆聯成一個整體，聯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就不配享有這種稱號）開始成長的時候，工會必然要暴露一些反動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性，暴露一些不問政治的傾向和一些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通過工會，除了通過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協同動作，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別的發展道路，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頁至第三十三頁）

其次：

『懼怕這種「反動性」，企圖撇開它，跳過它，那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因為這等於懼怕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即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以及農民中最落後階層和羣衆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那種作用。』（同上，第三十三頁）

這就是跳過理論在工會運動方面的情形。

季諾維也夫最好不要借用馬爾托夫的話到這裏來發言。他最好對跳過理論默不作聲。這樣對他就會好得多。季諾維也夫用不着拿托洛茨基的名字來賭咒，我們本來就知道他已經離開列寧主義而

走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

同志們，托洛茨基的跳過工會的落後性、跳過工會運動的落後性、跳過一般羣衆運動的落後性的理論就是如此。

列寧主義是一回事，托洛茨基主義是另一回事。

這樣，我們就接觸到英俄委員會的問題了。在這裏有人說，英俄委員會是我國工會和英國工會的協定，聯盟。這是完全對的。英俄委員會是我國工會和英國工會的聯盟的表現，協定的表現，並且這個聯盟不是沒有政治性的。

這個聯盟給自己提出了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是建立我國工會和英國工會的聯系，組織反對資本進攻的統一運動，擴大阿姆斯特丹和英國工會運動之間現有的並且我們將盡力加以擴大的裂痕，以及準備必要的條件把改良主義者擠出工會並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

這個聯盟的第二個任務是組織廣泛的工人階級運動反對一般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具體說來，反對對我國的武裝干涉，特別是歐洲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對我國的武裝干涉。

關於第一個任務在這裏已經談得够詳細了。所以我不再談它。在這裏我想稍微談談第二個任務，特別是關於英國帝國主義者對我國進行武裝干涉的那一部分。有些反對派分子說，我國工會和英國工會聯盟的後一個任務不值一談，這個任務不是重要的任務。試問爲什麼呢？爲什麼不值一談呢？難道保衛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也是國際革命的堡壘和基地）的安全這樣一個任務，不是革命的

任務嗎？難道我國工會不依賴於黨嗎？難道我們主張我國工會獨立性？國家是一回事，工會是另一回事嗎？不，我們列寧主義者不贊成而且不能贊成這種主張。每一個工人，每一個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都應當關心保衛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使它免受武裝干涉。如果我國工會在這方面得到英國工會的支持，即使是改良主義的工會的支持，也是應當歡迎的，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那些認為我國工會不可以執行國家任務的人，他們的觀點是和孟什維主義的觀點相同的。這是『社會主義通報』⁽¹⁾的觀點。我們不能贊成這種觀點。英國反動的工會如果願意和我國革命的工會結成聯盟，反對本國反革命的帝國主義者，那末，為什麼不歡迎這個聯盟呢？我着重指出問題的這一方面，是爲了使我們那些力圖破壞英俄委員會的反對派終於了解他們是在幫助武裝干涉者。

總之，英俄委員會是我國工會和英國反動工會的聯盟，其目的是：第一、加強我國工會和西方工會運動的聯系並使西方工會運動革命化；第二、反對一般的帝國主義戰爭，具體說來，反對武裝干涉。但是，一般說來，能不能（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和反動的工會結成政治聯盟呢？一般說來，這樣的聯盟是不是共產黨人所能容許的呢？

這個問題突出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在這裏徹底加以解決。有一部分人認為政治聯盟是不可能的，——這些人就是我們的反對派分子。而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却認為這樣的聯盟是可以容許的。在這裏，反對派分子提到了列寧的名字。我們就來看看列寧的話吧：

『如果「純粹的」無產階級沒有被那許許多多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就是那些一半靠出賣勞

動力謀生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和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形形色色的過渡階層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自己內部沒有分爲發展程度不同的階層，沒有鄉土、職業以至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爲資本主義了。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覺悟部分，共產黨，就必須而且絕對必須對各種無產者集團、對各種工人政黨和各種小業主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辦法。全部問題就在於要善於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制勝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這種水平。」（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五頁至第五十六頁）

其次：

『至於說韓德遜之流、克萊因斯之流、麥克唐納之流、斯諾頓之流是不可救藥的反動派，這是正確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抓到自己手裏（其實他們寧願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權），說他們想依照資產階級的老一套方式來「實行管理」，說他們一旦抓到政權，他們的行爲必定和謝德曼之流、諾斯克之流一模一樣，這也是正確的。這些都說得對。但由此得出的結論決不是說支持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的革命家爲了革命的利益應該在國會方面給這些先生以相當的支持。』（同上，第六十二頁）

總之，在列寧看來，共產黨人和工人階級的反動首領的政治協定、政治聯盟是完全可能並且是可以容許的。

讓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記住這一點吧。

但是，我們究竟爲了什麼需要這樣的協定呢？

這是爲了能够接近工人羣衆，爲了啓發這些羣衆去認識他們的政治首領和工會首領的反動性，爲了使工人階級中左傾的、革命化的部分脫離反動的首領，所以也是爲了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戰鬥力。

因此，這樣的聯盟只有具備下述兩個基本條件才可以締結：保證我們有批評改良主義首領的自由，保證有使羣衆脫離反動首領的必要條件。

請看列寧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吧：

『共產黨可以向韓德遜之流和斯諾頓之流提議「妥協」，提議訂立選舉協定，向他們說：我們共同去反對勞合·喬治和保守黨的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投給共產黨人的票數（不是在選舉時，而是用特別的表決辦法）來分配國會中的議席，同時我們要保留鼓動、宣傳和政治活動的充分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去和他們結成聯盟，因爲這樣做就是叛變，英國共產黨人也絕對必須堅持並爭得揭發韓德遜之流和斯諾頓之流的充分自由，就像俄國布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十五年內）曾堅持過並爭得了揭發俄國的韓德遜之流和斯諾頓之流即揭發孟什維克的充分自由一樣。』（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六頁至第六十七頁）

其次：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也在內）必然要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動搖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蘇維埃制度之間，動搖於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之間，動搖於愛護工人和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等等。共產黨人的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種動搖，決不是忽視這種動搖；既然利用這種動搖，就要對那些傾向無產階級的分子實行讓步，當他們傾向的時候予以讓步，看他們傾向的程度來決定我們讓步的程度；同時却要和那些傾向資產階級的分子作鬥爭。由於我們運用了正確的策略，使孟什維主義在我國過去和現在日益瓦解，使頑固的機會主義領袖陷於孤立，使優秀工人、使優秀分子從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那裏轉到我們陣營裏來。』（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六頁）

這就是聯盟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和工會的反動首領的任何聯盟、任何協定都是不容許的。讓反對派也記住這一點吧。

試問，我國工會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列寧同志所談到的那些條件呢？

我認為是完全符合的。第一、我們完全保留批評英國工人階級改良主義首領的充分自由，並且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共產黨都更充分地利用了這個自由。第二、我們得以接近英國工人羣衆，加強我們和

○ 詹富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關於英俄統一委員會

他們的聯系。第三、我們正在順利地使英國工人階級的隊伍脫離反動的首領，並且已使一整批隊伍脫離了他們。我指的是煤礦工人脫離總委員會的首領。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這裏竭力避開關於俄英礦工柏林代表會議和他們的宣言的問題云云。然而這是近來最重要的事件。理查遜、庫克、斯密斯、理查茲是些什麼樣的人呢？是機會主義者，是改良主義者。他們中間有一些叫左派，另一些叫右派。由他們去吧！他們之中誰較左些，歷史自有定論。我們現在很難知道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我們已經使這些領導着一百二十萬罷工礦工的動搖的改良主義首領脫離了總委員會，並且使他們和我國工會連接起來了。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為什麼反對派對這一點默不作聲呢？我們政策的成功難道不使他們高興嗎？西特林現在寫道，他和總委員會都同意召開英俄委員會，這難道不是由於什瓦爾茨和阿庫洛夫把庫克和理查遜拉到了自己方面來，而總委員會怕和煤礦工人進行公開鬥爭，才不得不同意召開英俄委員會嗎？誰能否認這一切事實都是說明我們政策的成功，說明反對派政策的完全失敗呢？

總之，和工會反動首領結成聯盟是可以容許的。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聯盟是必要的。批評自由是第一個條件。我們黨在實現這個條件。使工人羣衆脫離反動首領是第二個條件。我們黨也在實現這個條件。我們黨是正確的。反對派是不正確的。

試問，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還要我們做些什麼呢？

他們要我們蘇聯工會或者是和英俄委員會決裂，或者是從這裏，從莫斯科去推翻總委員會。但

是，同志們，這是愚蠢的。要求我們從莫斯科撤開英國工會，撤開英國工會的事業，撤開英國工會的幹部，跳過他們，而從這裏，從莫斯科去推翻總委員會，——同志們，這難道不愚蠢嗎？

他們要求示威式的決裂。但是這樣做除了丟臉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這難道不容易理解嗎？倘若決裂，我們將失去和英國工會運動的聯系，把英國工會投入查辛巴赫之流和烏捷格斯特之流的懷抱，動搖統一戰線策略的基礎，使邱吉爾之流和湯姆斯之流大為稱快，而換來的除了丟臉不會有什麼別的，這難道不容易理解嗎？

托洛茨基的故作聲勢的政策所根據的，不是具體的人，不是在英國生活並進行鬥爭的具體的活工人，而是一種從頭到腳都革命的、理想的沒有血肉的人。只有愚蠢的人才會在政策上從理想的沒有血肉的人出發，這難道不容易理解嗎？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認為故作聲勢的政策，從莫斯科——只用莫斯科的力量——去推翻總委員會的政策是可笑的冒險的政策。

故作聲勢的政策是托洛茨基從他加入我們黨那天起的全部政策的特點。我們都記得，托洛茨基第一次運用這種政策是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時候，當時他不簽訂德俄和約而故作聲勢地反對和約，以為故作聲勢就可以把全世界的無產者發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是故作聲勢的政策。這種故作聲勢使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同志們，你們都知道得很清楚。這種故作聲勢幫助了誰呢？幫助了帝國主義者、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以及所有那些力圖扼殺當時還不鞏固的蘇維埃政權的人。

現在，他們還是建議我們對英俄委員會採用這種故作聲勢的政策。他們要求採用示威式的故作聲勢的決裂行動。但是，這種故作聲勢對誰有利呢？對邱吉爾和張伯倫有利，對查辛巴赫和烏捷格斯特有利。他們正希望這樣。他們正期待這樣。他們，查辛巴赫之流和烏捷格斯特之流希望我們對英國工人運動來一個示威式的破裂，從而促進阿姆斯特丹的事業。他們，邱吉爾之流和張伯倫之流希望決裂，這樣好使他們易於進行武裝干涉，使他們獲得有利於武裝干涉者的精神上的論據。

請看，我們的反對派分子是在幫助誰。

不，同志們，我們不能走這條冒險的道路。

但是，這就是『極左的』空談家的命運。他們的話倒是左的，而事實上却幫助了工人階級的敵人。向左邊走，却到了右邊。

不，同志們，我們不同意採取這種故作聲勢的政策，我們今天不同意，正像我們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時候不同意一樣。我們不同意，因為我們不願使我們黨變成我們敵人手中的玩具。

第一次載於斯大林『論反對派』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論文和演說）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費·捷爾任斯基

(悼費·捷爾任斯基)

繼伏龍芝之後，捷爾任斯基又逝世了。

列寧的老近衛軍又失去了一位優秀的領導者和戰士。黨又遭受了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

現在佇立靈前，回憶捷爾任斯基同志所經歷的全部路程——牢獄，苦役，流放，肅清反革命非常委員會，恢復被破壞的運輸業，建設年輕的社會主義工業，——就想用兩個字來形容他這沸騰的一生：燃燒。

十月革命使他站上艱鉅的崗位——肅清反革命非常委員會領導者的崗位。資產階級最仇恨的名字，莫過於捷爾任斯基這個名字了，因為捷爾任斯基用鐵臂回擊了無產階級革命敵人的歷次打擊。『資產階級的大災星』——當時人們這樣稱呼費里克斯·捷爾任斯基同志。

『和平時期』來到後，捷爾任斯基同志繼續他的沸騰的工作。捷爾任斯基同志燃燒般地整頓了被破壞的運輸業，後來担任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時又燃燒般地從事我國工業建設的工作。不知休息，不辭勞苦，勇敢地和困難作鬥爭，克服困難，把全部氣力、全部精力獻給黨所託付給他的事

業，——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爲了共產主義的勝利，他在工作中燃燒盡了。

永別了，十月革命的英雄！永別了，黨的忠實兒子！

永別了，爲我們黨的統一和強大而奮鬥的建設者！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載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真理報』第一六六號

關於英俄委員會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主席團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還在麥爾菲發言之前，聯共（布）中央就收到了英國共產黨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抗議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就英國總罷工問題所發表的著名宣言（*С*）。我覺得麥爾菲是在這裏重述這封信裏的論據。麥爾菲主要是提出一些形式方面的理由，其中一個理由是說所爭論的問題事先沒有和不列顛共產黨共同討論過。我承認麥爾菲的這一理由是有其根據的。共產國際的確有時事先沒有和不列顛共產黨中央商量就得做出決定。但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某些問題十分急迫，不可能立即和不列顛共產黨中央取得聯系等等。

至於麥爾菲所持的有關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及其宣言的其他理由和論據，那應當說是完全不正確的。

說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發表宣言是犯了形式方面的錯誤，因為它這樣做似乎就是担負了工會國際或共產國際的職責，——這種斷言是不正確的。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有權發表自己的宣言，正像任

何職工聯合會或其他聯合會有權發表自己的宣言一樣。怎能否認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這種起碼權利呢？

說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發表宣言是侵犯了工會國際或共產國際的權利，說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是遭到損失的受害的一方，——這種斷言更不正確。我應當告訴大家：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發表宣言是通知過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並得到它們同意的。其實就是這個緣故，無論工會國際或共產國際都沒有想到要責備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侵犯它們應有的權利。這樣，麥爾菲這次反對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實際上就是反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工會國際。

最後，麥爾菲說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對英國工會總委員會的批評以及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宣言似乎是對不列顛共產黨內部事務的『干涉』，說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是『一國的組織』，不應當進行這種『干涉』，——這種說法必須認為是完全不能容許的。非常遺憾，麥爾菲竟在這裏重述皮尤和柏塞爾在英俄委員會巴黎會議上所持的『論據』。皮尤、柏塞爾和西特林前幾天正是用這種『論據』來反對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代表團的。單是這一點就已說明麥爾菲是不對的了。不能由於形式方面的理由而忘記事情的內容、事情的本質。一個共產黨員是不能這樣做的。假如除了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以外，其他國家，例如法國、德國等『二國的』職工聯合會也批評了總委員會，那末英國礦工們的情況就會好得多，而總委員會的不正確的行動就會被揭露。應當認為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發表宣言批評總委員會並不是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犯了錯誤，而是它對英國工人立了功。

對於麥爾菲的報告我所要講的（主要是指事情的形式方面）就是這些。

既然這裏講的是事情的形式方面，那我本可以談到這裏為止。但問題在於麥爾菲所談的並不止於事情的形式方面。他之需要形式方面是爲了達到一些帶有非形式性的實質上的結果。麥爾菲的策略就是用形式方面的理由做掩護，利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實際工作中某些形式方面聯系得不好的情況，要在這裏達到一定的實質上的決定。因此，我不得不對麥爾菲的論據的實質說幾句話。

麥爾菲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大致說來，他要達到的是迫使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停止對總委員會的公開批評，迫使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默不作聲，『不干涉』『總委員會的事務』。

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或者我們的黨，或者共產國際，能不能答應呢？

不，不能。當總委員會設法使罷工的英國礦工陷於孤立並準備使他們遭受失敗的時候，迫使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默不作聲，那是什麼意思呢？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沉默會被怎樣理解呢？在這種情況下沉默，——這就是對總委員會的罪過默不作聲，對它的背叛行爲默不作聲。在總委員會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有着英俄委員會這個聯盟的情況下，對總委員會的背叛行爲默不作聲，這就是默默地贊成這種背叛行爲，因而也就是對全世界工人運動分担總委員會的背叛行爲的責任。假如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走上這條道路，假如它對總委員會的背叛行爲哪怕是片刻放棄公開的批評，那末，它就是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自殺，這還用證明嗎？

你們自己來判斷吧。五月裏總委員會停止總罷工，出賣了整個英國工人階級，特別是英國礦工。六七月裏總委員會沒有盡一點力去幫助罷工的礦工。不僅如此，總委員會反而竭盡全力準備使礦工遭受失敗並藉此懲罰『不聽話的』英國煤礦工人聯合會。八月裏總委員會的首領們在英俄委員會巴黎會議上拒絕討論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代表所提援助英國礦工的建議，雖然總委員會對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提出的這次會議的日程並沒有表示過反對。這樣，我們就看到了迷惑於腐朽的外交手腕的總委員會的一系列背叛行為。可是麥爾菲却要求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對於這一切醜惡行為閉眼不看，用沉默的封條封住自己的嘴！同志們，不，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不能走上這條道路，因為它不願意自殺。

麥爾菲認為：假如反對總委員會的宣言由工會國際這個國際組織來發表，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這個『一國的』組織發表一個短短的決議來擁護工會國際的宣言，那就會更適當些。從純粹形式的觀點來看，麥爾菲的方案是有若干主從層次的嚴整性的。從這種觀點來看，它是有若干根據的。但是從政治的觀點來看，麥爾菲的方案就經不起任何批評了。無須證明，就揭露總委員會和在政治上教育英國工人羣衆來說，麥爾菲的方案所能產生的政治效果還不及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宣言確已產生的效果的百分之一。因為工會國際在英國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名聲不像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那樣大，前者的聲望比後者低，因而前者的比重也就較後者小得多。由此可見，出面批評總委員會的正應當是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這個在英國工人階級心目中最有威信的機關。非這樣做不行，因為既要揭露總委

員會的背叛行爲，就應當打中要害。從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宣言在英國工人運動的改良主義首領中所引起的叫囂來看，可以確信地說，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是在打中要害了。

麥爾菲認爲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對總委員會的公開批評可能引起和總委員會聯盟的決裂，引起英俄委員會的破裂。我認爲麥爾菲是不對的。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正很積極地援助煤礦工人的時候，應當認爲英俄委員會的破裂是不可能的，或者幾乎是不可能的。其實就是這個緣故，任何人才都不像總委員會多數的代表柏塞爾和希克斯那樣懼怕英俄委員會的破裂。當然，不論柏塞爾或希克斯都會用決裂的危險來恫嚇我們。但是應當善於識別恫嚇和真正決裂的危險。

此外，還應該記住英俄委員會對於我們並不是目的本身。我們參加並留在英俄委員會裏不是無條件，而是有一定條件的，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有自由批評總委員會的權利，正像總委員會有自由批評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權利一樣。我們不能爲了情面，爲了無論如何要保持聯盟而放棄批評的自由。

聯盟存在的意義何在呢？在於組織盟員的共同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組織盟員的共同行動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爭取各國人民間的和平。如果盟員之一或聯盟一方的某些首領違背工人階級的利益，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從而使共同行動成爲不可能，那怎麼辦呢？難道需要讚揚他們這種錯誤嗎？可見需要互相批評，通過批評來消滅錯誤，以便恢復共同行動的可能性來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因此，英俄委員會只在批評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條件下才是有意義的。

有人說，批評會使工會中某些反動的首領信譽掃地。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壞處。如果使出資工人階級利益的舊首領信譽掃地，而代之以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新首領，那對於工人階級只會有好處。撤換這種反動的和不可靠的首領，而代之以沒有舊首領反動作風的優秀的新首領，撤換得愈快愈好。

然而，這並不是說，似乎一舉就能摧毀反動首領的威力，在短期內就能孤立他們並以新的革命的領袖代替他們。

某些冒牌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要做一個「革命的」手勢，只要來一個聾人聽聞的舉動，就足以摧毀反動首領的勢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和這種人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的。

另一些人認為：只要共產黨人制定出正確的路綫，就足以使廣大工人羣衆在轉瞬之間離開反動的改良主義者並在轉瞬之間團結到共產黨的周圍。這是完全不正確的。只有非馬克思主義者才會這樣想。事實上，從黨制定正確路綫到羣衆領會這條路綫並接受它作爲正確路綫，中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爲了使黨能領導千百萬羣衆，僅僅有一條正確的路綫還不夠，爲此還必須使羣衆根據本身經驗確信這條路綫的正確性，必須使羣衆接受黨的政策和黨的口號作爲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口號，並開始實行這個政策和口號。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具有正確政策的黨才能變成階級的真正領導力量。

不列顛共產黨在英國總罷工期間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可是爲什麼它沒有能够把幾百萬罷工的工人領導起來呢？因爲這些羣衆還沒有確信共產黨的政策正確性。而要使羣衆確

信黨的政策的正確性，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靠『革命的』手勢更不可能。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時間，需要毫不倦怠地積極努力地揭露反動的首領，對工人階級中的落後羣衆進行政治教育，把工人階級的新幹部提拔到前哨的崗位上去。

由此不難了解：爲什麼不能在轉瞬之間就消滅工人階級反動首領的威力，爲什麼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時間，需要毫不倦怠地教育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

但是，由此更不應得出結論說：需要把揭露反動首領的工作掩上幾十年，似乎不用絲毫得罪反動的首領，也不用觸犯情面的『神聖常規』，就會自然而然，自流地揭露他們。不，同志們，任何東西永遠不會『自然而然』來到。揭露反動的首領和在政治上教育羣衆是要你們共產黨員自己以及其他左翼政治家通過毫不倦怠的羣衆政治教育工作來進行的。只有這樣才能加速廣大工人羣衆的革命化。

最後，對於麥爾菲的報告還有一點意見。麥爾菲固執地指出英國工人運動獨有的特點、英國傳統的作用和意義，並且我覺得他還暗示說，由於這些特點，普通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在英國可能不適用。我覺得麥爾菲走上了危險的道路。當然，英國工人運動獨有的特點是存在的，並且一定要估計到這些特點。但是，把這些特點提高到原則並把它們當做工作的基礎，就是採取那些宣佈馬克思主義不適合於英國條件的人的觀點。我不認爲麥爾菲和那些人有什麼共同之處。可是我要說，他已接近把英國的特點提高到原則的那個界限了。

關於胡姆勃特的演說，現在來講兩三句。胡姆勃特反駁說：批評不應當空洞無物，無的放矢。這

是對的。但是這跟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什麼相干呢，它們的批評是十分具體的。對『黑色星期五』的英雄們⁽⁷⁾的批評是不是空洞無物呢？當然不是，因為現在，在『黑色星期五』已成歷史陳跡以後，人人都喜歡重複這個批評了。可是，既然如此，為什麼一定要把對總委員會首領在總罷工期間以及後來在煤礦工人進行罷工時的背叛行為的批評叫做空洞無物呢？這裏有什麼邏輯呢？難道總罷工期間的背叛行為比『黑色星期五』時期的背叛行為的危害性要小些嗎？

我反對胡姆勃特所提批評個人的方法，如果提出這種方法來作為基本方法的話。我認為我們對反動首領的批評應當從總的領導路線着眼，而不應當從這些首領的個人特點着眼。我不反對把批評個人當做次要的、輔助的手段來運用。但是我主張把原則路線作為我們批評的基礎。否則不會有原則性的批評，只會有無謂糾紛和私人爭吵，這就不能不降低我們批評的水平而對工作有所損害。

致美國工人黨中央機關報 『工人日報』編輯部

敬愛的編輯同志！請不要拒絕在貴報刊登下面的聲明。

八月十四日，紐約冒牌社會主義的周刊『新領袖報』(The New Leader)刊登了完全沒有指明出處的、捏造的、似乎是我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發表的演說(也是捏造的)的結論。

我不可能而且不高興去閱讀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報紙對蘇聯活動家的各種造謠報道，所以對於這一次資本家及其奴僕的報刊的謠言也就不會加以注意。

但是在這個捏造的結論發表了一個月以後，『新領袖報』打了一封電報給我，請我『證實美國報紙報道俄共中央會議的消息中所加在你身上的七月間對季諾維也夫的全部駁厲批評』。

這個報社自己欺詐地捏造了我的演說的『結論』，現在竟又胆敢裝出無罪的樣子來問我這一『結論』是否真實，我認為不能和這個報社通信，所以請求你允許我通過貴報作如下聲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新領袖報』所載關於『斯大林的結論』的報道，和我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無

論在內容上、形式上、語氣上都絕對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因此，這個報道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無知的捏造。 致

共產主義的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載於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工人日報』（美國芝加哥）

第三二〇號

本文第一次用俄文刊印

給斯列普柯夫的信

今天我在『真理報』（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第二三二號）上讀到你的文章。我認爲這是一篇好文章。但是其中有一個損害文意的不正確的地方。

你寫道，只在一年以前，托洛茨基『曾強調說，在我們這個技術落後的國家裏，我們能够建設社會主義，我們能够用我國內部的力量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新經濟政策軌道上的勝利進攻，對於這一點無產階級不應有絲毫懷疑』。接着，你把這個論點和斯米爾加『在我們這個技術落後的國家裏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論點對立起來，並下斷語說，斯米爾加和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有矛盾。這當然是不對的，因爲這裏並沒有矛盾。

第一、托洛茨基無論是在『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那本小冊子裏或是在後來寫的東西裏，都從來沒有說過我們能够在我們這個技術落後的國家裏建成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和建成社會主義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無論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都不否認，並且從來沒有否認過我們能够在我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因爲要否認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有目共睹的事實，那就是白癡行爲了。但是他們堅決否認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的論點。使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米爾加等人在這個問題上聯合起來的是他們都否認列寧的論點：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我們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¹⁾。使他們聯合起來的是他們都認爲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在歐

洲幾個主要國家內勝利時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把托洛茨基和斯米爾加對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看法對立起來是完全不正確的。

第二、如果要說得確切，那末應該說，托洛茨基從來沒有說過『在我們這個技術落後的國家裏……我們能够用我國內部的力量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新經濟政策軌道上的勝利進攻』。托洛茨基的『成長着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音樂』這句話是避免肯定地解答我國勝利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一種空洞的、外交式的搪塞之詞。托洛茨基在這裏是搪塞問題，而你卻把這種搪塞之詞當做真話。托洛茨基的另外一句話，說『既然講的是我國經濟的內部因素，那就毫無理由耽心發生什麼意外』，——這不是解答問題，而是怯懦地抹殺問題。托洛茨基可以說，我們正走向社會主義。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而且他既堅持現在的立場也就不會說：我們『能够用我國內部的力量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新經濟政策軌道上的勝利進攻』，因而，無須社會主義在歐洲幾個先進國家的預先勝利，我們也能够達到社會主義。然而，托洛茨基却屢次說過和你強加在他身上的相反的話。你只要回想一下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會（一九二六年）上的演說就行了。托洛茨基在那次全會上否認我國有可能發動為勝利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那種經濟進攻。

由此可見，你無意地粉飾了托洛茨基，也可以說你誹謗了他。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

第一次刊印

關於緩和黨內鬥爭的辦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在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演說)

如果撇開枝節問題，那就可以直接談到本題。

現在爭論的是什麼呢？是關於使反對派遭到失敗的這次黨內鬥爭的總結。掀起鬥爭的不是我們，不是中央，而是反對派。中央曾幾次勸告反對派不要進行爭論，中央曾在四月全會和七月全會上勸告反對派不要進行全國規模的爭論，因為這樣的爭論會使鬥爭尖銳化，會造成分裂的危險，會使黨和政府機關的正常工作至少要鬆懈兩個月左右。

一句話，現在的問題是要總結一下反對派所掀起的鬥爭並做出適當的結論。

無疑地，反對派是慘敗了。同樣很明顯，在黨的隊伍裏對反對派的憤慨正在增長。現在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保留反對派的首領們做中央委員。現在主要的問題就在這裏。讓支持施路普尼柯夫和梅德維捷夫的人們留在我們中央委員會裏是很難使人同意的。讓支持各色各樣的反對共產國際、反對我們黨的路特·費舍之流和烏爾邦斯之流的人們留在中央委員會裏是很難使人同意的。

我們是否願意把反對派的首領們保留在中央委員會裏呢？我想是願意的。但是要保留他們，他們就應當解散自己的派別組織，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和我們黨內外厚顏無恥的機會主義者劃清界限。如果反對派願意黨內和平，它就應當接受這些條件。

我們的條件是什麼呢？

第一點是公開聲明無條件服從黨機關的決議。看來，這一點不會受到反對派的特別反對。我們布爾什維克老早就這樣做的：如果黨內一部分人成為少數，他們就不僅服從多數的決議，不僅實行這些決議，甚至公開做報告來維護黨的決議。我們現在並不要求你們這樣做，我們不要求你們做報告來支持你們原則上不同意的立場。我們不要求，因為我們願意減輕你們處境的困難。

第二點是公開承認反對派的派別活動是錯誤的，對黨有害的。這難道不對嗎？如果派別活動沒有害處，那末，為什麼反對派分子要放棄派別活動呢？他們提議解散派別組織，放棄派別活動，答應號召自己的同道、自己的擁護者、自己派別組織的成員放下武器。為什麼？顯然因為他們默認派別活動是錯誤的，是不可容許的。那末，為什麼又不把這一點公開說出來呢？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求反對派公開承認他們最近時期的派別活動是不可容許的，是錯誤的。

第三點是要和奧索夫斯基之流、梅德維捷夫之流等等劃清界限。這個要求在我看來是絕對必要的。我個人現在不能想像，中央委員可以和奧索夫斯基（反對派曾投票反對開除他），或梅德維捷夫，或施路普尼柯夫結成聯盟。我們要反對派和他們劃清界限。這只會促進我們黨內的和平。

第四點是要和柯爾什、馬斯洛夫、路特·費舍、烏爾邦斯、韋柏等人劃清界限。爲什麼？第一、因爲這些人進行流氓式的鼓動來反對共產國際、反對聯共（布）、反對我們蘇維埃國家。第二、因爲這個所謂『極左的』而實際上是機會主義的派別組織的首領們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已被開除出黨和共產國際。第三、因爲他們死抓住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和它勾搭在一起。反對派和這種廢料的界限劃清得愈快，對反對派或對共產國際就愈好。

最後一點是不要支持共產國際各支部內各種機會主義集團所進行的反對共產國際路線的派別鬥爭。

聯共（布）中央的條件就是這些。

現在看看反對派提出的條件。

反對派要求中央委員會執行四點。

第一點是『宣傳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各項決定和其後黨的各項決議，應當從正面來進行，不要用孟什維主義等等來責備抱有不同思想的人』。這一點應當怎樣了解呢？如果反對派提議收縮中央反對派的宣傳，要中央委員會（譬如在即將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放棄闡明自己的反對派錯誤的原則路線，那我們是不能接受這一點的。但是，如果問題在於批評的語氣，那末，當然可以使語氣多少緩和一些。至於對反對派原則錯誤的批評本身，那末它在今後絕對還要保持不變，因爲反對派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原則錯誤。

第二點是關於有權在自己的黨支部內堅持自己的意見。這個要求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黨員過去就有而且永遠會有這種權利。自己的意見可以而且應當在支部內堅持，但不要堅持到把工作上的批評變成全國性的爭論。

第三點是對開除黨籍的人重新加以審查。中央並不願意把人開除出黨。開除他們是因為沒有別的辦法。就拿斯米爾諾夫來說吧，把他開除了，是在警告過他好幾次以後才開除的。如果他說他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他表現得忠誠老實，中央監察委員會是可以把決議緩和一些的。但是他不僅不忠誠老實，不僅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在自己的聲明中誣蔑黨。斯米爾諾夫既然有這樣的行為，顯然，他的問題是不能重新審查的。

一般說來，黨對於被開除但又不承認自己錯誤的那些人所做的決議是不能重新審查的。

第四點是『在代表大會以前反對派應有機會向黨陳述自己的見解』。反對派有這種權利是用不着說的。反對派不會不知道，根據黨章，中央在代表大會以前應當印發辯論專頁。反對派在這方面的要求不能叫做要求，因為中央並不否認在黨的代表大會以前有印發辯論專頁的必要。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

（提交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討論並經
代表會議通過和聯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綱（一九三〇））

目前時期的特點，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各國和我國之間的鬥爭日益複雜化，另一方面是我國內部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之間的鬥爭日益複雜化。

世界資產階級企圖在經濟上包圍我國，在政治上孤立我國，暗中封鎖我國，並因蘇聯工人援助西方戰鬥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而企圖對我國進行直接的報復，——這造成了外部的困難；我國由恢復時期過渡到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工業的時期，以及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之間的鬥爭因這一過渡而日益複雜化，——這又造成了內部的困難。

黨看到這些困難，並且能夠克服這些困難。黨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支持下，已經在克服這些困難，滿懷信心地引導着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但是，並非我黨所有的隊伍都相信有繼續前進的可能。我們黨內某些人（固然爲數很少）畏懼困難，因而感到疲倦，表現動搖，陷於絕望，滋長消沉的情緒，感染不相信無產階級創造力的心理，產生投降主義的思想。

在這種意義上說，目前的轉變時期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轉變時期。當時，一九一七年十月，複雜的環境和由資產階級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過渡的困難使黨內一部分人發生了動搖，產生了失敗情緒和不相信無產階級能夠取得政權並保持政權的心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現在，在目前的轉變時期，也和那時一樣，向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過渡的困難使我們黨內某些人發生動搖，產生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成分能夠戰勝資本主義成分的心理，不相信蘇聯能夠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心理。

反對派聯盟就是我們黨內一部分人中間存在這種消沉和失敗情緒的表現。

黨看到這些困難，並且能夠克服這些困難。但是，要戰勝這些困難，首先必須克服黨內一部分人中間的消沉情緒和失敗主義思想。

反對派聯盟在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文件中表示放棄派別活動，並和聯共（布）黨內外那些顯明的孟什維主義的派別劃清界限，但同時又聲明它仍保持自己原來的原則立場，堅持自己的原則錯誤，並將在黨章範圍內為這些錯誤觀點辯護。

由此可見，反對派聯盟今後還打算在黨內培植消沉情緒和投降主義思想，它今後還打算在黨內宣傳自己的錯誤觀點。

因此，黨的當前任務在於揭露反對派聯盟的基本觀點的毫無原則根據，說明這些觀點和列寧主義基礎絕不相容，並和反對派聯盟的原則錯誤進行堅決的思想鬥爭，以徹底克服這些錯誤。

一『新反對派』在我國革命性質和前途的 基本問題上轉向托洛茨基主義

黨の出發點是：我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不僅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而且第一、它是進一步展開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第二、它在蘇聯開始了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如果對農民實行正確的政策，無產階級就能够順利地而且一定順利地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還需要一方面國際革命運動的力量和另一方面蘇聯無產階級的力量都強大得足以保衛蘇聯免於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才行。

托洛茨基派對於我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持着完全不同的觀點。儘管托洛茨基派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跟着黨走的，但是它當時認為而且現在仍然認為實質上我國革命本身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只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如果世界革命延緩到來，西方的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最近時期及時發生，那末，俄國無產階級政權在無產階級和農民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的打擊下，一定會垮台或蛻化（二者都是一樣）。

黨在組織十月革命時の出發點是：『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

產』，就能够而且應當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相反地，托洛茨基派在十月革命時期雖和布爾什維克合作，其出發點却是：『……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頁，一九一七年八月第一次發表的『和平綱領』）

黨的出發點是：在蘇聯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論合作社』）；相反地，托洛茨基派的出發點却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三頁，一九二二年爲『和平綱領』所寫的『跋』）

黨的出發點是：『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見列寧『論糧食稅』一書綱要（七））；相反地，托洛茨基派的出發點却是：在世界革命勝利以前，無產階級不可能和農民保持正確關係，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不僅會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爲『一九〇五年』一書所寫的『序言』）。

代表會議確認：托洛茨基及其同道在我國革命性質和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的這種觀點，是和我們黨的觀點、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

代表會議認為：這種觀點降低作為進一步發展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的我國革命的歷史作用和比重，削弱蘇聯無產階級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並因此阻礙國際革命力量的發展，從而違反真正的國際主義原則和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

代表會議認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這些觀點是完全接近社會民主黨的觀點（以其目前首領奧托·鮑威爾為代表）的；奧托·鮑威爾硬說：『在無產階級僅佔人口極少數的俄國，無產階級只能暫時建立自己的統治』，『只要全國農民羣衆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無產階級就必然會重新喪失自己的統治』，『工業社會主義在農業俄國的暫時統治不過是號召工業西方的無產階級起來鬥爭的火燄』，『只有工業西方的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才能保障工業社會主義』在俄國的『長期統治』（奧·鮑威爾『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德文版）。

因此，代表會議認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這種觀點是我們黨內在我國革命性質和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斥責了『新反對派』的原則觀點的代表大會）以後，聯共（布）黨內關係發展的主要事實是：從前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我們黨內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新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已經轉到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立場上去了，他們放棄了自己以前和黨一致的那些觀

點，而完完全全投向托洛茨基主義了，他們現在擁護托洛茨基主義，就像他們從前反對托洛茨基主義一樣熱烈。

『新反對派』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是由兩種主要情況決定的：

(甲)『新反對派』分子面對目前轉變時期的新困難產生了疲倦、動搖以及無產階級所不應有的消沉情緒和失敗心理，並且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現在的動搖和失敗心理也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舊病復發，重複他們九年以前，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面對當時轉變時期的困難所表現的那種動搖和消沉情緒；

(乙)『新反對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完全失敗了，因此，它產生了一種意圖：無論如何要和托洛茨基派聯合起來，以便用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對派』的聯合去彌補這兩派的軟弱和脫離無產階級羣衆的缺點。而且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立場和『新反對派』目前的消沉情緒也是完全符合的。

也應該這樣來說明下面的事實：反對派聯盟已變成了聯共（布）黨內外的被黨和共產國際所斥責的、已經破了產的各式各樣派別的集合點，即從聯共（布）黨內的『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到德國『極左的』機會主義者和法國蘇瓦林之流取消派（*取消派*）的集合點。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在手段上的不加選擇和在政治上的毫無原則，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對派』聯盟存在的基礎，沒有這兩點他們就不能把各種各樣反黨派別糾合在一起。

因此，一方面托洛茨基派、另一方面『新反對派』就在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和各種各樣反黨分子

在反黨鬥爭中無原則聯合的共同立場上完全合乎規律地會合起來了，並形成一個類似在新形式下復活的八月聯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的反對派聯盟。

二 反對派聯盟的實踐綱領

反對派聯盟的實踐綱領就是它在我國革命性質和前途這一問題上的基本錯誤的直接繼續。

反對派聯盟的實踐綱領最重要的特點可以歸結爲下列主要幾點：

（甲）國際運動問題。黨的出發點是：一般說來，各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正處在局部的和暫時的穩定狀態；目前時期是兩次革命之間的時期，它責成各國共產黨組織無產階級去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資本因妄想鞏固穩定狀態而發動的進攻，不能不引起工人階級的回擊，不能不使工人階級的力量爲反對資本而團結起來；各國共產黨應當參與日益尖銳的階級鬥爭，並把資本的進攻轉變爲無產階級的反攻以取得無產階級專政；爲了達到這些目的，各國共產黨應當把至今還靠攏改良主義工會和第二國際的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爭取過來，因此，統一戰綫的策略是各國共產黨所必需的、非執行不可的。

反對派聯盟從完全不同的前提出發。反對派聯盟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並且看到世界革命延緩到來的情况而陷於絕望，於是從對革命中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立場滾到『極左的』自

欺和『革命的』冒險主義的立場，否認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狀態的存在，因而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

因此，反對派要求修改統一戰綫策略並解散英俄委員會，因此，它不了解工會的作用而提出以新的臆造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組織代替工會的口號。

因此，反對派聯盟支持共產國際內的（例如德國黨內的）『極左的』空喊家和機會主義者。

代表會議認為反對派聯盟在國際方面的政策是不符合國際革命運動的利益的。

（乙）蘇聯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黨的出發點是：『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護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頁）；無產階級能够而且應當在經濟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成爲基本農民羣衆的領導者，正像一九一七年十月在政治方面、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方面當過農民的領導者一樣；只有靠着逐漸改善大多數農民（貧農、中農）的物質生活狀況才能實現國家工業化，因爲農民是我國工業的主要市場；因此，應當實行鞏固工業和農業結合的、保持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聯盟的經濟政策（價格政策、稅收政策等等）。

反對派聯盟從完全不同的前提出發。反對派聯盟在農民問題上離開了列寧主義的基本路綫，不相信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對農民的領導作用，而且把農民主要是看做敵對的一羣人，於是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城鄉結合，破壞工農聯盟，從而摧毀真正工業化的任何可能性的經濟和財政措施。例如：（甲）反對派建議提高工業品的出廠價格，這種提高勢必引起零售價格的提高，貧農和大部

分中農的貧困化，國內市場容量的縮小，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糾紛，切爾文匯率的降低，最後引起實際工資的降低；（乙）反對派建議對農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賦稅壓榨，這種壓榨勢必在工農聯盟事業中造成裂痕。

代表會議認為反對派聯盟對農民的政策是不符合國家工業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

（丙）在反對黨內官僚主義的幌子下反對黨的機關。黨的出發點是：黨的機關和黨員羣衆是統一的整體，黨的機關（中央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區域組織、省委員會、州委員會、縣委員會、支部委員會等等）體現着整個黨的領導部分；黨的機關是由無產階級的優秀分子組成的，我們對於這些人的錯誤可以而且必須加以批評，對於這些人可以而且必須進行「刷新」，但是不能冒着瓦解黨並使黨解除武裝的危險去誣譏這些人。

相反地，反對派聯盟的出發點却是把黨員羣衆和黨的機關對立起來，它竭力降低黨機關的領導作用，把黨機關的領導作用縮小為登記員和宣傳員的職務，唆使黨員羣衆反對黨的機關，從而破壞黨機關的威信，削弱它在領導國家方面的地位。

代表會議認為：反對派聯盟的這種政策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它只能使黨在反對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爭取真正改造國家機關從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解除自己的武裝。

（丁）在爲黨內民主而鬥爭的幌子下反對黨內「制度」。黨的出發點是：「誰只要稍微削弱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頁）；黨內民主所以需要，不是爲了削弱並破壞黨內的無產階級紀律，而是爲了鞏固並加強這個紀律；如果黨內沒有鐵的紀律，如果黨內沒有靠着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同情和擁護來增強的堅固制度，那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

相反地，反對派聯盟的出發點却是把黨內民主和黨的紀律對立起來，把派別和集團的自由跟黨內民主混爲一談，並竭力利用這種民主來破壞黨的紀律和黨的統一。反對派聯盟旨在反對黨內『制度』的，實際上是保護黨內派別和集團的自由號召，自然就是被我國反無產階級分子當做擺脫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最後希望而拚命抓住的號召。

代表會議認爲：反對派聯盟的反對黨內『制度』的鬥爭和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毫無共同之處，它只能破壞黨的統一，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助長國內力圖削弱並破壞專政的反無產階級的勢力。

反對派聯盟選擇了全國性爭論的方法作爲破壞黨的紀律並使黨內鬥爭尖銳化的一種手段，今年十月該聯盟曾企圖強迫黨進行這種爭論。代表會議認爲在我們黨的理論雜誌上自由討論意見分歧的問題是必要的，並且承認每個黨員都有權自由批評我們黨的工作缺點，代表會議同時請大家注意列寧的一句話：我們黨不是爭論的俱樂部，而是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代表會議認爲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有進行全國性爭論的必要：（甲）至少黨的若干省級或區域級的地方組織承認有這種必要；（乙）中央內部在黨的政策各項最重要的問題上沒有十分穩定的多數；（丙）雖然中央有站在一定觀點上的穩定的多數，但是中央仍然認爲必須通過黨內爭論來檢查自己政策的正確性。而且即使在這一切情況

下，也只有中央做了相當的決議之後，全國性的爭論才能開始進行。

代表會議確認：在反對派聯盟要求展開全國性爭論的時候，這樣的條件一個也沒有具備。

因此，代表會議認為黨中央是完全正確的：它承認爭論是不適宜的，並且斥責了反對派聯盟企圖強迫黨在黨已經解決的問題上進行全國性爭論。

代表會議總結了對反對派聯盟實踐綱領的分析，確定這個綱領表明反對派聯盟在國際國內政策各項最重要的問題上離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路線。

三 反對派聯盟的『革命』言論和機會主義行為

反對派聯盟的特點是：它雖然事實上是我們黨內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表現，事實上在維護機會主義政策，却竭力以革命的詞句粉飾自己的行動，竭力『從左面』批評黨，竭力穿上『左的』外衣。這因為反對派聯盟主要是向共產主義無產者呼籲，而共產主義無產者是全世界無產者中最革命的，他們受過革命傳統精神的教育，根本不會傾聽明目張胆地從右面來批評黨的批評家的話，所以反對派聯盟爲了推銷自己機會主義的貨色，就不得不給這種貨色貼上革命的標籤，它很清楚，只有用這種詭計才能引起革命無產者對它的注意。

但是，因為反對派聯盟畢竟是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嚮導，因為它事實上在維護機會主義政策，所

以反對派聯盟的言論和行為必然是互相抵觸的。這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工作中的內部矛盾。這就產生了言論和行為的不一致，革命詞句和機會主義行為的不一致。

反對派「從左面」大叫大喊地批評黨和共產國際，同時提議修改統一戰綫策略，解散英俄委員會，脫離工會並以新的「革命的」組織來代替工會，以為用這一切辦法就可以推進革命，其實這樣做就會幫助湯姆斯和烏捷格斯特，使共產黨脫離工會，削弱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陣地，因而就會延緩革命運動。口頭上是「革命者」，事實上却是湯姆斯之流和烏捷格斯特之流的幫兇。

反對派「從左面」吵吵嚷嚷地「責罵」黨，同時要求提高工業品出廠價格，以為這樣就可以加速工業化，其實這樣做就一定會擾亂國內市場，破壞工業跟農業的結合，降低切爾文匯率，降低實際工資，因而就會破壞任何工業化。口頭上是工業化主義者，事實上却是工業化的敵人的幫兇。

反對派責備黨不願意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作鬥爭，同時建議提高出廠價格，大概以為提高出廠價格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問題沒有關係，其實這樣做就一定會使國家經濟機關完全官僚主義化，因為高額出廠價格是使工業凋敝、使工業變成溫室植物、使經濟機關官僚主義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口頭上反對官僚主義，事實上却是國家機關官僚主義化的保衛者和嚮導。

反對派大聲高喊反對私人資本，同時建議從流通中抽回國家資本而用於工業，以為這樣就可以摧毀私人資本；其實這樣做就會多方加強私人資本，因為把國家資本從私人資本的主要活動場所即流通中抽回，不能不使商業完全受私人資本支配。口頭上反對私人資本，事實上却是幫助私人資本。

反對派大叫黨的機關蛻化，事實上，當中央提出開除一個真正蛻化了的共產黨員奧索夫斯基先生的問題時，反對派却對這位先生表示最大的同情，反對開除他。口頭上反對蛻化，事實上却是蛻化的贊助者和保衛者。

反對派大叫黨內民主，同時要求全國性的爭論，以為這樣就是實現黨內民主，事實上却是反對派代表黨內極少數人強迫黨內極大多數人進行爭論，極粗暴地破壞了任何民主原則。口頭上擁護黨內民主，事實上却破壞任何民主的基本原則。

在我們所處的尖銳化的階級鬥爭時期，在工人運動中，只能在兩種可能的政策中實行一種：或者是孟什維主義政策，或者是列寧主義政策。反對派聯盟企圖在「左的」「革命的」詞句掩蓋之下，在加強抨擊聯共（布）的情況下佔據兩條對立路線之間的中間地位，這種企圖一定會使而且實際上已經使反對派聯盟滾到列寧主義敵人的陣營即孟什維主義的陣營裏去了。

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敵人知道反對派聯盟這種「革命」詞句的價錢。因此，他們不注意這種一文不值的詞句，而一致頌揚反對派聯盟的非革命行為，並抓住反對派反對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基本路線的口號當做他們自己的口號。下面這個事實絕不能認為是偶然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俄國孟什維克和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他們都認為可以對反對派聯盟反對我們黨的鬥爭公開表示同情，他們指望反對派聯盟的鬥爭會造成分裂，而分裂則會助長我國反無產階級的勢力，使革命的敵人拍手稱快。

代表會議認為黨必須特別注意揭穿反對派聯盟的『革命的』假面具，揭露它的機會主義本質。

代表會議認為黨必須像保護眼珠一樣保護自己隊伍的統一，認為我們黨的統一是防止革命敵人各式各樣反革命企圖的主要抗毒素。

四 結 論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在總結過去一個階段的黨內鬥爭時確認：黨在這次鬥爭中顯示了自己在思想上的顯著提高，毫不猶豫地擴大了反對派的原則觀點，迅速而徹底地戰勝了反對派聯盟，迫使它公開放棄派別活動，使它不得不和聯共（布）黨內外那些顯明的機會主義集團劃清界限。

代表會議確認：由於反對派聯盟企圖強迫黨進行爭論並破壞黨的統一，黨員羣衆就更加團結在中央的周圍，從而孤立了反對派，這樣也就保證了我們黨的隊伍的真正統一。

代表會議認為：只有在廣大黨員羣衆的積極支持下，中央才能獲得這樣的勝利；黨員羣衆在和反對派聯盟的破壞活動進行鬥爭時所表現的積極性和自覺性，是黨確實在真正黨內民主基礎上生存着並發展着的最好證明。

代表會議完完全全同意中央在保障統一的鬥爭中所執行的政策，並且認為今後黨的任務應當是下列各點：

(一) 務使已經取得的、爲黨的統一所必需的最低條件真正實現。

(二) 對我們黨內社會民主主義傾向進行堅決的思想鬥爭，向羣衆說明反對派聯盟原則觀點的錯誤，揭露這些觀點的機會主義內容，不管這些觀點是用什麼『革命的』詞句掩飾的。

(三) 力使反對派聯盟承認自己觀點的錯誤。

(四) 盡力保護黨的統一，制止各式各樣恢復派別活動並破壞紀律的企圖。

載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二四七號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聯共(布)第十五次

全國代表會議(卷上的報告)

一 反對派聯盟發展的幾個階段

同志們！報告中要涉及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反對派聯盟的形成，關於它的發展階段以及關於它已經開始崩潰的問題。爲了闡明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這一問題的本質，我認爲先談談這個題目是必要的。

早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季諾維也夫就發出糾合一切反對派別並把它們結成一個力量的信號。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同志們想必記得季諾維也夫的這一演說。毫無疑問，這樣的號召不會不得到托洛茨基派隊伍的響應，因爲托洛茨基分子一向主張派別應該有或多或少的自由並且應該適當地聯合起來，以反對早就爲托洛茨基所不滿的黨的基本路線。

這可以說是形成聯盟的準備工作。

一、第一階段

在中央四月全會（C）期間，由於李可夫發表了經濟狀況的提綱，反對派就採取了組織聯盟的第一個重要步驟。『新反對派』和托洛茨基分子那時還沒有完全談妥，但聯盟基本上已經準備好，——這一點已經不用懷疑了。凡是看過四月全會速記記錄的同志都會明白這是完全確實的。這兩個集團基本上已經談妥，不過還有一些保留意見，由於這些保留意見，他們對李可夫的提綱只得提出了兩系列平行的修正意見，而不是全體反對派共同的修正意見。一系列修正意見是以加米涅夫爲首的『新反對派』提出的，另一系列的修正意見是托洛茨基集團提出的。但這兩系列的修正意見基本上都是追求一個目的，所以全會當時就說他們是用新形式恢復八月聯盟，——這是確鑿的事實。

當時這些保留意見是什麼呢？

當時托洛茨基說：

『我認爲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意見的缺點是把農村的分化看得好像在某種程度上和工業化沒有關係。其實，農民分化及其速度的意義和社會影響是由工業化的發展和速度對整個農村的發展的影響來決定的。』

這個保留意見是非同小可的。

加米涅夫也回敬托洛茨基分子一個保留意見。

他說：『對於他們修正意見中評價黨過去的經濟政策那一部分（即托洛茨基對季可夫所擬決議草案的修正意見那一部分），我無法同意，我是百分之百地擁護過這個經濟政策的。』

『新反對派』不喜歡托洛茨基批評前一個時期加米涅夫所領導的經濟政策。而托洛茨基也不喜歡『新反對派』把農民分化問題和工業化問題分割開來。

二、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中央七月全會（八）。在這次全會上已經有了一個正式結成的沒有保留意見的聯盟。托洛茨基的保留意見抽去了，歸檔了，正像加米涅夫的保留意見抽去並歸檔一樣。他們現在已經有了共同的『宣言』，同志們，你們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一個反黨文件。反對派聯盟發展的第二階段的特點就是如此。

聯盟在這個時期拼湊並形成起來，不僅由於彼此放棄保留意見，而且由於彼此『大赦』。季諾維也夫在這個時期發表的一個聲明是很有意思的，他說，在黨的蛻化問題上，即在由托洛茨基主義的原則立場產生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踐立場這個主要問題上，反對派（即反對派一九二三年的基本核心托洛茨基分子）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發表的一個聲明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說他那篇專為反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而寫的『十月革命的教訓』，把他們當做現在又在重犯十月錯誤的黨內『右翼』，是一個錯誤；他說黨內開始右傾和蛻化不應歸咎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而應歸咎於，比如

說，斯大林。

請看季諾維也夫在今年七月是怎樣說的：

『我們說，現在已不能有任何懷疑，正如派別組織（即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的領導路線的變化所表明的，反對派一九二三年的基本核心發出的關於無產階級路線有變動的危險和黨機關的勢力在驚人增長這一警告是正確的。』

換句話說，季諾維也夫不久以前的斷言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說托洛茨基在修正列寧主義，說托洛茨基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傾向，——這一切都是錯誤，都是誤會，也就是說，危險不在於托洛茨基主義而在於中央。

這是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極無原則的『大赦』。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在七月間聲明：

『的確，在「十月革命的教訓」裏，我會把政策上的機會主義的變動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人的名字連在一起。中央委員會裏的思想鬥爭的經驗證明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犯這個錯誤的原因是那時我沒有可能觀察七人團內部的思想鬥爭，並及時判明機會主義的變動是斯大林同志領導的反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團所引起的。』

這就是說，托洛茨基公開背棄了他的喧囂一時的『十月革命的教訓』，藉此『大赦』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報答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給他的『大赦』。

真是一筆肆無忌憚的毫無原則的交易。

總之，放棄四月的保留意見，犧牲黨的原則來彼此『大救』，——這就是決定這個反黨聯盟完全形成的因素。

三、第三階段

聯盟發展的第三階段，——這就是今年九月底和十月初，反對派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公開進行反黨活動，這就是聯盟的首領們到南方去休息並在那裏養精蓄銳之後，回到首都對黨發動正面進攻的時期。原來他們在反黨鬥爭由秘密形式轉為公開形式之前，曾在這裏，在政治局裏（那時我不在莫斯科）說過：『我們要給你們瞧瞧，我們去參加工人會議，讓工人說誰對，我們要給你們瞧瞧！』於是他們開始從一些支部旅行到另一些支部。但是你們都曉得，這一活動的結果對反對派是够悲哀的。你們都知道他們慘敗了。從報刊上可以知道，無論在列寧格勒或莫斯科，無論在蘇聯的工業區或非工業區，反對派聯盟都遭到黨員羣衆的堅決回擊。多少人擁護他們，多少人擁護中央，我不重複了，這從報刊上可以知道。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反對派聯盟的希望落空了。從此反對派就開始轉而主張黨內和平了。可見失敗對反對派並不是沒有作用的。十月四日，反對派向中央提出關於和平的聲明，過去反對派一向進行謾罵和攻擊，現在我們第一次聽到他們說出像黨員所應說的話：是停止『黨內糾紛』，搞好『共同工作』的時候了。

由此可見，反對派是由於遭到失敗才不得不談中央屢次號召他們的事情即黨內和平問題的。

自然，忠實執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關於必須統一的指示的中央委員會欣然同意了反對派的提議，雖然它也知道反對派的提議不是完全真誠的。

四、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這就是反對派首領們今年十月十六日的人所共知的『聲明』擬定的時期。一般都把這個聲明評為投降。我不打算給它尖銳的評語，不過這個聲明顯然不是說明反對派聯盟的勝利，而是說明它的失敗的。同志們，我不想敘述我們談判的經過。談判時有速記記錄，你們可以根據速記記錄來了解這件事情。我只想談一個事件。反對派聯盟提出要在『聲明』的第一段說明他們仍舊保留自己的觀點，並且不止是保留，而且是『完全地』保留自己原先的立場。我們會勸反對派聯盟不要堅持這一點。為什麼呢？有兩個原因。

第一、因為他們既然放棄了派別活動，也就放棄了派別自由的理論和實踐，和奧索夫斯基、『工人反對派』、馬斯洛夫——烏爾邦斯集團劃清了界限，那末，這就是說，反對派這樣做不僅放棄了派別組織的鬥爭方法，而且放棄了某些政治觀點。既然這樣，還能說反對派聯盟『完全地』保留自己的錯誤觀點，保留自己的思想觀點嗎？當然不能。

第二、我們對反對派說，他們這些反對派分子再囑咐什麼保留而且是『完全地』保留原先的立

場，對他們自己是不利的，因為工人會有充分理由說：『可見反對派分子今後還想打架，可見他們還沒有挨够打，可見今後還得揍他們。』（笑聲，喊聲：『對！』）然而他們還是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只接受刪掉『完全地』這幾個字的建議，而把他們保留原先的立場這句話保存下來了。現在就讓他們自作自受吧。（喊聲：『對！』）

五、列寧和黨內聯盟的問題

季諾維也夫在不久以前說：中央沒有理由罵他們的聯盟，因為依里奇似乎贊成黨內的一般聯盟。同志們，我必須指出季諾維也夫的說法 and 列寧的立場毫無共同之處。列寧從來不是對一切黨內聯盟都贊成的。列寧只贊成過有原則的和革命的反孟什維克、反取消派、反召回派的聯盟。列寧始終反對無原則的和反黨的黨內聯盟。誰不知道列寧為反對托洛茨基的八月聯盟，即為反對一個反黨的和無原則的聯盟，曾進行了三年的鬥爭，直到取得完全勝利。依里奇從來不是對一切聯盟都贊成的。依里奇只贊成過這樣的黨內聯盟：第一、它是有原則的；第二、它的目的在於鞏固黨而反對取消派，反對孟什維克，反對動搖分子。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這樣的聯盟，就是列寧主義者和普列漢諾夫分子為反對取消派聯盟而結成的聯盟（這是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二年），因為當時形成了一個反黨的八月聯盟，波特列索夫等取消派分子和阿列克辛斯基等召回派分子都加入了這個聯盟，聯盟的首領就是托洛茨基。當時一個聯盟是反黨的聯盟，無原則的，冒險家的八月聯盟；另一個聯盟是列寧主義者

和普列漢諾夫分子即革命的孟什維克（那時普列漢諾夫是革命的孟什維克）結成的聯盟。列寧所承認的是這樣的聯盟，我們大家所承認的也是這樣的聯盟。

如果黨內有一個聯盟能提高黨的戰鬥力，引導黨前進，那末我們是贊成它，贊成這樣的聯盟的。可是你們的聯盟呢，可敬的反對派分子，難道它，你們這個聯盟，能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嗎？難道它，你們這個聯盟，是有原則的嗎？什麼原則使你們，比如說，和梅德維捷夫集團聯合在一起的呢？什麼原則使你們，比如說，和法國的蘇瓦林集團或德國的馬斯洛夫集團聯合在一起的呢？什麼原則使你們自己，即不久以前還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的『新反對派』和那些不久以前還認為『新反對派』的首領們是機會主義者的托洛茨基分子聯合在一起的呢？

其次，難道你們的聯盟是向着黨、有利於黨而不是反對黨的嗎？難道它提高了我們黨的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戰鬥力和革命性嗎？其實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在你們聯盟存在的八個月或六個月裏，你們拼命拖着黨倒退，退到空談『革命的』詞句，退到無原則的地步；你們竭力使黨瓦解，使黨癱瘓，使黨分裂。

不，同志們，反對派聯盟與一九一〇年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分子為反對機會主義者的八月聯盟而結成的那個聯盟毫無共同之處。相反地，現在的反對派聯盟，無論從它的無原則性或從它的機會主義基礎來看，基本上都像托洛茨基的八月聯盟。

反對派分子既然組織這樣的聯盟，也就離開了列寧所努力實行的基本路線。列寧經常告訴我們，

最正確的政策是有原則的政策。拼湊成一個集團的反對派却與此相反，斷言最正確的政策是無原則的政策。

因此，反對派聯盟不能長久存在，它必然要瓦解和崩潰。

反對派聯盟發展的幾個階段就是如此。

六、反對派聯盟的瓦解過程

反對派聯盟目前狀況的特點是什麼呢？可以說，反對派聯盟目前狀況的特點就是聯盟逐漸瓦解，聯盟的組成部分逐漸脫離它，聯盟正在崩潰。只能這樣來說明反對派聯盟目前狀況的特點。狀況也只能是這樣的，因為無原則的聯盟，機會主義的聯盟，在我們黨的隊伍裏是不能夠長久存在的。我們已經知道，馬斯洛夫和烏爾邦斯集團正在脫離反對派聯盟。我們昨天已經聽說，梅德維捷夫和施路普尼柯夫已經表示悔過，並且要退出聯盟。大家知道，除此以外，在聯盟內部，在「新」反對派和「舊」反對派之間也有小爭執，這種小爭執一定會在這次會議上暴露出來。

由此可見，聯盟，他們倒是湊成了，而且倒也湊得富麗堂皇，可是結果呢，却和他們對聯盟所抱的期望相反。當然，從算術觀點來說，他們本來應該得到更大的力量，因為力量相加得出的是更大的力量；但是反對派分子沒有想到，在算術之外還有代數，而在代數方面却不是任何力量相加都得出更大的力量，（笑聲）因為問題不僅在於力量相加，而且要看被加數前面是什麼符號。（鼓掌多時）原來

他們算術很行，代數却很差，他們把力量加在一起，不僅沒有擴大自己的隊伍，反而把自己的隊伍弄得小到極點，弄到瓦解的地步。

過夫季諾維也夫集團的力量何在呢？

在於它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基礎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是，既然季諾維也夫集團放棄了自己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可以說，它就閹割了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力量。

過去托洛茨基集團的力量何在呢？

在於它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錯誤和現在所重犯的這些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是，既然這個集團放棄了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傾向的鬥爭，它就閹割了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力量。

結果加在一起的是一些被閹割者的力量。（笑聲，鼓掌多時。）

顯然，這樣做除了自討沒趣，是什麼也不能得到的。顯然，從此以後，季諾維也夫集團中最正直的人必然會離開季諾維也夫，正像托洛茨基分子中最優秀的人必然會離開托洛茨基一樣。

七、反對派聯盟指望什麼？

反對派的前途怎樣？他們指望什麼？我認為他們指望國內和黨內情況惡化。現在他們正在收縮自己的派別活動，因為如今時機對他們『不利』。但是，既然他們不放棄自己的原則觀點，既然他們決

心保留自己原先的立場，那末，由此可見，他們是意存觀望，等待『良機』，以便積蓄力量之後一有可能就重新反對黨。這一點絲毫也不用懷疑。

不久以前有一位轉到黨這方面來的反對派分子——工人安得列也夫講了一件關於反對派的計劃的有趣事情，我認為有必要在代表會議上提一提。關於這件事，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十月全會的報告中這樣講給我們聽：

『安得列也夫曾在反對派方面做過相當長時期的工作，但他最後深信他再也不能跟他們一起工作了。促使他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他從反對派那裏聽到了兩件事：第一件，反對派碰到了工人階級的「反動」情緒；第二件，經濟狀況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壞。』

我認為從前是一個反對派分子而現在是一個黨員的安得列也夫說出了反對派不敢公開說出的真心話。大概他們感覺到現在的經濟狀況比他們所預料的好些，而工人的情緒又不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壞。由此就產生了暫時收縮「活動」的政策。顯然，如果以後經濟狀況稍微惡化一些（反對派分子深信會這樣），並且工人的情緒也因此惡化起來（他們也深信會這樣），那末，他們就會立即大肆「活動」，擴大他們沒有放棄的思想陣地，對黨進行公開鬥爭。

同志們，反對派聯盟的前途就是如此。這個聯盟正在崩潰，但是還沒有完全崩潰，黨如不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它也許還不會很快就完全崩潰。

既然他們準備鬥爭，等待『良機』，以便重新對黨進行公開鬥爭，那末黨也不能麻痺大意。因此，

黨的任務是：對反對派仍然保留的錯誤觀點進行堅決的思想鬥爭，揭露這些思想的機會主義本質（不管它們用什麼『革命的』詞句掩飾着），務使反對派因怕徹底毀滅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錯誤觀點。

二 反對派聯盟的基本錯誤

同志們，現在我來講第二個問題，講反對派聯盟在我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所犯的基本錯誤的問題。

使黨和反對派聯盟發生分歧的基本問題，是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是否可能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是我國革命的性質如何和前途如何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新問題，這個問題在一九二五年的四月代表會議即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曾經比較詳細地討論過。現在，在新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又出現了，因此，我們必須把它切實研究一下。並且，因為在不久以前舉行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曾經責備說，在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中把他們的觀點敘述錯了，所以我不得不在自己的報告中列舉一些文件和引證來證實在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中所持的基本論點。預先請同志們原諒，我是不得已才這樣做的。

我們面前擺着三個問題：

（一）我國暫時還是獨一無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勝利，世

界革命的速度已經緩慢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是否可能。

(二) 如果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那末可以不可以把它稱為完全的勝利，最後的勝利。

(三) 如果這種勝利不能稱為最後的勝利，那末要使這種勝利成為最後的勝利，需要哪些條件。這就是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即在我們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這個總問題中所包括的三個問題。

一、幾點預先的說明

從前，比如說，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總之，在壟斷資本主義還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還沒有發現也不可能發現，因而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問題還沒有像後來那樣提出來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者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呢？那時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起，都持着這樣的意見：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要使社會主義勝利，必須在幾個國家內，至少在幾個最發達的文明的國家內同時爆發革命。這在當時是正確的。爲了說明這些觀點，我想從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初稿中引用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話，這一段話把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了。這個初稿後來成了『共產黨宣言』的基礎。它寫於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在這部不過幾年以前才發表的初稿中說：

『這種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斯大林註）能不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發生呢？

答：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

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系起來，致使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國家的事變的影響了。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得不相上下，以致無論在什麼地方，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工業較發達，財富積累較多，以及生產力較大而定。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特別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全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全世界的活動場所。」（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見『共產黨宣言』國家出版局一九二三年版第三一七頁）

這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寫的，當時壟斷資本主義還沒有產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甚至沒有提到俄國，俄國根本不在論述之列。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那時還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擁有革命無產階級的俄國，作為一支革命力量的俄國。

這裏，這段引文裏的話，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是正確呢？在恩格斯寫這段話的那個時代是不是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現在，在壟斷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條件下，這個論點是不是正確呢？不，已經不正確了。在舊的時期，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在帝國主義以前的時期，世界還沒有被各個財政集團瓜分完，以暴力重分已經分完的世界還不是資本主義生死存亡的問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像並且不可能像後來那樣突出，資本主義的矛盾還沒有發展到使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並使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那種程度，——在這個舊時期，恩格斯的公式不容爭辯是正確的。在新的時期，在帝國主義發展的時期，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變成了帝國主義發展的決定力量，帝國主義者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和戰爭削弱着帝國主義戰綫並使這條戰綫在個別國家中可能被突破，列寧所發現的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變成了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這一理論的出發點，——在這些條件下，恩格斯的舊公式就不正確了，在這些條件下，它必然要由另一個說明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公式來代替。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繼承者列寧的偉大，正在於他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字句的奴隸。他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遵循着馬克思再三說過的指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列寧認識這一點並嚴格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字句和實質區別開來，從不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教條，而竭力把馬克思主義當做基本方法應用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情況中。列寧的偉大，正在於他公開地、誠實地、毫不猶豫地提出了必須制定無產階級革命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新公式的問題，不怕各國機會主義者死抓住舊公式、拼命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字樣來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勾當。

從另一方面來說，不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多麼有天才的思想家，如果要求他們在發達的壟斷資本主義出現以前五六十年就準確地預見到在壟斷的、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時期出現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一切可能性，那就太荒唐了。

列寧繼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業，既從馬克思的方法出發，而又不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字句，這並不是第一次。我指的是類似的另一次，就是論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那一次。大家知道，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發表過這樣的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摧毀舊的國家機構，建立新的機構即新的無產階級國家，這種無產階級專政是大陸各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必不可少的階段。馬克思並把英國和美國看做例外，因為照他的說法，在這兩個國家裏，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不大發展，或者說根本不發展，所以這兩個國家可能走另外一條道路，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和平的』道路。這在七十年代是完全正確的。（梁贊諾夫說：『就在那時也不正確。』）我認為在七十年代，軍國主義在英國和美國還沒有像後來那樣發展的時候，這個論點是完全正確的。你們讀一下列寧同志『論糧食稅』那本小冊子中的有關一章（三），就會相信這個論點在當時是正確的。在那一章裏，列寧認為七十年代的英國用本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協議的方式發展社會主義並非不可能，因為在這個國家裏，無產階級佔多數，資產階級慣於妥協，軍國主義不發展，官僚制度也不發展。但是這個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是正確的論點，在十九世紀以後，在帝國主義時期，已經變成不正確的了，這時英國的官僚制度已不亞於大陸上任何其他國家，而軍國主義呢，不僅不亞於也許還甚於大陸上任何其他國家了。因此，列寧同志在他的『國家和

革命』一書中說，馬克思以大陸爲限的說法現在已經失效⁽¹⁾，因爲產生了新的條件，不必再把英國當做例外了。

列寧的偉大，正在於他沒有做馬克思主義字句的俘虜，而善於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並從這個實質出發，向前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

同志們，在帝國主義以前的時期，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情況就是如此。

二、列寧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給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的新的、最後的階段以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並肯定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的，列寧是第一個人。我指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我指的是在一九一五年發表的列寧的『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我指的是當列寧初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論點時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關於歐洲聯邦還是世界聯邦的口號的論戰。

那時列寧在這篇文章裏寫道：

『然而把世界聯邦口號當做一個獨立的口號未必是正確的，因爲第一、它和社會主義混合起來了；第二、它會產生認爲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對這個

國家和其餘各國間的關係的不正確的見解。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為「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是這樣寫的。

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使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那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是什麼呢？

列寧論述這個規律時的出發點是：舊的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為帝國主義；世界經濟是在最主要的幾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領土、爭奪市場、爭奪原料等等瘋狂鬥爭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世界已經被瓜分成各帝國主義集團的勢力範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不是平衡的，不是一個跟在另一個後面或同另一個並行的，而是躍進式的，就是把原先走在前面的一些國家排擠到後面，把一些新興的國家推到前面；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發展程序，不可避免地會在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引起重新瓜分已經分完的世界的衝突和戰爭；這些衝突和戰爭會削弱帝國主義；因此，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線就容

易在某些國家內被突破；因此，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就成爲可能的了。

大家知道，不多久以前英國還走在其他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前面。大家也知道，後來德國開始越過英國，並向其他國家，首先是向英國，索取『陽光下的』地盤。大家知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才爆發的。現在，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美國已經遠遠地跑到前面，使英國和歐洲其他強國都落在後面了。幾乎無須懷疑，這種情況正孕育着新的巨大的衝突和戰爭。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帝國主義戰綫在俄國被突破了，這種情況說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今條件下，帝國主義戰綫的鍊條被突破的地方不一定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而將在這根鍊條比較薄弱的地方，在無產階級擁有像農民這樣重要同盟軍來反對帝國主義政權的國家，正像在俄國的情形一樣。將來帝國主義戰綫完全可能在這樣一個國家，比如說在印度這樣的國家被突破，因爲印度的無產階級擁有強大的革命解放運動作爲重要的同盟軍。

大家知道，列寧在談到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時，首先就和托洛茨基進行了論戰，同樣也 and 社會民主黨人進行了論戰。

托洛茨基對列寧的論文和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論點是怎樣反應的呢？請看托洛茨基那時（一九一五年）爲答覆列寧的論文寫了些什麼。

托洛茨基說：『爲反對聯邦口號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體的歷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

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當時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列寧的上述論文就是在該報上發表的。——斯大林註)歸結爲下面的一句話：「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社會民主黨人報」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因而每一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無須以建立歐洲聯邦爲其先決條件。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是完全無可爭辯的意見。可是，這個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國或法國的資本主義水平是不一樣的。可是，跟非洲和亞洲比較起來，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已經成熟到實現社會革命的資本主義「歐洲」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當在自己的鬥爭中「等待」其他國家，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爲使國際間同時行動的思想不致爲國際間消極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這個道理反覆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事實並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或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孑然獨存，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①(「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頁至第九十頁)

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報紙「我們的言論報」(上)是這樣寫的，後來這篇文章在俄國重新發表，收集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初次出版的題爲「和平綱領」的托洛茨基文集中。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你們可以看出，在所引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這兩段文字中，有兩個完全不同的論點相互對立着。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是可能的，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不但能够保持它，而且能够繼續前進，剝奪資本家並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以積極支援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內勝利了的革命，在最短期間沒有引起其他國家革命的勝利，那末獲得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甚至連政權也不能保持住（更不用說它不能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因為托洛茨基說，休想俄羅斯的革命政權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兩種完全不同的立場。在列寧看來，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是最積極最主動的力量，它能够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並且能够繼續前進去支持其他國家的無產者。相反地，在托洛茨基看來，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會變成半消極的力量，它需要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內的立刻勝利作為立刻的援助，它覺得自己猶如宿營荒野，處在可能立刻喪失政權的恐怖之中。可是，如果其他國家的革命不能立刻勝利，那末怎麼辦呢？那就只好偃旗息鼓了。（有人喊道：『還要溜之大吉。』）對了，還要溜之大吉。說得完全對。（笑聲）

有人會說：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這一分歧是過去的事情，以後這種分歧在工作進程中可能縮小到最低限度，甚至於完全消失了。不錯，是可能縮小到最低限度，甚至於消失的。但是，可惜得很，這兩種情形都沒有發生。相反地，直到列寧同志逝世，這種分歧完全依然如故。你們自己可以看到這種分歧現在還繼續存在着。相反地，我肯定地說，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這種分歧和因此而產生的論戰一

直沒有間斷過，而且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這一方面的文章曾一篇接着一篇地出現，隱蔽的論戰也繼續不停，誠然，他們都沒有提名道姓。

下面就是關於這方面的一些事實。

在一九二一年我們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列寧已經以更具體的形式重新提出社會主義可能勝利的問題，即在新經濟政策的軌道上可能建成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的問題。你們還記得，在一九二一年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我們黨內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工人反對派』，曾責備過列寧，說他實行新經濟政策是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大概是爲了回答這種責備，當時列寧曾幾次在他的發言和文章中聲明說，我們實行新經濟政策，不是離開我們的道路，而是在新的條件下繼續走這條道路，以便『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和農民一道』建成『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見列寧『論糧食稅』和他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文章）。

好像是爲了回答這一點，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發表了他的『一九〇五年』一書的『序言』。他在這篇『序言』中說，在我國，和農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是一件不能實現的事情，因爲在西方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前，我國的生活中就會充滿着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敵對衝突。

托洛茨基在這篇『序言』中說：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不僅會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

又說：『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爲『一九〇五年』一書所寫的『序言』）

你們可以看出這裏也有兩種不同的論點相互對立着。列寧認爲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和農民一道建設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是可能的，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認爲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和農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基礎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因爲國內政治生活將充滿着工人政權和大多數農民之間的敵對衝突，而這些衝突只有在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解決。

其次，此後一年，即一九二二年，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的講話中又一次提起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說：

『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將來，或是什麼抽象幻景，或是什麼神像的問題了。我們對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舊有的看法。我們把社會主義拖進日常生活中了，我們應當弄清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任務，這就是我們這時代的任務。讓我在結束講話時表示一個信念：不管這個任務是多麼困難，不管它和我們從前的任務比起來是多麼生疏，不管它會給我們帶來多少困難，只要我們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我們大家同心協力無論如何

會解決這個任務，這樣，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頁）

托洛茨基好像是爲了回答這一點，也許是爲了解釋他在上面引文中所說的話，在一九二二年給他的小冊子『和平綱領』寫了一篇『跋』。他在『跋』中說：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複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一國範圍內勝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來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的國家在一國而且是在落後的一國抗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有雄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其他比較先進比較文明的國家裏是真能做出奇蹟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爲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當其餘的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掌握着政權的時候，我們爲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協議，同時可以確信地說，這種協議至多只能幫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傷，獲得某些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二頁至第九十三頁）

你們可以看出這裏也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兩個相反的論點相互對立着。列寧認爲我們已經把社

◎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會主義拖進日常生活中了，縱然有困難，我們還是完全有可能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認為我們不但不能把現在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而且在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前，我們甚至不能求得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

最後，還有列寧同志的文章『論合作社』和『論我國革命』（駁蘇漢諾夫）。這是列寧在逝世前寫的兩篇札記，是他留給我們的政治遺囑。這兩篇札記極有意義的地方是列寧在這裏又提出了社會主義可能在我國勝利的問題，並下了令人不能再有絲毫懷疑之處的一些定義。他在『論我國革命』的札記中說：

『……他們（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斯大林註）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背得爛熟的一條論據，已成為他們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這條論據就是我們還沒有成長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或像他們的各種「博學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可是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問一下：遇到過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難道不能挺身起來鬥爭嗎？這種鬥爭至少會使他們有一些機會為進一步發展文明爭得並不十分尋常的條件』……

『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樣），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

『你們說，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究竟在哪些書上看到，說普通歷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這類變化的呢？』（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七頁至第四三九頁）

再看列寧在『論合作社』一文中是怎樣說的：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同上，第四二八頁）

這樣一來，在關於我國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即關於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的可能性（同志們，我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不是什麼別的，就是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的可能性）這個基本問題上就有了兩條路綫。一條是列寧和列寧主義的路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綫，另一條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綫。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肯定的。相反地，托洛茨基主義否認社會主義在我國可能依靠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獲得勝利。第一條路綫是我們黨的路綫，第二條路綫却接近社會民主黨的觀點。

因此，在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草案中說，托洛茨基主義是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由此就產生了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我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它不僅是世界革命的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而且是一種基礎，是一種在我國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需的和足夠的基礎。

可見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是，能不能說這種勝利是完全的、最後的勝利呢？不，不能這樣說。我們能夠戰勝我國資本家，我們有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並把它建設成功，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因此就有力量保障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免於外來的危險，免於外國武裝干涉和與此關聯的舊制度復辟的危險。我們不是生活在孤島上。我們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並藉此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革命化，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仇恨和敵視。如果以為資本主義世界會漠不關心地看着我們在經濟戰綫上的成就，看着這些使全世界工人階級革命化的成就，——那就是陷於幻想了。所以只要我們還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至少在幾個國家內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認為我們的勝利是最後的勝利，因此，無論在我們的建設中得到怎樣的成就，我們都不能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有免於外來危險的保障。所以要最後地取得勝利，必須努力使現在資本主義

的包圍爲社會主義的包圍所代替，必須努力使無產階級至少再在幾個國家內取得勝利。只有那時才能認爲我們的勝利是最後的勝利。

正因爲如此，我們不把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看做目的本身，看做至高無上的東西，而看做無產階級革命在其他國家獲得勝利的助力、手段和道路。

列寧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曾這樣寫過：

『我們不僅生活在一個國家裏，而且生活在許多國家所組成的體系裏，而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而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和資產階級國家間的一系列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只要願意統治並繼續統治下去，就應當也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三頁）

由此可見，武裝干涉的危險現在存在着，將來還會長期存在下去。

資本家現在能不能對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嚴重的武裝干涉，是另一回事。這還是一個問題。這大抵將取決於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行動，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同情，他們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程度。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現在不能用對本國資本家進行革命來支持我國革命，——這暫時還是事實。可是資本家無力發動『自己的』工人來進行反對我們共和國的戰爭，——這也是事實。而在現今這個時代，要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打仗而沒有工人參加，是不能不使資本主義遭到致命的危險

的。無數工人代表團到我國來考察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就說明了這一點。全世界工人階級對蘇維埃共和國的深厚同情也說明了這一點。現在我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就建立在這種同情的基礎上。沒有這種同情，我們現在就會受到許多次新的武裝干涉，我們的建設工作就會中斷，而『喘息』時期也就不會有了。

但是，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無力對我國進行武裝干涉，這並不是說它永遠無力這樣做。無論如何，資本家們絕沒有睡大覺，他們正百般設法來削弱我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創造武裝干涉的前提。因此，無論武裝干涉的企圖或與此關聯的舊制度在我國復辟的可能性都不能認為已經消除了。

所以列寧說得對：

『當我們蘇維埃共和國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一個孤立邊區的時候，就以爲……各種各樣的危險已經消失，那是非常可笑的妄想和空想。當然，只要這些根本的對立性存在，危險也就存在，你也無法躲避這些危險。』（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六二頁）

正因爲如此，列寧說：

『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有靠各國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後地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頁）

那末，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爭得無產階級專政並建成社會主義，也就是依靠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戰勝我國經濟中的

資本主義成分。

社會主義在我國的最後勝利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依靠社會主義革命至少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造成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充分保障。

如果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就是解決一個國家（當然，我們指的是我國）完全可以克服的那些內部矛盾的可能性，那末，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可能性就是解決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各國間只有依靠幾個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才能克服的那些外部矛盾的可能性。

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爲一談，誰就是毫無希望的糊塗蟲或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

我們黨的基本路線就是如此。

三、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

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國際形勢、資本主義穩定和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著名決議中，第一次正式表述了我們黨的這條路線。我認爲這項決議是我黨歷史中最重要文件的之一，這不僅因爲它是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擁護列寧路線的最重大的表示，而且因爲它同時是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直接譴責。我認爲指出這項決議中最重要的幾點並不是多餘的。說也奇怪，這項決議還是根據季諾維也夫的報告通過的。（全場微動）

請看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這項決議是怎樣說的：

『一般說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是指最後勝利）是絕對可能的。』^{（八）}
關於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問題，決議中說：

『……兩個直接對立的社會制度的存在，經常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種種經濟壓力、武裝干涉和復辟的危險。因此，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復辟的唯一保障。』^{（九）}

再看關於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和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問題，決議是怎樣說的：

『但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中，如果沒有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國家援助」（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這一論斷，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組成部分，這種論斷是要使蘇聯無產階級在目前採取聽天由命的消極態度。列寧同志反駁這一類的「理論」說：「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背得爛熟的一條論據，已成爲他們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這條論據就是我們還沒有成長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或像他們的各種「博學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評蘇漢諾夫的札記）」（見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

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二）

我認爲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中這幾個要點是無須解釋的。不能說得更清楚更明確了。在決議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托洛茨基主義和蘇漢諾夫主義之間劃了等號的地方。蘇漢諾夫主義是什麼呢？我們從列寧駁斥蘇漢諾夫的幾篇著名文章中得知，蘇漢諾夫主義就是變相的社會民主主義即變相的孟什維主義。必須特別強調這一點，以便弄清楚爲什麼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擁護這個決議的季諾維也夫後來又背離了這個決議而去附和現在同他結成聯盟的托洛茨基的觀點。

其次，根據國際形勢，決議指出了兩種脫離黨的基本路綫的、會給黨造成危險的傾向。關於這些危險，請看決議中是怎樣說的：

「鑒於國際舞台上的既定形勢，在目前時期能够威脅到我們黨的有兩種危險：（一）消極傾向（這是由於過分誇大某些地方呈現出的資本主義的穩定狀態和國際革命的緩慢速度而產生的），缺乏一種在國際革命的速度緩慢情況下仍要堅決地有步驟地從事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充沛的奮發熱忱；（二）民族狹隘性的傾向，忘記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責任，不自覺地忽略蘇聯的命運和發展着的（雖然是緩慢發展着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不懂得不僅國際運動需要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存在、穩固和強盛，而且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也需要國際無產階級方面的援助。」（見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所說的第一種傾向是指普遍存在於托洛茨基分子中間的那種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够勝利的傾向。它所說的第二種傾向是指國際政策方面某些工作人員中多少存在的那種忘記我國革命的國際前途的傾向，這些工作人員有時竟站到要在附屬國內建立『勢力範圍』的立場上。

全黨和黨中央委員會痛斥了這兩種傾向，並以此向這兩種傾向所產生的危險宣戰。

事實就是如此。

季諾維也夫既然做了專門報告擁護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後來怎麼又會背離這個決議的路綫也就是背離列寧主義的路綫呢？他既然背離了列寧主義，怎麼又會非常可笑地責備黨有民族狹隘性，用這種責備來掩飾自己背離列寧主義的事實呢？同志們，我現在就來盡力把這套把戲講給你們聽吧。

四、『新反對派』轉向托洛茨基主義

『新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同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是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前夜初次以公開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我指的是代表會議前夜中央政治局的某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竭力堅持有關這個問題的特殊觀點，這個觀點和黨的路綫毫無共同之處，而和蘇漢諾夫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

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即七個月以後，答覆前列事格勒上層分子發表的人所共知的聲明時，關於這一點是這樣寫的：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堅持過一種觀點，似乎國際革命不來拯救我們，我們就會因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的落後而不能克服內部困難。而我們和中央多數一樣却認為：雖然我國技術落後，但我們能够不管這種落後而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正在建設，並且一定會把它建設成功。我們認為：這樣進行建設，當然比在全世界革命勝利的條件下緩慢得多，然而我們還是在前進，而且要繼續前進。我們同樣認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觀點表現出不相信我國工人階級以及跟着我國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羣衆的內部力量。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是背離列寧主義的立場的。』（見『覆信』）

同志們，我必須指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最初幾次會議時發表在『真理報』上的莫斯科委員會的這個聲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甚至沒有試加反駁，這就是默認了莫斯科委員會提出的責備是與事實相符的。

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形式上承認黨在關於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路線是正確的。他們所以不得不這樣做，看來是由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觀點沒有得到中央委員們的同情。不僅如此，我已說過，季諾維也夫甚至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做了專門報告擁護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人所共知的決議，而這個決議，你們已經可以確信無疑，是反映我們黨的路線的。但

是以後的許多事件表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只是形式上、表面上擁護黨的路綫，實際上仍然堅持他們自己的立場。一九二五年九月季諾維也夫的『列寧主義』一書的出版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事件』，它就是在會於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擁護黨的路綫的季諾維也夫和背離了黨的路綫、背離了列寧主義而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立場的季諾維也夫之間劃了一條分界綫。

請看季諾維也夫在他的書裏是怎樣寫的：

『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至少應當了解爲（一）消滅階級，因而也就是（二）取消一個階級的專政，這裏指的是取消無產階級的專政』……季諾維也夫往下又說：『爲了更確切地弄清一九二五年我們蘇聯的問題是怎樣的，必須分清兩件事情：（一）建設社會主義的有保證的可能性，——這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當然在一國範圍內也是完全可以設想的；（二）最後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季諾維也夫『列寧主義』第二九一頁和第二九三頁）

你們可以看出，這裏把一切都攪混了，都顛倒了。照季諾維也夫的說法，獲得勝利（指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這只是說有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但還沒有可能把它建設成功。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仍要去進行建設。季諾維也夫所說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笑聲）他把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和最後勝利問題混爲一談，因而也就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整個問題是完全不懂的。明知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而仍要去進行建設，——請看季諾維也夫竟糊塗到什

變地步了。

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列寧主義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基本路線毫無共同之處。不用說，這樣的立場根本推翻國際主義的原則，它削弱我國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從而阻礙其他國家革命的展開。這種立場是直接靠近和支持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立場的。

關於季諾維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也應該這樣說。請聽他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批評雅柯夫列夫時說些什麼：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柯夫列夫同志在最近一次俄共（布）庫爾斯克省代表會議上竟胡說八道起來。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四面受着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的國家內，我們能不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上述一切，我們有理由說，我們不僅正在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時還是單獨的，我們雖然暫時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家，但我們一定能建成這個社會主義。』（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七九號）這難道是列寧主義對問題的提法嗎？難道這裏沒有民族狹隘性的氣味嗎？」（季諾維也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

這樣說來，基本上擁護黨和列寧主義路線的雅柯夫列夫應該受到有民族狹隘性的責備。這樣說

◎ 斯大林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來，擁護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著名決議中固定下來的黨的路綫就是陷入民族狹隘性。我們就把這個叫做糊塗透頂！其實這就是季諾維也夫所玩弄的全套把戲：非常可笑地責備列寧主義者有民族狹隘性，藉此來竭力掩飾自己的背離列寧主義。

所以，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把千真萬確的真相道破了，它斷定『新反對派』在社會主義可能在我國勝利這個基本問題上，或者（其實是一回事）在我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上，已經轉到托洛茨基主義那方面去了。

應當在這裏指出，加米涅夫形式上對這個問題採取稍微特殊的態度。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相反，無論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或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都公開聲明他擁護黨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路綫，這是事實。然而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並沒有認真看待加米涅夫的聲明，並沒有相信他口頭上的話，在關於中央總結報告的決議中却把他列入背離列寧主義的那夥人裏面。爲什麼呢？因爲加米涅夫不願意也不認爲必須用行動來證實他擁護黨的路綫的聲明。用行動來證實自己的聲明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要和那些反對黨的路綫的人決裂。黨內有過不少這樣的例子，有些人在口頭上聲明擁護黨，同時却和反黨分子繼續保持政治上的友誼關係。對於這種情形列寧通常總是說，黨路綫的這種『擁護者』比反對者更壞。例如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屢次聲明他擁護並忠於國際主義原則，但是列寧那時却把他叫做『社會沙文主義的幫兇』。爲什麼呢？因爲托洛茨基既聲明自己是國際主義者，又不願意跟考茨基和馬爾托夫、坡特列索夫和齊赫澤決裂。當

然列寧是對的。你想讓你的聲明被認真看待，那你就要用行動來證實你的聲明，和那些反對黨的路綫的人斷絕政治上的友誼關係。

因此我認爲：既然加米涅夫不願意用行動來證實他講的話，既然他繼續和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聯盟，那末，他那篇說他擁護黨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路綫的聲明就不能被認真看待了。

五、托洛茨基的支吾搪塞。斯米爾加。拉狄克

有人會說：這一切都很好，都正確。但是，難道就沒有什麼根據和文件可以證明反對派聯盟的首領們並不反對從社會民主主義傾向轉到列寧主義方面來嗎？拿托洛茨基的『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一書爲例來說，這本書不就是托洛茨基並不反對放棄自己的原則錯誤的徵象嗎？有人甚至認爲托洛茨基在這本書裏確實放棄了或正在努力放棄自己的原則錯誤。我應當懺悔，這一次對於這件事情我犯了一點不相信的毛病，（笑聲）並且我應當說，很遺憾，這樣的推測完全與事實不符。

請看托洛茨基的『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一書中最鮮明的一個地方：

『國家計劃委員會公佈了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蘇聯國民經濟「控制」數字的綜合統計表。這一切都是很枯燥的，可以說是官樣文章。然而，從這些枯燥的一欄一欄的統計數字中，從這些差不多同樣枯燥和壓縮的統計說明中，可以聽到成長着的社會主義的雄壯的歷史音樂。』

（托洛茨基『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出版社一九二五年版第一頁）

什麼叫做『成長着的社會主義的雄壯的歷史音樂』呢？如果說這個句子裏一般地還有什麼含義的話，那末，這個『雄壯的』句子的含義是什麼呢？這裏有沒有對社會主義可能在我國勝利這個問題的答覆，哪怕是暗示性質的答覆呢？一九一七年我們推翻資產階級，一九二〇年我們把武裝干涉者從我國驅逐出去，都可以說是成長着的社會主義的雄壯的歷史音樂，因為我們在一九一七年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又趕跑了武裝干涉者，而向全世界顯示我國成長着的社會主義的力量和威勢這些雄壯的事實，這的確是成長着的社會主義的雄壯的歷史音樂。可是這對我國可能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有沒有、能不能有什麼關係呢？托洛茨基說：我們可以走向社會主義。但是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走到社會主義。明知走不到社會主義而仍然走下去，——難道這不是愚蠢嗎？同志們，不是的，托洛茨基的關於音樂等等的『雄壯的』詞句不是對問題的答覆，而是律師的遁詞，而是對問題的『音樂般的』支吾搪塞。（聽衆喊道：『對！』）

我認為可以把托洛茨基的這一個雄壯的音樂般的支吾搪塞和托洛茨基過去在他的小冊子『新方針』裏關於評價列寧主義的問題所做的支吾搪塞看做一路貨色。不妨聽一聽：

『作為革命行動體系的列寧主義，就是由思維和經驗養成的革命嗅覺，這種社會領域裏的嗅覺，如同體力勞動中肌肉的感覺一樣。』（托洛茨基『新方針』，『紅色事物』出版社一九二四年版第四十七頁）

把列寧主義看做『體力勞動中肌肉的感覺』。這豈不是又新鮮，又奇特，又深奧。你們懂得一點

什麼了吧？（笑聲）這些話都很漂亮，很像音樂，還可以說，甚至很雄壯。只是缺少一點『小東西』：簡單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寧主義定義。

例如列寧用下面這樣辛辣但很確切的話描寫托洛茨基，指的正是托洛茨基特別醉心於音樂般的詞句一事。列寧說：

『發光的東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詞句很光輝很響亮，可是沒有內容。』（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〇七頁）

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一書的情形就是這樣。

至於說到更近的時期，例如一九二六年，那末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九月署名的一個文件，使人毫不懷疑托洛茨基仍舊保持着他被黨駁斥過的觀點。我指的是托洛茨基給反對派分子的那封信。

請看這個文件說些什麼：

『關於抹殺農村分化，關於富農正在發展，關於富農不僅對經濟的自發過程而且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的影响正在增長，關於在布哈林庇護之下在我們自己黨內產生了一個明顯反映我國經濟中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壓力的理論派別，列寧格勒反對派會及時發出了警報；列寧格勒的反對派堅決反對了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為它是在理論上為民族狹隘性辯護』……○

○ 青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摘自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和十一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黨內情況問題的速記記錄附件)

在托洛茨基署名的這個文件中什麼都說到了：既說到『新反對派』的首領們已經背離列寧主義而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又說到托洛茨基仍舊完完全全保持着他原先在我們黨內採取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立場。

而反對派聯盟的其他首領，例如斯米爾加和拉狄克是怎樣的呢？我認爲這些人也是反對派聯盟的首領。斯米爾加和拉狄克，——他們怎麼不是首領呢？他們對於黨、對於列寧主義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立場是怎樣評價的呢？

例如斯米爾加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共產主義科學院說過這樣的話。

他說：『我斷言，他（布哈林。——斯大林註）完全當了恢復思想的俘虜，他認爲我國經濟上的落後狀態不能成爲在俄國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的障礙，是已被證實了的事情……我認爲毫無疑問，我們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就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然而請問：恢復時期是否提供根據來審查和修改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一條中心原理——在一個技術落後的國家裏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呢？』^①（斯米爾加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共產主義科學院關於控制數字問題的

①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講話

你們可以看出，這種『立場』也是和蘇漢諾夫先生在我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的立場完全一致的。說斯米爾加的立場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立場（我有理由稱這種立場爲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立場），這難道不對嗎？（喊聲：『對！』）

可以不認爲反對派聯盟對斯米爾加諸如此類的講話要負責任呢？可以而且應該。反對派聯盟是不是曾經試過和斯米爾加劃清界限呢？沒有，沒有試過。相反地，反對派聯盟對斯米爾加在共產主義科學院的講話還竭力加以鼓勵。

再看看另一位首領拉狄克。他曾和斯米爾加一起在共產主義科學院裏講過話，而且在那兒把我們抨擊得『體無完膚』。（笑聲）我們有一個文件說明拉狄克譏笑並嘲弄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他把這個理論叫做『在一個縣裏』甚至『在一條街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且當場內有些同志提意見說這個理論是『列寧思想』的時候，拉狄克回答道：

『你們沒有好好地讀過列寧的著作，如果弗拉基米爾·依里奇還在世，他會說這是謝德林思想。在謝德林的『彭帕杜爾列傳』裏一位絕無僅有的彭帕杜爾^①要在一個縣裏建設自由主義。』（拉狄克在共產主義科學院的演說）

能說拉狄克對於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思想的卑鄙庸俗的、自由主義的嘲笑不是完全和列寧主義決裂嗎？反對派聯盟對拉狄克的這種卑鄙庸俗的行爲要不要負責任呢？毫無疑問是要負責

責任的。爲什麼它又不和這種卑鄙庸俗的行爲劃清界限呢？因爲反對派聯盟不想放棄它那背離列寧主義的立場。

六、我國建設前途問題的決定意義

有人會問：關於我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的這一切爭論有什麼用處呢？關於將來怎樣或將來可能怎樣的這種爭論有什麼用處呢？丟開這一切爭論來從事實際工作不是更好嗎？

同志們，我認爲這樣提問題是根本不對的。

不知道應該往哪裏走，不知道前進的目標，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前途，沒有既已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就能把它建設成功的信心，我們就不能建設。沒有明確的前途，沒有明確的目標，黨就不能領導建設。我們不能按伯恩施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這一方式來生活。相反地，我們既然是革命者，我們就必須前進，我們的實際工作就要服從無產階級建設的基本階級目標。不一樣，我們就必不可免而且毫無疑義地會陷入機會主義的泥潭。

其次，沒有我國建設的明確前途，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信心，工人羣衆就不能自覺地參加這種建設，他們就不能自覺地領導農民。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明知不能建成，誰還願意去建設呢？所以，沒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途，就必不可免而且毫無疑義地會削弱無產階級從事這種建設的意志。

再其次，削弱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就不能不引起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增強。建設社會主義如果不是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又是什麼呢？工人階級如果有頹喪和失敗情緒就不能不鼓起資本主義成分對舊制度復辟的希望。誰低估了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決定意義，誰就是幫助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誰就是培植投降主義。

最後，削弱無產階級戰勝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意志，既阻礙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勢必延遲國際革命在世界各國的展開。不應該忘記，世界無產階級都在注視着我國的經濟建設和我們在這條戰綫上的成就，期望我們在這一鬥爭中取得勝利，期望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無數工人代表團從西方來到我國，仔細觀察了我國建設的每一個角落，這說明我們在建設戰綫上的鬥爭就其使世界各國無產者革命化的作用來說是有巨大的國際意義的。誰企圖縮小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誰就是企圖打消國際無產階級對我國勝利的希望，而誰打消這些希望，誰就是違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起碼要求。列寧的這段話是萬分正確的。他說：

『現在，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去影響國際革命。世界各國所有的勞動者毫無例外地（絕非誇大）都注視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規模的鬥爭已轉到這個戰場上來了。我們一旦解決了這個任務，那我們就一定會最終地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對於我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這條戰綫上，我們應當以緩慢的、逐步的——求速是不行的——而又是不斷的上升和前進去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頁）

正因為如此，我認爲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我國勝利的問題的爭論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爲關於我們工作的前途，關於這一工作的階級目標，關於這一工作在最近期間的基本方針等問題的解決都是要在這些爭論中來錘鍊並確定的。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問題對於我們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七、反對派聯盟的政治前途

反對派聯盟的政治前途是從他們在我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上的基本錯誤中生長起來的。

由於國際革命的延遲，而反對派對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又沒有信心，反對派面前就擺着兩個前途：

或者是黨和國家機關蛻化，共產主義的「優秀分子」（即反對派）實際脫離政權，並由這些分子組成一個新的「純粹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對正式的非「純粹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採取反對的立場（奧索夫斯基的前途）；

或者是企圖以自己的急躁心情冒充實際情況，否認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超乎常人地」「英勇地」躍進並且侵入對內政策方面（超工業化）和對外政策方面（「極左的」詞句和「極左的」手勢）。

我認爲在所有反對派分子中，奧索夫斯基是最勇敢最剛強的。如果反對派聯盟有足够的勇氣和始終如一的精神，那它就應當走上奧索夫斯基的道路。然而，反對派聯盟既缺乏始終如一的精神，又缺乏勇氣，所以它就滾到第二個前途的路上，即滾到『超乎常人地』躍進並且『英勇地』侵入事物客觀進程的那條路上去了。

由此就否認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提出在西方脫離甚至退出工會的口號，要求拆散英俄委員會，要求幾乎只在半年之內就使我國工業化等等。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在政策上的冒險主義。

因此，反對派聯盟的理論（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就具有特別意義了。這種理論認爲在我們這裏，在我國，在我國工業化事業上，要跳過農民；而在那裏，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國這次罷工事件上，要跳過工會的反動性。

反對派聯盟認爲只要黨制定正確的路綫，就完全足以使黨毫不遲延地立刻成爲羣衆性的黨了，就完全足以使黨能够毫不遲延地立刻領着羣衆去進行決定性的戰鬥了。反對派聯盟不懂得這樣對待領導羣衆的問題是和列寧主義的立場毫無共同之處的。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春天提出的關於蘇維埃革命的『四月提綱』^{（一）}是不是正確的呢？是的，是正確的。那末，爲什麼那時列寧不號召立即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呢？爲什麼他反對當時提出立即推翻臨時政府口號的我們黨內的『極左的』集團呢？因爲列寧知道，要完成革命，只有黨的正确路綫是不够的。因

爲列寧知道，要完成革命，還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使羣衆即廣大的工人羣衆根據本身經驗相信黨的路綫的正確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時間，需要黨在羣衆中進行不倦的工作，爲使羣衆相信黨的路綫的正確性而進行不倦的工作。正因爲如此，列寧在提出他的革命的『四月提綱』的時候，同時提出向羣衆『耐心』宣傳這個提綱的正確性的口號。爲了進行這個耐心的工作，當時用了八個月的時間。但這八個月是革命的月份，至少相當於通常『憲政』時期的好幾年。我們所以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因爲我們能把黨的正確路綫和羣衆承認這個路綫的正確性區別開來。『超乎常人地』躍進的反對派英雄們不懂得而且不願意懂得這一點。

英國共產黨在英國罷工時期的立場是不是正確的呢？是的，基本上是正確的。那末，爲什麼英國共產黨沒有能够立刻領導千百萬英國工人羣衆跟着自己走呢？因爲它來不及，並且不可能來得及在短促期間使羣衆相信它的路綫的正確性。因爲在制定黨的正確路綫和黨領導千百萬羣衆跟着自己走這二者之間，還有一段間隔時期，一段相當長的間隔時期，在這段時期中，黨應該進行不倦的工作，使羣衆相信黨的政策正確性。這段間隔時期是不能跳過的。認爲這段時期可以跳過是愚蠢的。只有耐心地使羣衆進行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够度過並消除這段間隔時期。

反對派聯盟不懂得列寧式的領導羣衆的這些起碼真理，而它的政治錯誤的根源之一也正應該在這裏找尋。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的『超乎常人地』躍進的，拼命故作聲勢的政策無數例證之一。

托洛茨基曾經說過：『俄國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儘管只是由於我國資產階級革命造成的暫時形勢）以後，必定遇到全世界的反動勢力方面有組織的敵對行為和全世界無產階級方面有組織的支援決心。只有自身力量可以依靠的俄國工人階級，一旦農民同它決裂，就必然要被反革命勢力擊潰。它只有把自己政治統治的命運，也就是把整個俄國革命的命運和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運連接在一起，此外沒有任何別的辦法。它把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暫時形勢所給予它的那種巨大的國家政治力量拋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階級鬥爭的天平盤裏。它掌握國家政權，後有反革命勢力，前有歐洲反動勢力，它向全世界的自己的弟兄們高聲發出老號召，這一次將是最後進攻的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托洛茨基『回顧和展望』第八十頁）

請看，原來俄國無產階級應該奪取政權，可是在奪取政權之後，定要跟農民廝殺起來，而在跟農民廝殺一陣之後，它又定要在『後有反革命勢力』，前有『歐洲反動勢力』的情況下，挺身去和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搏鬥。

這裏，在托洛茨基的這個『公式』裏，有不少『音樂般的』、『超乎常人的』和『雄壯得了不得的』詞句，——這一點大概是可以同意的。然而這裏既沒有馬克思主義，又沒有革命氣息，這裏我們看到的只是對革命的無謂玩弄和政策上的冒險主義，——這一點也是無可懷疑的。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而且不容置疑，托洛茨基的這個「公式」是反對派聯盟現在的政治前途的直接表現，是托洛茨基的『跳過』尚未完結的運動形式的理論的結果和收穫。

三 反對派聯盟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

反對派聯盟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它在我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所犯的主要錯誤的直接繼續。

我說反對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指的是這樣一些問題，如無產階級在經濟建設事業中的領導權問題，工業化問題，黨的機關和黨內「制度」問題等等。

黨的出發點是：在黨的一般政策中，特別是在經濟政策中，不能把工業跟農業分割開來，這兩個基本經濟部門的發展，必須循着使它們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互相配合互相結合的路綫進行。

由此就產生了我們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即通過不斷改善勞動羣衆包括基本農民羣衆的物質生活狀況（展開工業化的主要基礎）來實現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我所說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是和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不同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是通過勞動階層的千百萬羣衆貧窮化來實現的。

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的主要缺點在哪裏呢？在於它使工業化的利益和勞動羣衆的利益脫節，使

國內矛盾尖銳化，使千百萬工農羣衆貧窮化，它不是把利潤用於改善國內最廣大羣衆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狀況，而是用於資本輸出並擴大國內外資本主義剝削的基地。

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的主要優點在哪裏呢？在於它使工業化的利益和居民中勞動階層的基本羣衆的利益趨於一致；在於它不是使千百萬羣衆貧窮化，而是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不是使國內矛盾尖銳化，而是緩和並克服這些矛盾；在於它不斷擴大國內市場，增加國內市場的容量，從而建立展開工業化的牢固的內部基礎。

由此就產生了基本農民羣衆對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的直接關心。

由此就產生了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方面，具體地在國家的工業化方面，無產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由此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首先是經過農民的普遍合作化）的思想，工業對農業起領導作用的思想。

由此就產生了我們的稅收政策，降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等等，這些政策照顧到保持無產階級和農民經濟合作的利益和鞏固工農聯盟的利益。

反對派聯盟却正相反，它把工業和農業對立起來，並走上使工業脫離農業的道路。它不懂得也不承認，忽視農業利益，損害農業利益，就不能推進工業。它不懂得工業是國民經濟的領導中樞，農業是我國工業可藉以發展的基地。

由此就產生了把農民經濟當做應受無產階級國家『剝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由此就產生了懼怕豐收的心理（托洛茨基），似乎豐收是會破壞我國經濟的一種力量。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的獨特政策，這種政策走上了使工業和農業間的內部矛盾尖銳化的道路，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方法的道路。

例如，不妨聽聽反對派聯盟的首領之一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話。他在他的一篇文章裏說：

『向社會主義生產組織過渡的某一國家，在經濟上愈落後，小資產階級性即農民性愈嚴重……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積累就愈要被追仰賴於對社會主義以前的經濟形式的剝削……相反地，社會革命取得勝利的某一國家在經濟上和工業上愈發達……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就愈要減少自己的產品和殖民地產品交換的不等價程度，即減少對後者的剝削——其社會主義積累的重心就愈要轉到社會主義形式的生產基礎上去，就是說，愈要仰賴於本國工業和本國農業的剩餘生產品。』（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社會主義積累的基本法則』一文，載於一九二四年『共產主義科學院通報』第八期）

幾乎無須證明，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走上了使我國工業利益和我國農民經濟利益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的道路，——因而就走上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的道路。

我認爲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把農民經濟看成『殖民地』，企圖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造成一種剝削。

關係，這樣就是破壞，企圖破壞（自己沒有了解到這點）任何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

我斷言，這種政策跟黨把工業化事業建立在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經濟合作基礎上的政策毫無共同之處。

托洛茨基的情形也是這樣，或者說幾乎是這樣。托洛茨基害怕『豐收』，大概他以爲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觀點來看，豐收是一種危險。例如他在四月全會上曾經說：

『在這樣的條件下（托洛茨基說的是現時不按比例的條件。——斯大林註），豐收，即農業剩餘商品數量的可能增加，會成爲使經濟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速度不能加快的因素，相反地，會成爲破壞經濟，使城鄉關係尖銳化的因素，而在城市裏則成爲使消費者和國家的關係尖銳化的因素。從實際上說，豐收在缺乏工業品的情況下就會意味着把更大數量的糧食蒸餾爲私酒，延長城市居民購買糧食的行列。從政治上說，豐收就將意味着農民反對外貿易的壟斷即反對社會主義工業。』①（中央四月全會的會議速記記錄，托洛茨基對李可夫的決議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第一六四頁）

只要把托洛茨基的這個荒謬已極的聲明和列寧同志在商品極端缺乏時期說豐收就是『救國』（卷）的聲明對照一下，就會明白托洛茨基的聲明的全部錯誤了。

① 蕭東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看來托洛茨基不承認我國工業化只有經過逐漸改善農村勞動羣衆的物質生活狀況才能實現這個原理。

看來托洛茨基認為我國工業化必須經過某種所謂「歉收」來實現。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關於提高出廠價格、對農民課重稅等等具體建議，這些建議不是使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經濟合作得以鞏固，而是使這種合作瓦解；不是爲無產階級在經濟建設方面的領導權準備條件，而是使這些條件遭到破壞；不是使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而是使它們分離。

現在簡單談談農民分化的問題。大家知道，反對派對於分化的加劇大吵大叫，張皇失措。大家知道，對農村小私人資本的增長，誰也沒有像反對派那樣張皇失措。但是，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實際情形是這樣：

第一、事實表明，農民中的分化在我國是以完全獨特的形式進行的，就是說，農民分化不是通過『沖刷』中農，相反地，是通過大大縮小兩極來加強中農的，而且像土地國有化、農民的普遍合作化、我們的稅收政策等等因素也不能不給分化本身造成一定的範圍和限制。

第二（這一點是主要的），我國工業發展這個決定性的事實正在蓋過並超過農村裏小私人資本的增長，我國工業正在鞏固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障地，它是所有一切形式的私人資本的主要解毒劑。

看來對農村裏私人資本仍然大喊大叫和張皇失措的『新反對派』並沒有看到這些情況。

給反對派提一提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也許不是多餘的。列寧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是這樣說的：

『大生產狀況的種種改善，若干大工廠的可能開工——將使無產階級的地位如此鞏固起來，以致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即使在滋長也沒有什麼可怕了。應該怕的不是小資產階級和小資本的滋長。應該怕的是極嚴重的飢荒、生活貧困、糧食缺乏的情況繼續太久，這種情況已使無產階級變得完全軟弱無力，使無產階級不能對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絕望的自發勢力。這是更可怕的。在糧食數量增加的情況下，小資產階級不管怎樣發展都不會有什麼大危害，因為小資產階級的發展可以使大工業發展起來……』（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四頁）

反對派分子是否什麼時候會了解，對農村中的分化和私人資本表現張皇失措，就是不相信我國可能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另一面。

現在簡單談談關於反對派反對黨的機關和黨內『制度』的鬥爭。

反對派反對黨的機關（我黨領導核心）的鬥爭，實際上是爲了什麼呢？幾乎無須證明，反對派在這方面的鬥爭，歸根到底是企圖破壞黨的領導，解除黨的武裝，使黨無從改善國家機關，無從剷除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領導國家機關。

反對派反對黨內『制度』的鬥爭是要造成什麼結果呢？是要鬆弛黨的鐵的紀律，而沒有鐵的紀律，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思議，歸根到底是要動搖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

所以，黨斷定反對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非無產階級分子向我黨、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的反映，這是正確的。

同志們，反對派聯盟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就是如此。

四 幾個結論

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九）上說，代表會議通過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必然會使反對派的首領被開除出黨。同志們，我必須聲明，托洛茨基這樣說是毫無根據的，是帶欺詐性的。我必須聲明，通過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只能有一個目的，就是和反對派的原則錯誤進行堅決鬥爭以便完全糾正這些錯誤。

大家知道，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曾通過關於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決議（九）。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是什麼呢？不能說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要比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好些』。然而至今還沒有人從通過關於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決議這個事實得出結論說：一定要把『工人反對派』分子開除出黨。

托洛茨基不會不知道，我們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曾宣佈托洛茨基主義是『十分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然而至今還沒有人認為這項決議的通過必使托洛茨基反對派首領一定被開除出黨。

請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有一段話：

『在我們面前的現在這個「反對派」不僅企圖修正布爾什維主義，不僅公然背離列寧主義，而且具有十分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絲毫不容懷疑，這個「反對派」客觀地反映着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政黨的立場和政策的進攻。』（摘自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讓托洛茨基來給我們解釋，小資產階級傾向哪一點比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好些。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就是變相的小資產階級傾向，難道這很難理解嗎？我們說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只是把我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裏所說的話說得更確切一些，難道這很難理解嗎？我們根本沒有宣佈反對派聯盟的首領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我們只是說反對派聯盟顯出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因此警告說，現在脫離這種傾向還不算晚，並且我們號召反對派聯盟這樣做。

請看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著名決議（這裏關於托洛茨基主義是怎樣說的）：

『實質上，現在的托洛茨基主義是按照近似「歐洲」式的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也就是說，歸根到底，是按照「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偽造共產主義。』（摘自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決議）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應該說明，這兩個決議基本上都是出自季諾維也夫的手筆。但是，不僅整個黨沒有，就連季諾維也夫個人也沒有從這裏得出結論說，應該把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首領們開除出黨。

指出加米涅夫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評論也許不是多餘的吧？加米涅夫把托洛茨基主義和孟什維主義看成一個東西。請聽：

『托洛茨基主義總是孟什維主義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總是外表上最善良，掩飾得最嚴密，並且最適於欺騙恰恰具有革命情緒的那一部分工人。』（加米涅夫『黨和托洛茨基主義』，『擁護列寧主義』文集第五十一頁）

所有這些事實，托洛茨基並不比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知道得少些。然而還沒有人根據這些決議，比如說，根據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提出開除托洛茨基及其同夥的問題。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那樣說是不老實的，是帶欺詐性的。

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十月全會基本上同意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其用意不在於懲罰，而在於必須和反對派的原則錯誤進行思想鬥爭；反對派還沒有放棄這些原則錯誤；而且在它的十月十六日的『聲明』中表示，今後還打算在黨章範圍內爲這些錯誤進行鬥爭。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這樣做的出發點是：和反對派的原則錯誤進行鬥爭是糾正這些錯誤的唯一手段，而糾正這些錯誤又是達到我們黨內真正統一的唯一道路。黨打垮反對派聯盟，強迫它放棄派別活動，這樣

就取得了爲實現黨內統一非有不可的起碼的必要條件。當然，這一收穫不算小。但是這還不够。要達到完全統一，必須再前進一步，使反對派聯盟放棄它的原則錯誤，這樣來捍衛黨和列寧主義不受攻擊，不被修正。

這是第一個結論。

黨員羣衆否決了反對派聯盟的原則立場；斥責了反對派挑起新爭論的企圖，他們說：現在不是空談的時候，而是應該切實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少空談，多做創造性的積極的工作，爲社會主義建設而前進！

這是第二個結論。

第三個結論是：在黨內鬥爭的過程中，在對反對派的進攻進行反擊的過程中，黨已在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的基礎上空前地團結一致了。

這是第三個結論。

在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的基礎上團結起來的黨，就是現在爲了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非常需要的槓桿。

這根槓桿是我們在和反對派聯盟的鬥爭中鍛鍊成的。

鬥爭使我們黨在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的基礎上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我希望代表會議一致通過中央委員會提出的提綱從而使這種團結鞏固下來。

我相信代表會議一定會光榮地完成它的這個工作。（熱烈鼓掌多時，全體代表起立，歡呼。）

載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 and 六日

「真理報」第二五六號 and 第二五七號

① 俄國著名作家薩爾梯柯夫，謝德林在所著「彭帕杜爾列傳」一書中以彭帕杜爾為名描繪沙皇時代的官僚典型，後來

彭帕杜爾一詞在俄文中成為普通名詞，意即典型的專橫官僚。——譯者註。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報告的結論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一 幾個一般性的問題

一、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同志們！我在我的報告中說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提出的著名公式，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是現在却有缺點了。我說因此應該用列寧的公式來代替它。列寧的公式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的勝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在討論的時候，有人反對我的意見。在這方面特別賣力的是季諾維也夫。因此，我不能不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並作較詳細的說明。

我認爲季諾維也夫沒有讀過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即使讀過，也沒有讀懂，否則，他就不會反對我，否則，他就會考慮到社會民主黨現在正拼命抓住恩格斯的舊公式來反對列寧主義這個事實，否則，季諾維也夫就會懂得追隨社會民主黨的足跡是會遭到一些『蛻化』的危險的。

請看看恩格斯在他的『共產主義原理』^①中講了些什麼。他是用問答的方式來闡述個別原理的。

『問：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呢？』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資料增加到爲建立社會生產所必需的數量一樣。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將來很可能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②，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並且只有在爲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已創造出來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

問：這個革命的進程將是怎樣的呢？

答：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顯然，這裏講的是推翻資產階級並爭得無產階級專政。同志們，你們知道，這一條在我們這裏已經實現了，並且充分而有餘地實現了。（喊聲：『不錯！』『對！』）

往下看：

『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那末，這種民主對於無產階級就會毫無用處。這些由現有條件中必然產生出來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一）用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姪甥等）遺產繼承權、強制公債等來限制私有制。」

你們知道，這些措施在我們這裏已經實行，並且正在充分而有餘地實行。
再往下看：

「（二）一部分用國營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收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私有者、工廠主和鐵路及海船所有者的財產。」

你們知道，這些措施還在我國革命的最初幾年也在我們這裏實行了。

再往下看：

「（三）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舉行暴動反對大多數人民的叛亂分子的財產。」

你們知道，我們已經沒收了，並且沒收得再沒有什麼可以沒收了。（笑聲）

再往下看：

「（四）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在國家的田園、工廠、作坊中工作，這樣就會消除工人之間的相互競爭，並迫使殘存的工廠主付出的工資跟國家所付出的一樣高。」

大家知道，我們走的正是這條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正獲得許多勝利，基本上這一條已在順利

地實現着。

再往下看：

『(五)在私有制完全廢除以前，對社會的一切成員一律實行強制勞動。特別是爲農業組織工業大軍。』

你們知道，我們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曾用組織勞動大軍的形式試走過這條道路，但是在這條道路上並沒有得到重大的成就。後來我們採取迂迴的道路走向這個目的，沒有理由懷疑，我們在這方面一定能够獲得決定性的勝利。

往下看：

『(六)通過擁有國家資本的國家銀行，把信貸系統和銀錢業集中在國家手裏。封閉一切私人銀行和錢莊。』

同志們，你們知道得很清楚，這件事情在我們這裏基本上也已經實現了。

往下看：

『(七)隨着國家所擁有的資本和工人數目的增加而增加國營工廠、作坊、鐵路、海船的數目，開墾一切荒地，改進已墾土地的耕作。』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在我們這裏也正在實行，並且日有進展；土地的國有化和主要工業部門的國有化對這一點有極大的幫助。

再往下看：

『(八)所有的兒童，從能够離開母親照顧的時候起，由國家機關公費教育。』

這件事情在我們這裏正在實行，但是還遠沒有完全實現，因為戰爭和武裝干涉使我們遭到破壞，我們還不能對全國的兒童都實行國家公費教育。

再往下看：

『(九)在國有土地上建築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將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將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點。』

顯然，這裏講的是大規模建築住宅的問題。你們知道，這件事情我們正在推進，可是基本上還沒有實現，恐怕也不會很快實現，因為我們承受的遺產是破產了的工業，我們還來不及並且也不可能來得及積累充足的資金來進行大規模的住宅建築。

再往下看：

『(十)拆毀一切不合衛生條件的、建築得很壞的住宅和市街。』

這一條是前一條的組成部分，因此，關於前一條所講的也應當適用於這一條。

再往下看：

『(十一)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遺產繼承權。』

我覺得這件事情在我們這裏可以說是進行得令人滿意的。

還有最後一條：

『(十二)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在我們這裏已經完全實現了。

同志們，這就是恩格斯在他的『共產主義原理』中所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

同志們，你們可以看到我國革命已經實現了這個綱領的十分之九。

再往下看：

『問：這種革命(即上面所說的革命。——斯大林註)能不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發生呢？』

答：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系起來，致使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國家的事變的影響了。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得不相上下，以致無論在什麼地方，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見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恩格斯說：具有上述綱領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發生的。而事實說明，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我們已經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即在我們的國家內，基本上進行了這樣的革命，實現了這個革命的綱領的十分之九。

季諾維也夫可能說，我們實現了這個綱領，實現了這些條文，是犯了錯誤。（笑聲）很可能，我們實現這些條文是犯了一點『民族狹隘性』的錯誤。（笑聲）這是很可能的。但有一點終究是很明顯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恩格斯認為在一個國家內無法實現的和不可能的事情，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在我國已經變成能夠實現的和可能的事情了。

假如恩格斯還活著的話，當然，他決不會墨守舊公式，相反地，他會盡情地祝賀我們的革命說：『讓一切舊公式見鬼去吧，蘇聯勝利的革命萬歲！』（鼓掌）

但是社會民主黨人陣營裏的先生們却不這樣想。他們死抓住恩格斯的舊公式做掩護，以便於他們進行反對我國革命、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當然，這是他們的事情。不過季諾維也夫竭力模仿這些先生，在這一問題上走上社會民主黨人的道路，那就不好了。

我所以引用恩格斯的公式並加以詳細闡述，有三點理由：

第一、把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公式和恩格斯的極完備地極明確地代表老一輩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的公式對照一下，使問題極端地明確起來；

第二、揭露那些竭力引用恩格斯的舊公式來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改良主義和

反革命本質；

第三、指明列寧是解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第一個人。

同志們，必須承認正是列寧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發現了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真理。不能夠抹殺理應屬於列寧的功績。不要懼怕真理，要有勇氣說出真理，要有勇氣公開地說，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列寧是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並肯定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的第一個人。

我這些話絕不是想說明作爲思想家的列寧比恩格斯或馬克思高出一籌。我這些話只是想說明兩件事情：

第一、無論恩格斯或馬克思是多麼有天才的思想家，絕不能要求他們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預見到五十多年以後，即在發達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寧，作爲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天才學生，能夠看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下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發現了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真理，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要善於區別馬克思主義的字句和實質，區別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方法。列寧所以能夠發現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真理，因爲他認爲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沒有做字

句的奴隸，他善於抓住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

關於這一點，列寧在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這樣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像卡爾·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天字第一號」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最大罪過，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的關頭應用它。』（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二頁）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道路，也是我們現在所走的道路，如果我們願意成爲徹底的革命者，今後也必須走這條道路。

列寧主義所以能够作爲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屹然不動，因爲它過去走的和現在還繼續走的正是這條道路。離開這條道路就等於跌進機會主義的泥潭。滑出這條道路就等於做社會民主黨的尾巴，季諾維也夫目前的情形正是這樣。

季諾維也夫在這裏說，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恩格斯舊公式的口氣改得緩和些，認爲無產階級革命也可能在個別國家內開始。他援引了恩格斯的一句話：『將由法國人開始，而由德國人完成。』（參見這都是對的。這是現在每一個蘇聯黨校的學生都知道的。但是，問題在於現在所講的並不是這件事情。說你開始革命吧，其他國家勝利的革命在最近期間就會來支持你的，而且在其他國家取得這種勝利的時候，你是可以指望勝利的，——這是一回事。說你開始革命並推進革命吧，要知道，即使其他國家的革命勝利在最近期間不能及時到來，在現在，在發達的帝國主義時期，鬥爭的條件使你仍然

能够取得勝利，然後燃起其他國家的革命，——這又是一回事情。

我引用恩格斯的舊公式，並不是爲了避開後來恩格斯和馬克思曾經把這個極明確的極完備的公式的口氣改得緩和些的事實，而是爲了：

(甲) 把兩個相反的公式加以對比，使問題明確起來；

(乙) 揭露那些竭力用恩格斯的舊公式做掩護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機會主義；

(丙) 指明列寧是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並肯定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的第一個人。

同志們，你們可以看出，我下面的話是對的：季諾維也夫沒有讀過『共產主義原理』，即使讀過也沒有讀懂，他以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來解釋恩格斯的舊公式，因而滾到機會主義的道路上去了。

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幾點意見

其次，我在我的報告中說過，在發達的帝國主義情況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也多少有些相似的情形。我說過，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爲摧毀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構而建立新的無產階級機構的專政）的問題上，馬克思那時（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把英國，大概也把美國，看做例外，因爲當時英美兩國的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還不大發展，當時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也許有可能用其他方法即『和平的』方法獲得政治統治。我說過，按照列寧的意見，馬克思的英美例外的說法或有限制的說法在當時

是正確的，在現在發達的帝國主義條件下，當英國和美國的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像其他國家一樣盛行的時候，已是不正確的和多餘的了。

同志們，讓我來引證馬克思的一段話吧。一八七一年四月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最後一章，你就會看到，我認爲法國革命下一次的嘗試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而應該把它摧毀……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嘗試正是這樣。』（引自列寧「國家和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六頁至三八七頁）

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是這樣寫的。

大家知道，一切形形色色的社會民主黨人，首先是考茨基，都死抓住這段話，並且武斷地說，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並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定不移的方法，也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一定了解爲摧毀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構而建立新的無產階級機構，由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是無產階級所應該爭取的道路。

對於這一點，列寧同志怎樣反應呢？他在他的「國家和革命」一書中，關於這個問題是這樣寫的：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

『在以上所引的馬克思的那段議論中，有兩個地方是值得特別指出來的。第一、他把他的結論只限於大陸。這在一八七一年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但還沒有軍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沒有官僚制度。所以，馬克思把英國除外，因為當時在英國，沒有一個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的先決條件，革命，甚至於人民革命，人們也認為是可能的，並且確實是可能的。

現在，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的這種有·限·制·的·說·法·已·經·失·去·時·效·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就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這個意義上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機關的污濁血腥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或美國，粉·碎·並·毀·壞·「現成的」（那裏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就達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程度）「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頁）你們可以看出，我們在這裏所說的，和我關於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勝利舊公式所談的是多少有點相似的。

當英國和美國還沒有發展的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的時候，馬克思的有限制的說法或英美例外的

說法是有其根據的。照列寧的看法，在壟斷資本主義的新條件下，當英國和美國的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已經發展到即使不甚於也決不亞於歐洲大陸各國的時候，這種有限制的說法就失去時效了。

因此，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即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切（絕無例外）帝國主義國家轉向社會主義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條件。

因此，各國機會主義者死抓住馬克思在一定條件下所假定的有限制的說法，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所維護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勾當。

列寧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他善於區別馬克思主義的字句和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他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看做教條而是看做行動的指南。

如果要求馬克思預見到幾十年以後的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發展的各種可能性，那就荒唐了。如果對列寧在這些可能性已經出現並且極為充分地展開的時候發現了並概括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下的這些可能性覺得詫異，那就更荒唐了。

曾經有人，大概是梁贊諾夫吧，從座中提出意見，他說馬克思把英國和美國看做例外，不僅在現在階級鬥爭的條件下是不正確的，就是在馬克思假定這個例外時的條件下也是不正確的。我不同意梁贊諾夫的意見。我認為梁贊諾夫錯了。無論如何，列寧的看法不是這樣，列寧完全肯定地說，馬克思給七十年代的英國和美國所作的這個假定是正確的。

列寧同志在他的「小冊子『論糧食稅』中關於這個問題寫道：

『當我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布哈林爭論時，他曾順便提出一個意見：在給專家以高額薪金的問題上，「我們」比列寧要右一些』，因為我們看不出這裏有任何違背原則的地方，我們記得馬克思說過，在一定條件下，對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是「從這個匪幫手裏贖買過來」（即從資本家匪幫，也就是從資產階級手裏贖買土地、工廠及其他生產資料）。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見。『……請仔細想想馬克思的意思。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是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是當時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國家，就工人向資產階級「贖買」而言，是當時「和平地」取得社會主義勝利最有可能的國家。所以馬克思說：在一定條件下，工人決不拒絕向資產階級贖買。至於對變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馬克思既沒有束縛自己的手脚，也沒有束縛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活動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變革時會有怎樣多的新問題發生，在變革進程中整個情況會怎樣變化，在變革進程中整個情況會怎樣頻繁而劇烈地變化。但在蘇維埃俄國，自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自從剝削者的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鎮壓下去以後，某些條件已經按照半世紀前本可在英國（假如英國當時已開始和平地轉到社會主義）形成的那些條件的模式而形成了，這難道不明顯嗎？那時英國有下列種種情況可以保證使資本家屈服於工人：（一）由於農民很少（在七十年代的英國已經有了一些徵象，可以指望社會主義在農業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就），工人即無產者在全國人口中完全佔優勢；（二）無產階級在工會裏具有高度組織性（當時英國在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三）在政治自由長期發展中受到訓練的無產階級

具有比較高的文化程度；（四）組織得極好的英國資本家——當時他們是世界各國中最有組織的資本家（現在這個第一位已經轉給德國了）——長期間慣於用妥協的方法去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就因為這些情況，當時才會產生英國資本家可能和平地屈服於○英國工人的思想……馬克思的話是極其正確的，他曾教導工人說：正是爲了便於過渡到社會主義，保存極大的生產組織是很重要的，如果（作爲一種例外，當時英國是例外）環境會迫使○資本家和平屈服，並在贖買的條件下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那就要給資本家付出較高的價錢，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許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一五頁至第三一七頁）很明顯，這裏正確的是列寧而不是梁贊諾夫。

三、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

我在我的報告中說過，列寧發現了並論證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列寧根據這個規律，根據不平衡的發展和尖銳化這一事實，得出了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國內勝利的思想。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對這個原理。托洛茨基說，列寧的這個原理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季諾維也夫也和托洛茨基一同說，從前，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比現在、比壟斷資本主義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

時期還要厲害，把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思想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聯繫起來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反對列寧的關於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著名原理，這一點是毫不奇怪的，因為大家知道這個規律推翻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此外，托洛茨基在這裏顯然轉到庸俗的觀點上去了。他在這裏把各別國家從前在經濟上的不均等（這種不均等並不總是引起也不總是能够引起這些國家躍進式的發展）跟帝國主義時期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混淆起來了。在帝國主義時期，各國間經濟上的不均等比從前小；但是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却比從前厲害得不可比擬，比從前尖銳，而且這種不平衡一定和必不可免地引起躍進式的發展，使原來工業落後的國家在相當短促的時間內趕過先進的國家，這就不能不造成大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前提和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前提。

幾乎用不着證明，這樣把兩個絕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來，並不說明也不能說明托洛茨基的『理論』水平很高。

但是我不能了解季諾維也夫，他本來是個布爾什維克，並且受過一點布爾什維主義的熏陶，怎敢不怕跌入超帝國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泥潭，竟斷言發展的不平衡從前比現在，比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還要厲害呢？怎能斷言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思想和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沒有關係呢？難道不知道列寧正是從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中得出這個思想嗎？例如下面所引的列寧的話就是講的這個

問題：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①：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是根據什麼得出來的呢？

它是根據：

（一）舊的、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已經轉化並發展為壟斷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了；

（二）世界已經被瓜分成各帝國主義集團和列強的勢力範圍；

（三）世界經濟是在各帝國主義集團為爭奪市場、爭奪原料、擴大原來的勢力範圍而進行劇烈的

決死鬥爭的情況下發展的；

（四）這種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躍進的，它的方式是把原來跑在前面的國家擠出市場而把新興的國家推到前面；

（五）這種發展方式所以產生，是由於某些帝國主義集團有可能最迅速地發展技術、減低商品價格並從另一些帝國主義集團手裏奪取市場；

① 舊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

(六) 這樣，週期性地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就成為絕對必要了；

(七) 這樣，這種重新瓜分就只能用暴力的方法即用武力檢查各個帝國主義集團實力的方式來進行了；

(八) 這種情形就不能不引起各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激烈的衝突和大規模的戰爭；

(九) 這種情形必然使帝國主義者相互削弱而造成在個別國家內突破帝國主義戰綫的可能性；

(十) 在個別國家內突破帝國主義戰綫的可能性，不能不給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造成有利的條件。

是什麼情況使帝國主義條件下的不平衡尖銳化、不平衡的發展具有決定的意義呢？

是兩種主要的情況：

第一、帝國主義集團已把世界瓜分完畢，地球上再沒有『自由的』土地了，因而通過帝國主義戰爭來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以求得經濟『均勢』就成為絕對必要了；

第二、技術（就廣義而言）的空前巨大的發展，使一些帝國主義集團在爭奪市場、爭奪原料產地等鬥爭中易於越過和超過另一些帝國主義集團。

但是，這兩種情況僅僅在發達的帝國主義時期才有了發展並達到了頂點。事情也只能如此，因為只有在帝國主義時期才能把世界瓜分完畢，而巨大的技術上的可能性也只在發達的帝國主義時期才出現。

這一點也應該用來解釋下面的事實：從前英國在工業方面能够走在各國前面，一百多年來把各國丟在後面，可是後來，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德國只須二十年就開始超過英國，而美國用更短的時問就越過了歐洲各國。

既然如此，怎麼能够武斷說發展的不平衡從前比現在更厲害，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思想和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沒有關係呢？

只有理論上的庸人才會把過去各工業國經濟上的不均等和只在發達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才特別強烈、特別尖銳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混淆起來，這難道不明顯嗎？

只有對列寧主義的完全無知才會使季諾維也夫和他的朋友們極其荒謬地反對列寧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著名原理，這難道不明顯嗎？

二 加米涅夫在爲托洛茨基打掃道路

加米涅夫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發言的主要用意在哪裏呢？如果撇開加米涅夫所講的一些瑣碎問題和他慣用的外交辭令，那末他的發言的用意在於使托洛茨基便於爲自己的立場辯護，使托洛茨基在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國內勝利這一基本問題上便於反對列寧主義。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加米涅夫擔當一種『工作』，就是要證明列寧的一篇論述社會主義可能在一

個國家內勝利的重要文章（一九一五年）似乎與俄國無關，證明列寧在講到這種可能的時候，指的並不是俄國而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可見加米涅夫担當起這種可疑的『工作』就是爲了給托洛茨基打掃道路，因爲托洛茨基的『公式』已經被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所寫的論文駁倒，而且不會不被駁倒。

說得粗一點，加米涅夫是給托洛茨基當打掃道路的清道夫的角色。（笑聲）當然，看到列寧研究院院長給托洛茨基當清道夫角色是可悲的，這倒不是因爲清道夫的工作有什麼不好，而是因爲加米涅夫無疑是一個高明的人，我以爲他可以從事其他更高明一點的工作。（笑聲）但是，他甘願担任這個角色，當然，他完全有權這樣做，這是沒有辦法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加米涅夫當好了這個非常奇怪的角色沒有。

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說中說列寧在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提出的基本原理，即規定我國革命和我國建設的整個路線的原理，說明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原理，和俄國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什麼關係，說列寧講到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時所指的不是俄國而只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這真是不可思議並且駭人聽聞，這簡直像是對列寧同志的公開誹謗，但加米涅夫大概顧不到黨對他偽造列寧學說會有怎樣的看法。他所關心的只是一件事情：不惜任何代價去給托洛茨基打掃道路。

他企圖怎樣論證這種奇怪的武斷呢？

他說，列寧同志在寫了上述那篇文章以後兩個星期，又發表了一篇論俄國即將到來的革命的性質的著名提綱（5），列寧在提綱中說，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僅限於取得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

利，列寧說這些話的出發點，似乎是俄國革命應該停留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而不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既然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文章所論述的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那末很明顯，列寧在這篇文章中所指的也就不會是俄國了。

這樣，在加米涅夫看來，列寧對俄國革命規模的了解竟和左派資產階級革命者或社會民主黨人一類的改良主義者一樣了。照這些人的看法，資產階級革命不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照這些人的看法，在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應該有一個很長的歷史停頓時期，很長的中斷時期，至少是幾十年的間歇時期，在這一段時期中，資本主義將繁榮發展，而無產階級則苟且偷安。

這樣說來，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寫這篇文章時，沒有想，沒有要，也沒有力求由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立刻轉入社會主義革命了。

你們會說：這簡直不可思議並且駭人聽聞。是的，加米涅夫這個論斷確實不可思議並且駭人聽聞。但這是不會使加米涅夫難為情的。

讓我引證幾個文件來說明加米涅夫在這個問題上是粗暴地偽造列寧同志的意見。

請看，早在一九〇五年，當俄國革命的規模還沒有像而且不可能像後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前由於帝國主義戰爭才形成的那樣巨大的時候，列寧同志關於俄國革命的性質是怎樣寫的：

『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並且恰恰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

一二頁

這段話引自列寧一九〇五年九月發表的一篇文章。

加米涅夫知道不知道有這篇文章呢？我想，列寧研究院院長是應該知道有這篇文章的。

可見列寧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不是看做無產階級鬥爭和整個革命的終結，而是看做第一階段和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階段。

但是，也許列寧後來改變了他對俄國革命的性質和規模的看法吧？讓我們來看看另一個文件。我指的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即列寧同志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那篇重要文章發表以後三個月發表的一篇文章。請看列寧在這篇文章裏是怎樣說的：

「無產階級現在爲奪取政權、爲建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也就是說，爲吸引農民，爲盡量吸取農民的革命力量，爲吸引「非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參加使資產階級俄國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即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奮鬥，將來也要不屈不撓地爲此目的而奮鬥。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俄國由沙皇制度及地主的土地佔有權之下所獲得的這種解放，聯合歐洲各國的無產者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⑤，而不是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業工人。」（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頁至第三八三頁）

① ② ③ 蕭重號是我加的。
——斯大林

你們可以看出，無論在這一段或上一段引文裏，無論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五年，列寧的出發點都是：資產階級革命在俄國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俄國的勝利是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是爲了立刻轉入它的第二階段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第一階段。

那末，應該怎樣理解加米涅夫在其演說中所引的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寫的講述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提綱呢？這個提綱是不是和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矛盾呢？當然不矛盾。相反地，這個提綱的基礎正是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俄國革命由第一階段轉入第二階段的思想。第一、列寧在這個提綱中根本沒有說過俄國革命的規模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僅限於推翻沙皇和地主，僅限於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二、列寧所以在這個提綱中僅僅闡明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因爲他認爲這個革命是第一階段，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最近任務。第三、列寧認爲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執行自己的任務不應從第二階段（像托洛茨基通過『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這個公式所提的那樣）而應從第一階段開始，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開始。

這和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有沒有一點矛盾，哪怕是矛盾的影子呢？顯然沒有。

可見加米涅夫公然偽造了列寧的觀點。

但是，我們用來反駁加米涅夫的證據不僅有出自列寧手筆的文件，而且有活的人，例如像托洛茨基，像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就是，甚至說來真奇怪，連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本人也都是。

大家知道，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文章是在一九一五年發表的。大家知道，當時在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上曾和列寧同志爭論的托洛茨基就在一九一五年那年也專門寫了一篇批評文章來回答列寧的這篇文章。當時，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批評文章中說了些什麼呢？他對列寧同志的文章怎樣評價呢？他對這篇文章是怎樣理解呢？是理解爲列寧講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時指的不是俄國，還是另一種理解，例如，像現在我們大家所理解的那樣呢？請看托洛茨基這篇文章中的一段話：

『爲反對聯邦口號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體的歷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當時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列寧的上述論文就是在該報上發表的。——斯大林註）歸結爲下面的一句話：「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社會民主黨人報」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因而每一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無須以建立歐洲聯邦爲其先決條件……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當在自己的鬥爭中「等待」其他國家，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爲使國際間同時行動的思想不致爲國際間消極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這個道理反覆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事實並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或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孑然獨存，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頁至第九

由此可見，托洛茨基當時對列寧的文章的理解並不像加米涅夫現在竭力要『理解』的那樣，而是和列寧對這篇文章的理解，和黨對它的理解，和我們大家對它的理解是一樣的，否則，托洛茨基在和列寧的爭論中就不會拿俄國做論據來支持自己了。

由此可見，托洛茨基在這段引文中是反對他現在的盟友即反對加米涅夫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在這次會議上不起來反對加米涅夫呢？為什麼托洛茨基不在這裏開誠佈公地聲明加米涅夫公然歪曲列寧呢？托洛茨基是不是以為他在這件事情上默不作聲就可以被認為是誠實的論戰的榜樣呢？托洛茨基不在這裏起來反對加米涅夫，大概是因為他不願意被牽連到這個公然誣蔑列寧的可疑的『事件』裏去，——他把這種卑鄙醜惡的勾當讓給加米涅夫去幹了。

可是黨，例如代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怎樣呢？關於這個問題，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決議中這樣說：

「從『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中，列寧同志正確地總結出了兩點：（甲）可能『社會主義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乙）可能這少數或者甚至一個國家不一定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參看評蘇漢諾夫的札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

記)。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①，首先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在若干有利的條件下，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的第一個國家能够在國際無產階級一定的支持下長期堅持下去，鞏固起來，甚至在這種支持不是以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形式出現時也能如此。』（摘自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卷五））

由此可見，以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爲代表的整個黨是反對加米涅夫的，是反對他硬說列寧在論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文章中似乎指的不是俄國的，否則代表會議就不會說『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著名文章是正確的了。

由此可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對列寧同志的文章的理解和列寧對它的理解，和托洛茨基對它的理解、和我們大家對它的理解是一樣的。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對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這一決議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決議草案是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參加的委員會起草並一致通過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加米涅夫曾是一致通過上述決議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主席，而季諾維也夫則是這個決議的報告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怎麼會投票贊成這個決議，贊成這個決議的各項條文呢？加米涅夫當時對列寧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直接被引用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裏）的理解和他現在竭力要『理解』的不同，這不是很明顯的嗎？應該相信哪一個加米涅夫呢？相信那個擔任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主席的、投票贊成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的加米涅夫呢，還是相信那個現在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充當托洛茨基的清道夫的角色？

由此可見，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時期的加米涅夫是反對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時期的加米涅夫的。

爲什麼季諾維也夫一聲不響，也不打算糾正公然偽造一九一五年列寧的文章和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的加米涅夫呢？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維護過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決議的是季諾維也夫而不是什麼別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由此可見，季諾維也夫在這裏並不完全乾淨。（喊聲：『不乾淨透啦！』）這算什麼誠實的論戰呢？由此可見，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現在顧不到誠實的論戰了。

那末，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加米涅夫沒有當好托洛茨基的清道夫的角色。他辜負了托洛茨基的厚望。

三 不可思議的糊塗想法或季諾維也夫論革命性和國際主義

現在我來談談季諾維也夫。如果說加米涅夫的整個發言是竭力爲托洛茨基打掃道路，那末，季諾

維也夫承擔的任務就是證明反對派的首領們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革命家和絕無僅有的國際主義者。

我們來研究一下他的『理由』。

他引用了布哈林的一段話：在觀察國內問題（社會主義建設）時，照方法論應該撇開國外問題，接着他就把布哈林的這個論點和關於反對派聯盟的提綱（裏面談到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可能性）對照了一下，於是得出一個結論，說布哈林和基本上批准了這個提綱的中央委員會似乎都因此而忘記了我國革命的國際任務，忘記了國際革命的利益。

這些話對不對呢？同志們，這些話是毫無意義的。其中秘密在於季諾維也夫在方法論問題上很差，碰到三棵松樹就糊塗得迷了路，並把自己的糊塗想法當做實際情況了。布哈林是說，不可以把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和建立使我國不受武裝干涉的保障的問題即國內問題和國外問題混為一談。布哈林絕不是說，國內問題和國外問題即國際問題沒有聯系。他只是說，不能把第一類問題和第二類問題混淆起來。這是方法論的基本的和起碼的要求。如果季諾維也夫連方法論中起碼的問題都不懂，那又能怨誰呢？

我們認為我國有兩種矛盾：國內矛盾和國外矛盾。國內矛盾首先在於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我們說，這種矛盾我們是能够靠本身的力量來克服的，我們能够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能够吸引基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國外矛盾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包圍的鬥爭。我們說，這種矛盾我們只靠本身的力量是

不能解決的，要解決這種矛盾，必須社會主義至少在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助力、手段和工具。

這些話對不對呢？讓季諾維也夫去證明這是不對的吧。

季諾維也夫糟糕的是他看不出這兩種矛盾的區別，荒謬絕倫地混淆這兩種矛盾，把自己的糊塗想法當做『真正的』國際主義，而認為誰在觀察國內問題時照方法論撇開國外問題，誰就是忘記了國際革命的利益。

這話很可笑，但是要知道，它沒有說服力。

至於所謂提綱中忽略了我國革命的國際因素，那只要讀一讀這個提綱，就會知道季諾維也夫又弄糊塗了。請看提綱中是怎樣講的吧：

『黨的出發點是：我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不僅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而且第一、它是進一步展開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第二、它在蘇聯開始了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如果對農民實行正確的政·策·，無·產·階·級·就·能·夠·順·利·地·而·且·一·定·順·利·地·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還·需·要·一·方·面·國·際·革·命·運·動·的·力·量·和·另·一·方·面·蘇·聯·無·產·階·級·的·力·量·都·強·大·得·足·以·保·衛·蘇·聯·免·於·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才·行。』^①

你們可以看出在提綱中國際因素是完全而充分地被考慮到的。

其次，季諾維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都從列寧的著作中引用了這樣一段話：『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內的完全勝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幾個先進國家最積極的合作』，——於是就荒唐地得出一個結論：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是我國無產階級所不能勝任的事情。可是，同志們，這是糊塗想法！難道黨什麼時候說過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完全勝利即最後勝利是可能的，是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勝任的嗎？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說過這樣的話，請給我們指出來。難道黨現在沒有說，過去也一向沒有和列寧一起說過，只有當社會主義在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即最後勝利才有可能嗎？難道黨沒有解釋過幾十次幾百次，不可以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即最後勝利混淆起來嗎？

黨始終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就是在這個國家內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並且這個任務是可以利用一個國家的力量來解決的，而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則是有免除外國武裝干涉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保障，並且這個任務只有在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條件下才能解決。既然如此，怎麼還能荒謬絕倫地把一個任務和另一個任務混淆起來呢？季諾維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都荒謬絕倫地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即最後勝利混淆起來，這又能怨誰

呢？他們只要看看衆所周知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就會明白，決議對這個問題已經解釋得很明白，甚至連蘇聯黨校的學生也會感到滿意。

季諾維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從列寧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好幾段話，其中說到外來的敵人可能摧毀我國的革命。但是，這些話和我國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無關，這難道不容易理解嗎？列寧同志說，我們還沒有免除可能的武裝干涉的保障，而這完全是正確的。但是，難道黨什麼時候說過，我們只憑本身的力量就能保障我國免於武裝干涉的危險嗎？難道黨過去和現在不是一直肯定地說，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才能保障我們免於武裝干涉嗎？怎麼能根據這一點就武斷說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是我國無產階級所不能勝任的呢？現在應該停止這種對國外問題即同世界資產階級直接鬥爭問題和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即戰勝我國內部資本主義成分問題有意的混淆了。

其次，季諾維也夫從『共產黨宣言』中引出一句話：『共同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國家工人的共同努力，乃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一個首要條件』，他把這句話和列寧同志一篇手稿中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勝利需要幾個先進國家工人的共同努力』那句話對照了一下，於是得出一個結論，說我們黨似乎違背了這些公認的、絕對的原理，忘記了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的國際條件。同志們，這豈不可笑嗎？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我們黨曾經低估過國際工人階級的努力和我國革命獲得勝利的國際條件的決定意義呢？共產國際如果不是這種把無產者（不僅是各先進國家的，而且是世界各國的無產者）

的努力聯合起來以促進世界革命並發展我國革命的表現又是什麼呢？發起組織共產國際並成為共產國際的先進部隊的，不是我們黨又是誰呢？工會的統一戰綫政策不是既聯合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努力，又聯合所有一切國家的工人的努力又是什麼呢？誰能否認我們黨在執行全世界工會的統一戰綫政策方面所起的頭等重要的作用呢？我國革命過去和現在一直在支持世界各國革命的發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世界各國的工人過去和現在都以他們對我國革命的同情和反對武裝干涉企圖的鬥爭來支持我國革命，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這不是把世界各國工人的努力聯合起來使我國革命獲得勝利又是什麼呢？英國工人反對克遜臭名遠揚的照會（*艾*）的鬥爭又是什麼呢？蘇聯工人對英國煤礦工人的支持又是什麼呢？同志們，如果有必要，我還可以引證許多這一類盡人皆知的事實。

這哪裏是忘記了我們革命的國際任務呢？

秘密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秘密在於：季諾維也夫企圖用世界各國無產者共同努力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來代替我國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可能建成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來代替在現今的國際條件下俄國的無產階級政權能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這個根本問題。

季諾維也夫現在的老師托洛茨基說：

『……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頁）

季諾維也夫現在的老師托洛茨基說：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懷疑的。』（『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

可見季諾維也夫是用歐洲和俄國的工人共同努力的問題來代替在歐洲無產階級勝利（『歐洲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的條件下我國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問題。

問題就在這裏，我們爭論的也就是這一點。

季諾維也夫引證列寧的著作和『共產黨宣言』，企圖用一個問題來代替另一個問題。

季諾維也夫所要的關於我們黨『忘記了』我國革命的國際任務的把戲，其秘密就在這裏。

季諾維也夫的戲法、糊塗想法和思想混亂的秘密就在這裏。

季諾維也夫居然『謙遜地』把自己頭腦中這種不可思議的糊塗想法，這種一團糟和思想混亂拿出來當做反對派聯盟的『真正的』革命性和『真正的』國際主義。

同志們，這一切不是很可笑的嗎？

在我們這個時代，在我們黨的隊伍中，要想做一個國際主義的革命者，就要用一切方法來鞏固並竭盡全力來支持我們這個同時是共產國際先進部隊的黨。可是反對派分子在破壞並誹謗我們的黨。

在我們這個時代，要想做一個國際主義者，就要用一切方法來鞏固並竭盡全力來支持共產國際。可是反對派分子在瓦解並破壞共產國際，在支持並指導各種各樣的馬斯洛夫分子和蘇瓦林分子。

現在總該懂得了，同我們黨，同這個共產國際的先進部隊處於戰爭狀態，是不能成為革命者和國

際主義者的。(鼓掌)

現在總該懂得了，他們既對共產國際開戰，也就不再是革命者和國際主義者了。(鼓掌)

現在總該懂得了，反對派分子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國際主義者，而是空談革命、空談國際主義的傢伙。(鼓掌)

現在總該懂得了，他們不是實際的革命者，而是空叫空喊的革命者，影片上的革命者。(笑聲，鼓掌。)

現在總該懂得了，他們不是實際的革命者，而是銀幕上的革命者。(笑聲，鼓掌。)

四 托洛茨基偽造列寧主義

一、托洛茨基的戲法或『不斷革命』的問題

我現在來談談托洛茨基的發言。

托洛茨基聲明：不斷革命論跟我們所討論的我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毫無關係。

這是很奇怪的，如果不講得更重些。怎麼會這樣呢？難道不斷革命論不是關於革命動力的理論嗎？不斷革命論首先論述我國革命的動力，這難道不對嗎？我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如果不是我國革命的動力問題又是什麼呢？怎麼可以說不斷革命論和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毫無關係呢？同志們，

這是不對的。這是要花招，變戲法。這是企圖隱藏起狐狸尾巴。這是企圖隱藏自己的原形。白費氣力！別想隱藏吧，反正是隱藏不了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說的另一個地方竭力『暗示說』，他早就不再認為不斷革命論有重大意義了。而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說中則『示意說』，托洛茨基現在恐怕不反對拋棄不斷革命論了，也許他已經把它拋棄了。

怪事，真是怪事！

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吧。說不斷革命論和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沒有關係，這話對不對呢？如果不對，那末，加米涅夫說托洛茨基現在已不再重視不斷革命論並且差不多已把它拋棄了，這話能不能相信呢？

我們來看看文件吧。我所指的首先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給奧里明斯基同志的信。這封信曾於一九二五年在報上發表過。托洛茨基從來沒有打算拋棄這封信上的觀點，而且直到現在也沒有直接或間接地拋棄它，因此，這封信現在還是完全有效的。這封信關於不斷革命論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請聽吧：

『我絕不認為我和布爾什維克的意見分歧全是我不對。在對孟什維克派的估計方面是我不對，而且是根本不對，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計高了，希望能夠孤立並完全消滅它的右翼。但是，

這個根本錯誤之發生，是因為我用不斷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的觀點來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這兩個派別，而在那個時期無論布爾什維克或孟什維克都是堅持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共和國的觀點的。當時我認為兩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在原則上並不怎麼厲害，我並且希望（我在信件和報告裏曾屢次表示過這種希望）革命進程本身能把兩派引導到不斷革命和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立場上，而且這在一九〇五年已經部分地實現了。（列寧同志為考茨基的論俄國革命動力一文寫的序言和『開端報』的整個路綫）

我認為我對革命動力的估計是絕對正確的，而我根據這個估計對兩派所做的結論則是絕對不正確的。只有布爾什維主義由於自己的不調和的路綫，才把舊知識界和工人階級先進階層中的真正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隊伍裏。只有由於布爾什維主義建立了這種革命的、緊密團結的組織，才可能那麼迅速地從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轉變為革命社會主義的立場。

現在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我同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進行論戰的文章分做兩大類：一類是關於分析革命的內部力量和關於革命的前途（見羅莎·盧森堡主編的波蘭理論性機關刊物『新時代』雜誌）的文章，另一類是關於對俄國社會民主黨各派的估計、關於各派別的鬥爭等等的文章。第一類文章，就是現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為這些文章從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全全符合我們黨的立場。第二類文章顯然是錯誤的，不值得再版了。（『列寧論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版，附有奧里明斯基同志的序言）

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托洛茨基在組織問題上錯了，而在對我國革命的估計問題上，在不斷革命問題上，他過去和現在都是對的。

固然，托洛茨基不會不知道，列寧是至死一直反對不斷革命論的。但是這竟沒有使他感到不安。其次，這就是說，這兩派，無論是孟什維克或布爾什維克，都應該接受不斷革命論，但是事實上接受了這個理論的只有布爾什維克，因為他們有工人和舊知識分子組成的革命的緊密團結的組織，而且他們也不是一下子就接受，而是『從一九一七年起』才開始接受的。

最後，這就是說，不斷革命論『從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們黨的立場』。

現在，請你們自己判斷吧，這像不像托洛茨基已經不很重視不斷革命論了呢？不，不像。相反地，假如不斷革命論『從一九一七年起』真的符合黨的立場，那末由此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托洛茨基過去認為、現在還繼續認為這個理論對我們全黨具有決定的意義。

但是，『符合』是什麼意思呢？既然證明了以列寧為代表的我們黨一直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那末，這個理論怎麼能够符合我們黨的立場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黨不曾有過自己的理論，後來為事勢的發展所迫，不得不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或者是我們黨本來有自己的理論，但是這個理論『從一九一七年起』就不知不覺地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排擠掉了。

這個『疑團』，托洛茨基後來在他一九二二年給『一九〇五年』一書寫的『序言』裏給我們做了解釋。托洛茨基說明了不斷革命論的實質，並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來分析對我國革命的估計，而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雖然事隔十二年，但這個估計還是全部證實了。』（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

換句話說，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構成的』不斷革命論，經過了十二年，在一九一七年就『全部證實了』。

但是，這個理論怎麼能證實了呢？而布爾什維克呢，他們藏到哪裏去了？難道他們沒有任何自己的理論就幹起革命來了嗎？難道他們的本領就只是會團結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工人嗎？還有：他們是在什麼基礎上、根據什麼原則來團結工人的呢？布爾什維克不是有過理論，有過對革命的估計，對革命動力的估計嗎？難道除了不斷革命論，我們黨就不會有過任何別的理論嗎？

請你們自己判斷吧：我們布爾什維克過去是在沒有前途、沒有革命理論的情況下生存並發展的；我們從一九〇三年起就這樣混到了一九一七年；後來，『從一九一七年起』，不知不覺地吞下了不斷革命論，這才站住了腳。不容爭辯，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童話。但是，這件事怎麼能在黨內不知不覺地、沒有鬥爭地、沒有波動地就過去了呢？這件事怎麼能够這樣簡單地、無緣無故地就發生了呢？大家都知道，列寧和他的黨是從不斷革命論出現的第一天起就和這個理論進行了鬥爭的。

然而這個『疑團』，托洛茨基在另一個文件裏給我們做了解釋。我指的是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給

『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文所寫的『說明』。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那篇『說明』裏有關的一段話：

『孟什維克由「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個抽象的概念出發，認為無產階級的全部策略應該遷就自由資產階級的行動，直到由自由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布爾什維克也由「是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種空洞抽象的概念出發，認為掌握着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要自願地去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限制。不錯，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孟什維主義的反革命方面現在已經暴露無遺，而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勝利時才有極大的危險。』（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五頁）

這樣說來，不僅孟什維主義有它的反革命方面，而且連布爾什維主義也沒有擺脫『反革命特性』，而這種特性『只有在革命勝利時才具有極大的危險』。

布爾什維克後來是不是擺脫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性』呢？如果是擺脫了，那末是怎樣擺脫的呢？

這個『疑團』，托洛茨基在『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文的『說明』裏給我們做了解釋。請聽吧：

『大家知道，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因為布爾什維主義在列寧同志的領導下，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即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完成了（不是沒有經過內部鬥爭的）思想上

的改造。』（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五頁）

總之，『從一九一七年起』，根據不斷革命論，布爾什維克進行了『改造』，因此，布爾什維克從『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性』中解救出來，不斷革命論就這樣終於『全部』『證實了』，——這就是托洛茨基的結論。

但是，列寧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布爾什維克對我國革命及其動力的估計等等都藏到哪裏去了呢？這些理論和估計或者沒有『全部證實』，或者完全沒有『證實』，或者爲了黨的『改造』而讓位給不斷革命論，自己却銷聲匿跡了。

總之，從前世界上有過這樣的布爾什維克，他們從一九〇三年『起』勉強強強『拼湊了』一個黨，但是沒有革命的理論，他們從一九〇三年『起』摸索來摸索去，勉強強強混到一九一七年，後來發覺托洛茨基手裏捧着不斷革命論，於是決定進行『改造』，而在『改造』之後，就把列寧主義即列寧的革命理論丟得乾乾淨淨，這樣就使不斷革命論『完全符合』我們黨的『立場』了。

同志們，這是很有趣的童話。不妨說，這是在馬戲團裏可以看到的精彩的戲法之一。但是，要知道我們這裏不是馬戲團而是我們黨的代表會議。要知道我們也沒有僱托洛茨基來當馬戲演員。變這種戲法有什麼用呢？

列寧同志怎樣評價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呢？列寧在他一篇文章裏談到這個理論，嘲笑它是『奇特的』、『漂亮的』理論。他寫道：

「闡明即將到來的革命中的各階級的相互關係是革命政黨的首要任務…… 這個任務，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言論報』裏解決得不正確，他重複着他的一九〇五年的『奇特的』理論，而不肯想一想究竟由於什麼原因整整十年的實際生活都沒有理睬這個漂亮的理論。」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論從布爾什維克這裏攝取了號召無產階級進行堅決革命鬥爭並奪取政權的思想，而從孟什維克那裏攝取了「否認」農民作用的思想…… 這樣『托洛茨基實際上是幫助俄國那些把「否認」農民的作用理解為不願意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工人政治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頁至第三八二頁）

可見在列寧看來，不斷革命論是忽視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半孟什維主義理論。只是不明白這種半孟什維主義理論怎麼能够——即使是『從一九一七年起』——『完完全全符合』我們黨的立場。

我們黨怎樣評價不斷革命論呢？請看衆所周知的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關於這個理論是怎樣寫的：

『「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這一論斷，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組成部分，這種論斷是要使蘇聯無產階級在目前採取聽天由命的消極態度。列寧同志反駁這一類的「理論」說：「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背得爛熟的一條論據，已成為他們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這條

論據就是我們還沒有成長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或像他們的各種『博學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評蘇漢諾夫的札記）（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九））

可見不斷革命論就是列寧同志在他的『論我國革命』的札記中痛斥爲社會民主主義的那個蘇漢諾夫主義。

只是不明白這種理論怎麼能够『改造』我們布爾什維克黨。

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說中『示意說』，托洛茨基放棄了自己的不斷革命論。他從托洛茨基寫給反對派分子的最近一封信（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引了下面一段極其含糊的話來證實這一點：

『我們認爲經驗已經不可辯駁地證明了，在一切多少帶有原則性的問題上，無論我們中間有誰和列寧發生分歧，真理一定在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方面。』

然而，加米涅夫對於托洛茨基隨即在同一封信裏所作的推翻上述聲明的聲明却隻字不提。這個聲明是：

『列寧格勒的反對派堅決反對了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爲它是在理論上爲民族狹隘性辯護。』（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的信，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和十一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速記記錄的附件）

托洛茨基的第二個聲明既然把第一個聲明推翻了，那末，他那語意含糊、毫不負責的第一個聲明

還有什麼意義呢？

不斷革命論是什麼呢？就是列寧的『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否定。

列寧的『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什麼呢？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否定。

加米涅夫從托洛茨基的信裏摘引了第一段話，而對第二段話却隻字不提，他是想迷惑並欺騙我們黨，這還不明顯嗎？

但是，欺騙我們黨可不那麼容易。

二、玩弄引文或托洛茨基偽造列寧主義

同志們，你們是否注意到托洛茨基的整篇演說裏堆滿了摘自列寧著作的各種各樣的引文？讀了這些從列寧的不同文章中割裂出來的引文，還是不明白托洛茨基的主要意圖是什麼，是靠引文來鞏固自己的立場呢，還是想『抓住』列寧同志的『矛盾』？他從列寧的著作中摘錄了一大堆論述武裝干涉的危險只有在幾個國家革命獲得勝利的情況下才能克服的引文，看來是想藉此『揭穿』黨的立場的。但是他不懂得，或者是不願意懂得，這些引文並不是反對黨的立場而是擁護黨的立場、反對托洛茨基的立場的，因為黨對外來危險比重的估計和列寧的路線是完全一致的。他又摘錄了論述沒有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不可能獲得完全勝利的另一大堆引文，力圖加以玩弄。但是他不懂得，或者是不願意懂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有免除武裝干涉的保障）和社會主義的一般勝利（建成社會

主義社會）是不能混爲一談的；他不懂得，或者是不想懂得，他摘自列寧著作的這些引文，並不是反對黨而是擁護黨、反對托洛茨基的立場的。

托洛茨基摘錄了一大堆與問題無關的各種引文，但不願意談到列寧那篇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主要文章（一九一五年），他大概以爲加米涅夫已經用自己的發言使他平安地從這篇批判他的文章裏脫身出來了。但是，現在可以認爲已經完全證實加米涅夫並沒有演好他自己的角色，列寧同志的文章依然非常有力。

其次，托洛茨基又從列寧同志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引了一段話，說他們對於當前政策中的農民問題沒有分歧意見。但是，他忘記說，列寧這篇文章不僅沒有解決，甚至沒有提到托洛茨基和列寧由於我國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在農民問題上發生分歧的問題。

其實這說明托洛茨基摘錄引文變成了毫無意思地玩弄引文。

托洛茨基企圖證明，在依靠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我國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上，他的立場是和列寧的立場『符合』的。但是，怎麼能够證明那無法證明的事情呢？

列寧的『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00]的論點，和托洛茨基的『……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的論點怎能相容呢？

其次，列寧的『這個國家（一個國家。——斯大林註）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101]這個論點，和托洛茨基的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的論點怎能相容呢？

最後，列寧的『在其他國家的革命還沒有到來時，只有聯合農民才能拯救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論點，和托洛茨基的『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的論點怎能相容呢？

再看，在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問題上，托洛茨基的立場和孟什維克奧·鮑威爾的立場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奧·鮑威爾認為：

『在無產階級僅佔人口極少數的俄國，無產階級只能暫時建立自己的統治』，『只要全國農民羣衆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無產階級就必然會重新喪失自己的統治』，『只有工業西方的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才能保障工業社會主義』在俄國的『長期統治』。

托洛茨基對鮑威爾比對列寧要接近得多，這難道還不明顯嗎？托洛茨基的立場是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立場，托洛茨基實際上否認我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這難道不對嗎？

托洛茨基說現在的歐洲已不是保守的而多少是自由的，假如歐洲還真是保守的，那末我國無產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了。他企圖用這樣的議論來論證他的在保守的歐洲面前不能保持無產階級政權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

的論點。但是，托洛茨基在這裏糊塗到了極點，這難道很難了解嗎？把現在的，比如意大利，或者英國，或者法國究竟算做保守的還是自由的呢？現在的美國究竟是保守的還是自由的國家呢。這樣『精細地』和可笑地強調保守的歐洲和『自由的』歐洲的區別，對於我們共和國的完整能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共和制的法國和民主制的美國，在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時期，沒有像君主制的和保守的英國一樣來干涉我們國家嗎？

托洛茨基關於中農問題講得特別多。他從列寧在一九〇六年時期的著作中引了一段話。列寧在這段話裏預言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一部分中農可能跑到反革命方面去。看來，托洛茨基力圖藉此證明這段引文是和他對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的農民問題的觀點『符合』的。不難了解，托洛茨基在這裏是把不能比較的東西拿來比較。托洛茨基慣於把中農看做『自在之物』，看做一種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但是，布爾什維克對中農從來沒有這樣的看法。

托洛茨基大概忘記了布爾什維克對基本農民羣衆有三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用的，第二個方案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用的，第三個方案是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用的。

在第一個時期，布爾什維克說：和全體農民一道，中立自由資產階級，反對沙皇和地主，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

在第二個時期，布爾什維克說：和貧苦農民一道，中立中農，反對資產階級和富農，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中立中農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中農放在無產階級的政治監視之下，不信任他

們，並採用一切辦法使他們不能脫出我們的手。

在第三個時期，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布爾什維克說：和貧農一道，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反對我國城鄉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奮鬥。

誰混淆這三個方案，混淆這反映我國革命三個不同時期的三種不同路線，誰就絲毫也不懂得布爾什維主義。

列寧說，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有一部分中農會投到反革命方面去，這是完全正確的。例如在『烏發政府』(Ufa)時期就發生過這樣的情形，當時在伏爾加河流域有一部分中農投到反革命方面，投到富農方面去了，而大部分中農則動搖於革命和反革命之間。並且也不會不這樣。中農之為中農，正因為他們觀望等待，猶豫動搖：『誰知道哪一方面會勝利呢，還是等一等好。』只是在對國內反革命取得最初幾次重大勝利以後，特別是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中農才開始確定地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顯然，他們已經確信沒有政權是不行的，布爾什維克的政權是強大的，和這個政權合作是唯一的出路。正是在這個時期，列寧同志說了有先見之明的話：『我們已進入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此時必須具體地詳細地制定一種為農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以這種規則和指示為準繩而對中農採取鞏固聯盟的立場。』（列寧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頁至第一二五頁）

中農問題就是這樣。

托洛茨基的錯誤在於他形而上學地對待中農問題，把中農看做『自在之物』，因而使問題混亂不清，歪曲並偽造了列寧主義。

最後，問題決不在於無產階級現在和將來還可能同一部分中農發生矛盾和衝突。黨和反對派的意見分歧決不在這上面。意見分歧在於：黨認為這些矛盾和可能發生的衝突用我國革命本身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則認為這些矛盾和衝突『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夠克服。

托洛茨基玩弄引文，企圖把這些意見分歧藏到什麼角落裏去。但是我已經說過，要欺騙我們黨是辦不到的。

那末，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要做一個辯證論者而不要做一個魔術家。可敬的反對派分子，你們向列寧同志學學辯證法，讀讀他的著作是會有用處的。（鼓掌，笑聲。）

三、『小事』和笑話

因為在提綱裏說革命『本身』是社會主義革命，托洛茨基就責備我這個提綱起草人。托洛茨基認為這樣看待革命是形而上學的。我絕不能同意這種說法。

為什麼在提綱裏說革命『本身』是社會主義革命呢？因為這樣就可以着重指出在對我國革命的估計上我們黨和反對派的觀點之間的全部差別。

這種差別在哪裏呢？在於黨把我國革命看做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種具有能夠對資本主義世界進行鬥爭的獨立力量的革命，而反對派却把我國革命看做未來的、尚未勝利的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贈品，看做未來的西方革命的『附屬品』，看做一種沒有任何獨立力量的東西。只要把列寧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估計和反對派聯盟的估計比較一下，就會了解這兩種估計之間的全部差別。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看做最有主動性的力量，它組織了社會主義經濟之後，接着必然去直接援助世界無產階級，去和資本主義世界作鬥爭；相反地，反對派却把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看做消極的力量，認為這一消極力量正提心吊膽地生活着，耽心『在保守的歐洲面前』將立即喪失政權。

使用『形而上學』這個字眼是爲了用它來遮掩反對派對我國革命所做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估計的真面目，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其次，托洛茨基說我用另一個比較確切和正確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公式代替了一九二四年我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所提的不確切和不正確的公式。托洛茨基似乎不滿意我這樣做。爲什麼，根據什麼，——他却始終沒有說。我修正了不確切的公式而代之以確切的公式，這有什麼不好呢？我絕不認爲自己是沒有過錯的。如果某個同志犯了錯誤，後來自己承認錯誤並改正了錯誤，我想，這對黨只會有好處。托洛茨基着重指出這個事實，他究竟想說明什麼呢？也許他想學習好榜樣，終於想改正自己的許許多多錯誤吧？（鼓掌，笑聲。）好吧，在這件事情上如果需要我幫忙，我願意幫他的忙，願意推動他並且幫他的忙。（鼓掌，笑聲。）可是看來托洛茨基是在追求另外一

個什麼目的。如果這話是對的，那末我必須說，他的企圖是手段拙劣的企圖。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說裏要人相信，他並不是一個像黨的多數的代表所描繪的那樣壞的共產黨員。他從自己的文章裏引了許多段話，證明他托洛茨基過去和現在都承認我們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他並不否認我們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如此等等。嘿，這算什麼新聞！托洛茨基要是否認我們工作、我們國營工業等等的社會主義性質，那就太不像話了。這些事實現在大家都承認，連紐約的交易所，連我國的耐普曼都承認，更不用說奧、鮑威爾了。現在無論敵人或朋友，大家都看到我們並不像資本家那樣建設工業，我們在我國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發展中放進了某些和資本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的新因素。

不，可敬的反對派分子，現在問題不在這裏。

現在的問題比反對派聯盟所能設想的要嚴重得多。

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我國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而是在於儘管有資本主義的包圍，儘管有期待無產階級專政毀滅的內外敵人，我們仍舊要建成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於使列寧主義在我們黨內獲得完全勝利。

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小事和笑話。現在對黨用些小事和笑話是堵塞不了的。現在黨所要求於反對派的要大一些。

或者你們勇敢些，能够公開地老實地放棄自己的原則錯誤；或者你們不這樣做，那就要接受黨對

你們的立場所做的正確的評價；你們的立場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立場。

二者必居其一。

怎樣選擇，讓反對派分子自己決定。（喊聲：『對！』鼓掌。）

五 反對派的實踐綱領。黨的要求

反對派首領們試圖從玩弄引文轉到談論帶實踐性質的分歧上去。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像李諾維也夫一樣，企圖把這些分歧歸結成幾條，同時斷言重要的不是理論上的分歧而是實踐上的分歧。然而我應當說，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反對派把我們的分歧所歸結成的幾條中沒有一條是客觀的，是完全的。

你們想知道我們在實踐上的分歧是什麼嗎？你們想知道黨所要求你們的是什麼嗎？

請聽吧：

（一）黨不能再容忍也不會容忍你們每當佔少數時，就跑到大街上，宣佈黨內發生危機，攻擊黨。對於這種行動，黨再不會容忍了。（喊聲：『對！』鼓掌。）

（二）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你們失去在我們黨內獲得多數的希望時，就搜羅和聚集各色各樣的不滿分子作為組織新黨的材料。對於這種行動，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了。（鼓掌）

(三) 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你們誣蔑黨的領導機關，破壞黨內制度，破壞黨的鐵的紀律，在派別自由的旗幟下，聯合各種各樣爲黨所斥責的派別組成新黨。黨不會容忍這種行動了。(鼓掌)

(四) 我們知道，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有很多困難。我們看到這些困難，我們能够克服這些困難。反對派在克服這些困難方面的任何幫助我們都會歡迎的。但是，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你們企圖利用這些困難來使我國的情況惡化，來進攻黨，來襲擊黨。(鼓掌)

(五) 黨比所有的反對派加在一起都更了解，只有在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工業化的進展和社會主義的建成才是可能的。黨現在和將來都要採取一切辦法使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斷得到改善。但是，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反對派跑到大街上作煽動性的聲言，說要馬上提高工資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反對派明明知道把工資提得這樣高，目前工業還負擔不起，明明知道這種煽動的目的不在於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而在於助長勞動者的落後階層中的不滿情緒，造成反黨即反對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不滿情緒。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這種行動了。(喊聲：『對！』鼓掌。)

(六) 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反對派今後繼續破壞工農結合的基礎即工農聯盟的基礎，宣傳提高出廠價格並加重農民納稅負擔的思想，企圖把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係『構成』無產階級國家剝削農民的關係而不是經濟合作的關係。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這種行動了。(鼓掌)

(七) 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反對派分子今後繼續在黨內製造思想混亂，誇大我們的困難，助長

失敗情緒，鼓吹我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從而破壞列寧主義的基礎。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這種行動了。（喊聲：『對！』鼓掌。）

（八）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雖然這不單是黨的事情而是共產國際各支部的事情）你們今後繼續和共產國際搗亂，瓦解它的支部，破壞共產國際領導的威信。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容忍這種行動了。（鼓掌）

這就是我們在實踐上的分歧。

這就是反對派聯盟的政治綱領和實踐綱領的本質，也就是我們黨現在所竭力反對的東西。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說裏敘述了這個綱領的某幾條，又竭力掩藏了其他幾條，然後問道：這裏面哪一點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呢？好一個奇怪的問題！可是我倒要問：這裏面，在反對派聯盟的這個綱領裏面，哪一點是共產主義的呢？這裏面哪一點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呢？反對派聯盟的實踐綱領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接近社會民主主義的，這難道不明顯嗎？

可敬的反對派分子，你們曾經想知道黨要求你們什麼，現在你們已經知道黨要求你們什麼了。

或者你們履行這些條件，這些同時就是我們黨完全統一的條件；或者你們不這樣做，那末，黨昨天打敗了你們，明天就要開始徹底粉碎你們。（鼓掌）

六 總 結

我們黨內鬥爭的總結即結果是怎樣的呢？

我手頭有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九月簽署的文件。這個文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對於我們黨內鬥爭的總結有某種揣測的企圖，它對於我們黨內鬥爭的前途有某種預測和某種描繪。這個文件說：

『聯合起來的反對派，在四月和七月曾經表明，而且在十月還要表明，在粗暴而惡意的攻擊之下，他們的觀點的一致只會鞏固起來；黨也會明白，只有依據聯合起來的反對派的觀點才能擺脫目前嚴重的危機。』（一九二六年九月托洛茨基給反對派分子的信，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和十一日政治局會議速記記錄的附件）

你們可以看出這差不多是預言。（喊聲：『正是差不多。』）這差不多是純粹馬克思主義式的譏語，是整整兩個月以後的事情的預見。（笑聲）

當然，這個文件有點誇大。（笑聲）例如這個文件說我們黨目前有嚴重的危機。但是，謝天謝地，我們還活着而且很健康，甚至還沒有覺察到什麼危機。當然，某種危機是有的，但不是黨的危機而是某個派別的危機，就是那個叫做反對派聯盟的派別的危機。可是，絕不能把一個小派別的危機說成擁有百萬黨員的黨的危機。

其次，托洛茨基的文件裏說，反對派聯盟正在鞏固而且將來要更加鞏固。我認爲這裏也有一些誇大。（笑聲）決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反對派聯盟正在瓦解，反對派中的優秀分子正在脫離它，它被內部矛盾壓得喘不過氣來了。例如克魯普斯卡婭同志正在脫離反對派聯盟，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熱烈鼓掌）這是偶然的嗎？

最後，托洛茨基的文件裏說，只有依據聯合起來的反對派的觀點才能擺脫目前的危機。我認爲托洛茨基在這裏也有一些誇大。（笑聲）反對派分子不會不知道，黨不是在反對派聯盟的觀點的基礎上，而是在同這些觀點的鬥爭中，在反對這些觀點的鬥爭中，在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和團結一致的。托洛茨基文件中的誇大是明顯的。

但是，同志們，如果撇開托洛茨基在他的文件裏所做的這一切誇大，那末，實在說，他的預測就似乎什麼也沒有了。（全場大笑）

由此可見，結果是和托洛茨基在他的預測中給我們描繪的那個總結相反的。

同志們，我就要講完了。

季諾維也夫有一個時候誇口說，他會把耳朵貼在地上，（笑聲）當他把耳朵貼在地上的時候，他就聽到歷史的腳步聲。很可能事實上真是這樣。但有一點還是應當承認的，會把耳朵貼在地上並聽到歷史的腳步聲的季諾維也夫，有時却聽不到某些「小事」。也許反對派確實會把耳朵貼在地上並聽到像歷史的腳步聲那樣了不起的東西。但是不能不承認，反對派會聽到了不起的東西，却聽不到這件

『小事』：黨早已不理睬反對派了，反對派已一籌莫展了。這一點他們却沒有聽到。（喊聲：『對！』）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是反對派的耳朵大概有毛病。（笑聲）

因此，我要奉勸可敬的反對派分子，治一治你們的耳朵吧！（熱烈鼓掌多時。全體起立歡送斯大林同志。）

載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真理報』第二六二號

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在談到本題以前，我認爲必須聲明，關於中國問題，我手頭缺乏展示中國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詳盡材料。因此，我不得不只談幾點帶原則性的和中國革命基本方向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一般意見。

關於中國問題，我有彼得羅夫的提綱、米夫的提綱、譚平山的兩個報告和拉費斯的意見書。我認爲所有這些文件雖然各有長處，可是都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們都忽略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問題。我認爲首先必須注意這些缺點。因此，我的意見將同時帶有批判性質。

一 中國革命的性質

列寧說過，中國人在最近期間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某些同志把這句話了解爲在中國人那裏

一定會一模一樣地重演我們俄國一九〇五年所發生過的事情。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列寧根本不是說中國革命將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翻版。列寧只是說中國人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這就是說，除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一般特點外，中國革命將還有它自己獨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一定會給中國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別標記。

這些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特點是中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鋒芒指向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的民族解放革命。這就是它首先和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不同的地方。因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不僅表現在它的軍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現在中國工業的命脈即鐵路、工廠、礦山、銀行等都處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支配或控制之下。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和外國帝國主義及其中國走狗作鬥爭的問題不能不在中國革命中發生重大作用。這就使中國革命和世界各國無產者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直接連接起來。

中國革命的第二個特點是中國大民族資產階級極端軟弱，它比一九〇五年時期的俄國資產階級軟弱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業的命脈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裏，中國大民族資產階級就不會不軟弱和落後。在這一方面，米夫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是中國革命特有的事實之一，是完全正確的。由此應該得出結論，中國革命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担任。

同時不應該忘記中國革命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在中國旁邊有蘇聯存在着並且發展着，它的革命經驗和它的幫助必然使中國無產階級易於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中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鬥爭。

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方向的中國革命的主要特點就是如此。

二 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

上述提綱的第一個缺點是它們都忽略了或低估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問題。要是細讀這些提綱，就可能認為目前中國其實並沒有帝國主義的干涉，只有北軍對南軍的戰爭，或一派軍閥對另一派軍閥的戰爭。並且有些人慣於把干涉了解為這樣一種情況，就是有外國軍隊開入中國境內的事實；如果沒有這種事實，那就不是干涉。

同志們，這是極嚴重的錯誤。干涉決不限於軍隊入境，而軍隊入境也決不是干涉的主要特點。在資本主義國家現今革命運動的條件下，在外國軍隊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許多抗議和衝突的時候，干涉已帶有比較圓滑的性質和比較隱蔽的形式。帝國主義在現今的條件下進行干涉，偏重於採取在附屬國內組織內戰的辦法，採取資助反革命勢力反對革命的辦法，採取在精神和財政上支持其中國走狗反對革命的辦法。帝國主義者喜歡把鄧尼金和高爾察克、尤登尼奇和弗蘭格里反對俄國革命的鬥爭描繪為純粹的國內鬥爭。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而且不僅我們，連全世界都知道，站在這些反革命

的俄國將軍背後的是英、美、法、日帝國主義者，假使沒有他們的支持，俄國根本不會有嚴重的內戰。關於中國也必須這樣說。假使各國帝國主義者不鼓勵吳佩孚和孫傳芳、張作霖和張宗昌，假使各國帝國主義者不供給他們款項、軍械、教官、「顧問」等等，這些反革命軍閥反對中國革命的鬥爭簡直是不可能的。

廣東軍隊的力量在哪裏呢？在於他們有思想，有熱情，這鼓舞着他們爲解除帝國主義的羈絆而鬥爭，在於他們給中國帶來解放。中國反革命軍閥的力量在哪裏呢？在於他們背後站着各國帝國主義者，站着中國所有一切鐵路、租界、工廠、銀行和洋行的老闆。

因此，問題不僅僅在於或者甚至並不在於外國軍隊的入境，而在於各國帝國主義者給予中國反革命的援助。假他人之手進行干涉，——這是現在帝國主義干涉的主要特點。

因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中國革命也正是把自己的鋒芒指向這一事實。因此，誰忽略或低估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事實，誰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國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東西。

據說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廣東派和整個中國革命有表示「好感」的某些跡象。據說美國帝國主義者（包括日、美帝國主義者）的政策的本質和它的偽裝。列寧常說，革命者很難被棍棒和拳頭制服，可是，他們有時却很容易被親善制服。同志們，永遠不要忘記列寧說的這個真理。不管怎樣，顯然日、美帝國主義者倒很好地領會了這個真理的意義。因此，必須把帝國主義者對廣東派的親善和恭維跟下述事實嚴

格地區分開來；殷殷地表示親善的帝國主義者緊緊地抓住『自己』在中國的租界和鐵路，無論如何不肯放棄。

三 中國的革命軍隊

對於上述提綱的第二個意見是關於中國革命軍隊的問題。因為軍隊問題在這些提綱中都被忽略或低估了。（有人喊道：『對！』）提綱的第二個缺點就在這裏。通常不是把廣東軍隊的北進看做中國革命的展開，而是看做廣東軍閥對吳佩孚和孫傳芳的戰爭，看做一些軍閥和另一些軍閥爭雄稱霸的戰爭。同志們，這是極嚴重的錯誤。中國的革命軍隊是中國工農爭取自身解放的極重要的因素。在今年五月或六月以前，有人估計馮玉祥軍隊失敗後中國的局勢是反動勢力得勢，可是後來，在今年夏天，當廣東派常勝軍向北推進而佔領湖北時，局面就根本改觀而有利於革命了，難道這是偶然的嗎？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廣東軍隊的推進就是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對其中國走狗的打擊，就是一般地給中國一切革命分子，特別是給工人以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中國革命軍隊的特點和極重要的意義就在這裏。

從前，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革命是這樣開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沒有武裝或武裝很差的人民舉行起義，他們和舊政權的軍隊發生衝突，他們竭力瓦解這種軍隊，或者至少把一部分軍隊拉到自己方

而來。這是過去革命爆發的典型形式。一九〇五年我們俄國的情形也是這樣。中國的情況却不同。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爲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裏。

這就是爲什麼對革命軍隊的過低估計是上述提綱的不可容許的缺點。

由此應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

第一、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盡力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軍隊成爲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體現者。這一點所以特別必要，因爲和國民黨沒有絲毫共同點的各種各樣的軍閥現在都依附廣東派，依附這個正在摧毀中國人民公敵的力量，而他們在依附廣東派時，也把腐化作風帶進了軍隊。要使這種『同盟者』不發生壞影響，或者使他們成爲真正的國民黨人，只有加強政治工作並建立對他們的革命監督才能辦到。不這樣做，軍隊就會陷於極困難的境地。

第二、中國革命者，包括共產黨人在內，應當着手深入研究軍事。他們不應當把軍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爲軍事在中國現在是中國革命極重要的因素。中國革命者，其中包括共產黨人，應當學好軍事，以便逐漸前進並在革命軍隊中担任某些領導職務。要使中國革命軍隊循着正確道路逕向目的前進，其保證就在這裏。不這樣做，軍隊中的動搖和猶豫就會不可避免。

四 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

第三個意見是提綱中對於中國未來革命政權性質的問題沒有估計到或者估計不足。米夫在他的提綱中接觸到這個問題，這也就是他的貢獻。但是他在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不知道怕什麼，不敢把問題徹底闡明。米夫認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什麼意思呢？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期也是小資產階級政黨，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革命的政黨。這是不是說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政權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爲什麼呢？因爲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政權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政權，而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不會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裏有根本的差別。

麥克唐納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權，但它同時又是帝國主義的政府，因爲它是以保存英國的帝國主義政權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政權爲基礎的。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優於麥克唐納政府的地方就是它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問題不僅在於廣東政權（未來全中國革命政權的萌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而首先在於這個政權是並且不會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個政權的每一進展都是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打擊，因而也是有利於世界革命運動的打擊。

列寧說得對，既然從前，在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前，民族解放運動是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那末現在，在俄國蘇維埃革命勝利和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了。

這個特點米夫沒有估計到。

我以爲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就其性質來說，大體上將類似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所說的那種政權，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然而有一個差別，這主要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這將是中國走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或者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

這就是中國革命應當走的方向。

下面三種情況有利於這條革命的發展道路：

第一、中國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它將把自己的鋒芒指向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

第二、中國的大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比一九〇五年時期俄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更軟弱，這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使無產階級政黨對中國農民的領導易於實現；

第三、中國革命將在可能利用蘇聯勝利了的革命的經驗和幫助的情況下發展起來。

這條道路是否一定勝利並且絕對勝利，這要取決於許多情況。但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很明顯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任務正是爲中國革命的這條發展道路而鬥爭。

由此就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怎樣對待國民黨和中國未來革命政權這個問題上的任務。有人

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中國共產黨人現在退出國民黨將是極嚴重的錯誤。中國革命的全部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毫無疑問地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留在國民黨內，並且在那裏加緊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國共產黨可不可以參加未來的革命政權呢？不僅可以而且必須參加。中國革命的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雄辯地說明中國共產黨必須參加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

真正實現中國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必要保證之一就在這裏。

五 中國的農民問題

第四個意見是關於中國的農民問題。米夫認為必須立即提出成立蘇維埃即在中國農村成立農民蘇維埃的口號。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米夫往前跑得太遠了。不能撇開中國的工業中心而在農村建立蘇維埃。而且在中國工業中心組織蘇維埃的問題現在還不是迫切的問題。此外，必須注意：不能脫離環境來看蘇維埃。蘇維埃，這裏說的是農民蘇維埃，只有在中國已處於摧毀舊事物並創造新政權的農民運動最高漲的時期，並且估計到中國工業中心已經衝破堤防而進入成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才組織得成。可以不可以說中國農民和整個中國革命已經進入這個階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現在談蘇維埃就是往前跑得太遠了。因此，現在應該提出的不是蘇維埃的問題，而是成立農民委員會的

問題。我是指由農民中選舉出來的農民委員會，這種農民委員會能够規定農民的基本要求，並將採取一切辦法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些要求。這種農民委員會應當成爲一種樞軸，使農村中的革命在其周圍展開。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間，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認爲不能在農村掀起革命，他們害怕把農民捲入革命以後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同志們，這是極端荒謬的。把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綫就愈有力愈強大。提綱起草人，特別是譚平山和拉費斯說得完全正確，他們斷言立即滿足農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必要的條件。我認爲現在應該打破某些國民黨分子行動中所表現的對農民的冷淡和『中立』了。我認爲不論中國共產黨或國民黨（也就是廣東政權）都應當立即從言論轉到行動，提出立刻就滿足農民最切身的問題。

在這方面前途會怎樣，可以而且應該達到什麼程度——這要看革命的進程而定。我以爲歸根到底應該引導到土地國有化。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聲死拒絕土地國有化這樣的口號。

爲了喚起中國千百萬農民參加革命，中國革命者應當走哪些道路呢？

我認爲在當前條件下可以談到的只有三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就是成立農民委員會以及中國革命者加入這種委員會來影響農民的道路。（有人喊道：『可是農民協會呢？』）我認爲農民協會將聚集在農民委員會的周圍，或者把農民協會變成農民委員會，使它具有爲實現農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種權力。關於這條道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是

只有這條道路是不夠的。如果以爲中國有足够的革命者來做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國約有四億人口。其中約三億五千萬是漢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農民。如果以爲幾萬個中國革命者就能汲乾這個農民的汪洋大海，那就弄錯了。這就是說，還需要其他道路。

第二條道路就是通過新的人民革命政權的機關來影響農民的道路。無疑地，在新解放的省份裏將成立廣東政權這種類型的新政權。無疑地，這種政權和這種政權的機關，如果要真正推進革命，就應當設法滿足農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和一般革命者的任務就在於加入新政權機關，使這個機關接近農民羣衆，並通過這個機關來幫助農民羣衆滿足他們的迫切要求，至於採用沒收地主土地的辦法還是採用減稅減租的辦法，則看情況而定。

第三條道路就是通過革命軍隊來影響農民。我已經講過革命軍隊在中國革命中的極重要的意義。中國革命軍隊是這樣的一種力量，它第一個打進新的省份，它第一個深入農民羣衆，農民首先憑它來判斷新政權，判斷新政權質量的好壞。農民對新政權、對國民黨和對整個中國革命的態度，首先是看革命軍隊的行爲，看它對農民和地主的態度，看它幫助農民的決心而定的。如果注意到有不少可疑分子混進了中國革命軍隊，這些分子可能使軍隊的面貌變壞，那就可以明白軍隊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農民政策在農民心目中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和一般中國革命者應當採取一切辦法使軍隊中反農民的分子不發生壞影響，保持軍隊的革命精神，並做到使軍隊幫助農民，喚起農民參加革命。

據說在中國，人們都熱烈歡迎革命軍隊，但是後來，在軍隊駐紮下來以後，就有些失望了。我們蘇聯在國內戰爭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這是由於軍隊解放了新的省份而在那裏駐紮下來的時候，不得不這樣或那樣地靠周圍的居民來養活。我們蘇聯革命者通常用如下的方法能够彌補這些缺點，我們竭力通過軍隊來幫助農民反對地主。必須使中國革命者也學會通過軍隊實行正確的農民政策來彌補這些缺點。

六 中國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權

第五個意見是關於中國無產階級的問題。我認為在提綱中對於中國工人階級的作用和意義強調得不够。拉費斯問道：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面向誰——面向國民黨的左派還是中間派？奇怪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應當面向無產階級，並使中國解放運動的活動者都面向革命。只有這樣，問題才會提得正確。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同志認為工人為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權地位而舉行罷工是不應該的，勸告工人不要罷工。（喊聲：『廣州和上海都有過這樣的事情。』）同志們，這是很大的錯誤。這是極嚴重地低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綱中應當指出這一極端不好的現象。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勢，幫助工人（即使通過罷工的方法）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權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如果這樣，中國還要革命做什麼呢？在罷工時

期，無產階級的子女被帝國主義的走狗鞭笞和拷打，這樣的無產階級是不能成為領導力量的。無論如何必須消滅這種中世紀的禍害，使中國無產者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和尊嚴，使他們能够領導革命運動。沒有這一點，中國革命就休想獲得勝利。因此，中國工人階級爲了認真改善他們的地位而提出的經濟和法權的要求，應當在提綱中佔有適當地位。（米夫說：『在提綱中已經說到這一點。』）是的，在提綱中已經說到這一點，但是可惜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七 中國的青年問題

第六個意見是關於中國的青年問題。真奇怪，提綱中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然而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譚平山的報告中講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可惜講得不够突出。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學生青年（革命學生）、工人青年、農民青年——所有這些青年，如果使他們受國民黨的思想和政治影響的話，都是一種可以推動革命一日千里地前進的力量^①。必須注意，誰也不像中國青年那樣深刻而敏銳地體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誰也不像中國青年那樣尖銳而

① 在當時條件下這種政策是正確的，因爲那時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人和或多或少左傾的國民黨人的聯盟，執行着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策。後來這種政策由於不再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而被取消了，因爲國民黨已經離開了革命並且後來變爲反對革命的中心，而共產黨人則與國民黨決裂，退出了國民黨。

痛楚地感覺到必須和這種壓迫作鬥爭。就盡力加強青年工作這一點來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者應當盡量估計到這種情況。在中國問題的提綱中，青年應當佔有自己的地位。

八 幾個結論

我想就中國反帝國主義鬥爭和農民問題方面指出幾個結論。

無疑地，中國共產黨現在不能只限於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了。現在甚至連張學良這樣的反革命者也贊成這個要求了。顯然，中國共產黨應當更進一步。

其次，必須在自己面前提出鐵路國有的問題作為遠景。這是必要的，而且應該向這一方面做去。

再其次，必須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廠收歸國有的遠景。在這方面首先擺着的問題是把那些對中國人民特別仇視和特別富於侵略性的業主的企業收歸國有。接着必須把農民問題向前推進，使它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我認為最後還應該做到為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並使土地國有。

其餘的問題是不言而喻的。

同志們，我想提出的意見就是這些。

載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

【共產國際】雜誌第十三期

（總第七十一期）

註 釋

(一) 指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國發生的深刻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當時德國國內展開了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工人開始大批地從社會民主黨轉到共產黨方面來。薩克森和紹林吉亞兩州成立了工人政府，立刻組織無產階級蘇維埃和共產黨人奪取政權的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漢堡發生了工人的武裝起義。德國的革命運動遭受失敗，這以後，資產階級反動在國內加緊了。——(正文第三頁)。

(二) 指薩洛哥和叙利亞反抗法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這些戰爭使法國花費了十億多法郎。——(正文第四頁)。

(三) 指敵視布爾什維克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關於「左派共產主義者」，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八五頁至第二八九頁和「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四十六頁至第五十三頁、第五十七頁至第六十二頁、第六十五頁至第一〇一頁、第二九三頁至第三一九頁)。——(正文第五頁)。

(四) 一九〇八年黨的全俄代表會議即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會議於一九〇九年一月三日至九日(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巴黎舉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會上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取消派孟什維克，又反對召回派——「從左面來的取消派」。根據列寧的提議，代表會議堅決地譴責了孟什維克和召回派的取消主義，並擬定了布爾什維克在反動時期的策略路線(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一九五頁至第二〇五頁，「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七五頁至第一七七頁)。——(正文第八頁)。

(五) 這篇「序言」是「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書的導言，是斯大林一九二六年一月為代替「列寧主義問題」這本文集的序言而寫的。該文集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正文第十一頁)。

- 〔六〕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六十九頁至第一八八頁。——（正文第十一頁）。
- 〔七〕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五八頁至第四〇一頁。——（正文第十一頁）。
- 〔八〕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九十頁至第一三二頁。——（正文第十一頁）。
- 〔九〕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五六頁至第二一一頁。——（正文第十一頁）。
- 〔一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七十一頁。——（正文第十三頁）。
- 〔一一〕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二九〇頁。——（正文第十五頁）。
- 〔一二〕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五三頁至第四六二頁。——（正文第十五頁）。
- 〔一三〕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〇七頁至第三〇二頁。——（正文第十五頁）。
- 〔一四〕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頁至第九十七頁。——（正文第十五頁）。
- 〔一五〕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二三頁。——（正文第十六頁）。
- 〔一六〕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〇三頁至第一〇四頁。——（正文第十九頁）。
- 〔一七〕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七八頁。——（正文第十九頁）。
- 〔一八〕見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四七九頁至第四八九頁）。——（正文第十九頁）。
- 〔一九〕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六三頁。——（正文第二十八頁）。
- 〔二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七八頁至第一七九頁。——（正文第三十五頁）。
- 〔二一〕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舉行。斯大林引證的是列寧的演說『論共產黨的作』中的一段話。——（正文第三十六頁）。
- 〔二二〕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六頁。——（正文第三十九頁）。
- 〔二三〕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就是鐵路和水路運輸聯合工會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二〇年九月成立。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初，這個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權掌握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手中。托洛茨基分子在工會工作中採取赤裸裸的強迫命令的方法。一九二一年三月舉行的鐵路和水路運輸員工第一次全俄聯合代表大會把托洛茨基分子趕出了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機關。

關，選出了工會的新的中央委員會，並規定了工會工作的新方法。——（正文第五十二頁）。

〔四〕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頁至第二十二頁。——（正文第五十三頁）。

〔五〕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論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綱作為代表大會的決議被通過了（該決議見『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五六〇頁至第五六六頁）。——（正文第五十七頁）。

〔六〕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〇六頁。——（正文第六十頁）。

〔七〕見斯大林的小冊子『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一九二四年版第六十頁。——（正文第六十一頁）。

〔八〕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七頁至第四三五頁。——（正文第六十二頁）。

〔九〕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三頁至第五十二頁。——（正文第六十二頁）。

〔一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一〇、一一九頁。——（正文第六十三頁）。

〔一一〕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一一、一一六頁。——（正文第六十三頁）。

〔一二〕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一八頁至第一一九頁。——（正文第六十三頁）。

〔一三〕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六一頁至第三九一頁。——（正文第六十三頁）。

〔一四〕指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舉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全會批准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其中包括「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在這項決議中規定了黨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問題的方針（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三頁至第五十二頁）。——（正文第六十四頁）。

〔一五〕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九、四十六頁。——（正文第七十一頁）。

〔一六〕指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舉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正文第七十二頁）。

〔一七〕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對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來信（這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擁護者的派別攻擊）的答覆，發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真理報』第二九一號上。——（正文第七十二頁）。

〔三〕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七頁。——（正文第七十四頁）。

〔四〕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三三頁至第一三三頁、第一三五頁至第一三七頁。——（正文第七十六頁）。

〔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頁。——（正文第七十九頁）。

〔六〕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八頁。——（正文第八十頁）。

〔七〕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頁至第三四三頁。——（正文第八十三頁）。

〔八〕「時代哲學」是季諾維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寫的一篇反黨文章的題目。對該文的批評，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七五頁至第三七八頁。——（正文第八十七頁）。

〔九〕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七頁。——（正文第八十七頁）。

〔十〕指斯大林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會議討論農村工作問題時發表的一篇題為「論無產階級和農民問題」的演說（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十五頁至第三十三頁）。——（正文第八十九頁）。

〔十一〕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三頁至第八十二頁。——（正文第九十二頁）。

〔十二〕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三期刊載了斯大林的著作「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見本卷第十三頁至第八十八頁）。

〔十三〕「布爾什維克」（雙周刊）是聯共（布）中央的政治理論性的雜誌，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創刊。——（正文第九十四頁）。

〔十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全會討論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大不列顛共產黨的總結報告，關於共產黨人在工會運動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關於第二次組織會議的總結的報告和全會十二個委員會的報告。全會特別注意關於共產黨人根據統一戰線策略爭取國際工會運動的革命統一的任務問題。斯大林被選為全會主席團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東方委員會委員、法國委員會委員和德國委員會主席。——（正文第九十六頁）。

〔十五〕所謂「一九三三年」是指一九三三年秋季德國深刻的革命危機。——（正文第九十六頁）。

〔十六〕「共產黨人公報」（«Bulletin Communiste»）是雙周刊，法國共產黨右翼的機關報，在巴黎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十

月創刊。該公報出版到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停刊。第十五期發表了法國共產黨右翼的反黨宣言。——（正文第九十八頁）。

〔五〕聯共（布）中央全會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至九日舉行。四月九日，斯大林在全會的上午會議上就「關於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的報告發表了演說，在下午會議上做了關於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會一九二六年工作計劃的報告（中央全會的決定，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九十一頁至第一〇二頁）。——（正文第一〇九頁）。

〔五三〕指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聯共（布）中央全會通過的「關於組織糧食收購機關開展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糧食收購運動」的決議（該決議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九十七頁至第一〇〇頁）。——（正文第二二二頁）。

〔五四〕這封信的部分原文曾刊載在斯大林的文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第一七二頁至第一七三頁。——（正文第一三五頁）。

〔五五〕英國總罷工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至十一日舉行。參加罷工的有各重要工業部門和運輸業部門的五百餘萬有組織的工人。——（正文第一四〇頁）。

〔五六〕指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至十三日皮爾蘇茨基發動的武裝政變。政變的結果，建立了使國家逐步法西斯化的皮爾蘇茨基及其集團的專政制度。——（正文第一四〇頁）。

〔五七〕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一〇五頁。——（正文第一四五頁）。

〔五八〕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得到英國總罷工的消息後，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在有各業工會中央委員會代表參加的會議上做出決定，號召蘇聯全體工會會員捐出一天工資的四分之一來支援英國罷工工人，當天就給英國工聯總委員會匯去了二十五萬盧布。五月七日，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又把蘇聯工人募集的二百萬盧布匯給總委員會。五月九日，總委員會通知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拒絕接受這筆捐款和蘇聯工人的其他任何援助。——（正文第一四五頁）。

〔五九〕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通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當前問題」的提綱（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提綱和決議」。國家出版局一九二六年版第四頁至第三十九頁）。——（正文第一四

八頁)。

〔五〕議會中的派別就是波蘭議會(波蘭資產階級國會的下議院，波蘭的主要立法機關)中的各個集團。議會全部議員在一九二六年已分離成三十多個派別，代表波蘭社會各階級和中間階層的利益。——(正文第一五〇頁)。

〔六〕指艾倫斯特·台爾曼「論波蘭共產黨的策略」一文，載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真理報」第二二三號。——(正文第一五三頁)。

〔七〕英俄統一委員會是由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發起，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至八日在倫敦舉行的英蘇工會代表會議上成立的。英俄委員會由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英國工聯代表大會總委員會的主席，書記及兩個組織各推出委員三名組成。由於英國工聯反對首領們的背叛政策，該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秋宣告結束。——(正文第一五七頁)。

〔八〕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舉行。全會討論了政治局就英國總罷工、波蘭事件和中國事件而通過的決議的通報，並討論了以下幾個報告：關於改選蘇維埃的總結，關於拉舍維奇等人的案件和黨內統一，關於住宅建築，關於糧食收購運動。斯大林在全會上對政治局就英國、波蘭和中國的事件而通過的決議的通報，對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關於拉舍維奇等人的案件和黨內統一的報告以及對其他問題發表了演說。全會批准中央政治局和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在國際問題方面的工作，並通過關於全國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黨內生活和工人狀況等重大問題的幾項決議。全會決定撤銷季諾維也夫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全會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一四八頁至第一六九頁)。——(正文第一五七頁)。

〔九〕指一九一九年七月在阿姆斯特丹國際代表大會上成立的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加入工會國際的有西歐多數國家的改良主義工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阿姆斯特丹國際奉行改良主義政策，在國際勞工局和國際聯盟各種委員會中公開和資產階級合作，反對工人運動中的統一戰綫，敵視蘇聯，因此，它在工人運動中的威信日益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阿姆斯特丹國際實際上已停止活動。由於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成立，阿姆斯特丹國際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取消了。——(正文第一五八頁)。

〔十〕查辛巴赫和烏捷格斯特是阿姆斯特丹改良主義工會國際的書記，該國際的右翼領袖。——(正文第一五八頁)。

〔十一〕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二三頁。——(正文第一六〇頁)。

〔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一六頁。——（正文第一六〇頁）。

〔七〕「工人反對派」是俄共（布）黨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黨集團。由施路普尼柯夫、梅德維捷夫等人領導。該集團於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形成，並進行了反對黨的列寧路線的鬥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斥責了「工人反對派」，並認為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思想是和共產黨員的稱號不相容的。後來，被打垮的「工人反對派」的餘孽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勾結在一起。——（正文第一六三頁）。

〔八〕「社會主義通報」（雜誌）是白俄孟什維克的機關刊物，於一九二二年二月由馬爾托夫創辦。一九三三年三月前在林出版，一九三三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巴黎出版，現在在美國出版。「社會主義通報」是最反動的帝國主義集團的喉舌。——（正文第一六六頁）。

〔九〕不列顛礦工聯合會和蘇聯礦工工會的代表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在柏林舉行代表會議。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繼續開展援助為反對同盟歇業而鬥爭的英國礦工的運動問題。代表會議通過了「告全世界工人書」的宣言，號召堅決支援英國礦工，並認為必須儘速召開英俄統一委員會。為了使蘇聯礦工工會和國際礦工聯合會保持相互聯系並採取一致的革命行動起見，代表會議認為應當成立英蘇礦工委員會。——（正文第一七〇頁）。

〔十〕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宣言——因英國工黨和英國工聯總委員會的改良主義首領背叛英國工人總罷工而發表的「告全世界無產階級書」。這個宣言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的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第四次全會上通過的，發表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真理報」第一三〇號上。——（正文第一七五頁）。

〔十一〕「黑色星期五」的英雄是指英國各工會中的一些反動首領。鐵路工會的湯姆斯，礦工工會的霍克斯和運輸工會的威廉斯，這些人破壞了鐵路工人和運輸工人為援助罷工的煤礦工人而定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舉行的罷工。破壞罷工的那一天是星期五（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所以英國工人稱之為「黑色星期五」。——（正文第一八二頁）。

〔十二〕「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是美國工人黨（即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於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在芝加哥出版，後來在紐約出版，最初叫做「工人報」，自一九二四年一月起改稱「工人日報」。——（正文第一八三頁）。

〔十三〕「新領袖報」（The New Leader）（周刊）是美國的所謂社會主義黨的機關報，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創刊。——（正文第一八三頁）。

〔七四〕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頁。——（正文第一八五頁）。

〔七五〕『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這一提綱是斯大林受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託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之間寫成的。該提綱經政治局同意後，在十月二十六日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加以討論並通過。十一月三日，這個提綱經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一致通過作為代表會議的決議，並在當天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批准（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二〇九頁至第二一〇頁）。——（正文第一九一頁）。

〔七六〕見列寧『論糧食稅』一書綱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九九頁至第三〇七頁）。——（正文第一九四頁）。

〔七七〕『民主集中派』是俄共（布）黨內的以薩普龍諾夫和奧新斯基為首的反黨集團。這個集團產生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民集派集團否認黨在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反對在工業部門實行一長制和廠長個人負責制，反對組織問題上的列寧路線，要求黨內派別和集團的自由。黨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會斥責了民集派分子，認為他們是反黨集團。一九二七年，『民主集中派』集團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積極分子一起被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開除出黨。——（正文第一九六頁）。

〔七八〕『蘇瓦林之流取消派』即托洛茨基分子鮑里斯·蘇瓦林的擁護者。蘇瓦林是前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由於從事反蘇反共產國際的反革命宣傳，於一九二六年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開除出共產國際隊伍。——（正文第一九六頁）。

〔七九〕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舉行。代表會議討論了國際形勢，國內經濟狀況和黨的任務，工會的工作總結和當前任務，反對派和黨內狀況等問題。代表會議批准了中央的政策，並一致通過斯大林『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報告提綱。這個提綱說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是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是第二國際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輔助隊伍。代表會議做好了並完成了以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能獲得勝利的思想來武裝黨的工作，並號召為黨的統一、為揭露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而堅決鬥爭。——（正文第二〇六頁）。

〔八〇〕指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至九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全會。——（正文第二〇七頁）。

〔八一〕指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正文第二〇

八頁)。

〔三〕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內爭論總結和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這個決議經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批准，並列入代表大會的決議中(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七七八頁至第七八五頁)。——(正文第二〇九頁)。

〔四〕見列寧「論糧食稅」中「關於俄國現時經濟」一章(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頁至第三一九頁)。——(正文第二二一頁)。

〔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頁至第三八八頁。——(正文第二二二頁)。

〔六〕「我們的言論報」是孟什維克—托洛茨基派的報紙，於一九一五年一月至一九一六年九月在巴黎出版。——(正文第二二五頁)。

〔七〕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八頁。——(正文第二三六頁)。

〔八〕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九頁。——(正文第二三六頁)。

〔九〕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九頁。——(正文第二三七頁)。

〔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頁至第七頁。——(正文第二五一頁)。

〔十一〕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〇三頁至第二〇四頁。——(正文第二五七頁)。

〔十二〕指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全會討論了捷爾斯基逝世後補充中央委員缺額的問題，提交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根據政治局十月四日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七月聯席全會以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的派別活動的決定所做的報告，斯大林「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提綱。十月二十六日，斯大林在全會上發言，對於這個提綱作了說明。——(正文第二六〇頁)。

〔十三〕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五三〇頁至第五三三頁。——(正文第二六〇頁)。

〔十四〕指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聯席會議通過的決議。這個決議是根據斯

大林關於地方黨組織對於托洛茨基的言論所做的決議的報告通過的（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九一三頁至第九二一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六頁至第十頁）。——（正文第二六一頁）。

〔九四〕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附錄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七十五頁至第九十七頁。——（正文第二六六頁）。

〔九五〕 引自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做的「關於人民委員會的活動」的報告中的話（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二九頁）。另見恩格斯於一八九四年六月二日給波爾·拉法格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一一頁）。——（正文第二七三頁）。

〔九六〕 指列寧「幾個提綱」一文（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六六頁至第三六八頁）。——（正文第二八四頁）。

〔九七〕 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六頁。——（正文第二九〇頁）。

〔九八〕 指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英國外交大臣克遜的照會，該照會以對蘇聯進行新的武裝干涉相威脅。——（正文第二九六頁）。

〔九九〕 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九頁。——（正文第三〇六頁）。

〔一〇〇〕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正文第三〇八頁）。

〔一〇一〕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正文第三〇八頁）。

〔一〇二〕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二頁。——（正文第三〇九頁）。

〔一〇三〕 「烏發政府」是自稱為「全俄臨時政府」（執政內閣）的反革命組織，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烏發舉行的白衛「政府」、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外國干涉者的代表們的會議上組成；該政府存在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正文第三一一頁）。

年 表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

一月一日

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並就組織問題發言。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並被批准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繼續任命斯大林為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全權代表。

一月五日

斯大林把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聯共(布)中央的決議通知在列寧格勒的莫洛托夫、什維爾尼克、基洛夫等人。這個決議揭發了聯共(布)列寧格勒省委員會的派別活動。

一月八日

斯大林主持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會議。

一月十六日

斯大林和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美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代表談話。

一月十九日

斯大林和紅色教授學院的學員談話。

一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就「關於反對右傾和「極左」傾的鬥爭」的問題發表幾次演說。

一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寫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一著作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出版單行本，並於一

年 表

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刊載在「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三期上。

二月五日

斯大林和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代表談話。

二月六日至八日

列寧格勒的沃洛達爾斯基、莫斯科、納爾瓦等區黨的非常代表會議選舉斯大林爲出席聯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會議的首席代表。

二月九日

斯大林答覆波爾特涅夫、葉弗列莫夫和伊甫列夫「關於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農民」問題的來信。

二月十日

「列寧格勒真理報」第三十三號刊載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的第六章「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

斯大林答覆烏克蘭共和國波勃利涅茨區貧農委員會主席坡柯也夫「關於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的來信。

二月十二日

斯大林被聯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會議選爲列寧格勒省委員會委員。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

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工作。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主席團委員及全會政治委員會、東方委員會、法國委員會的委員。

二月十九日

斯大林寫信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團團員，揭露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開幕詞中歪曲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定。

斯大林和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德國共產黨代表團及法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代表談話。

二月二十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會議上被選爲全會德國委員會主席。

二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聯共（布）代表團核心小組會議上報告德國代表團對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上的發言不滿意的行情。

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爲紀念柯托夫斯基而寫的悼詞在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哈爾科夫州委員會的機關報「共產黨人報」第四十三號上發表。

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紅軍建軍八周年慶祝會。

二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文集出版。

三月三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聯共（布）代表團核心小組會議上就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極左派」的思想鬥爭問題發表演說。

三月六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法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關於法國共產黨內情況的演說。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聯共（布）代表團核心小組會議上發言，反對季諾維也夫關於吸收「新反對派」分子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提議。

三月七日

斯大林爲慶祝國際共產主義婦女節十六周年而寫的致全世界女工和勞動婦女的祝詞在「真理報」第五十五號上發表。

三月八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德國委員會會議上就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極左派」問題發表演說。

三月十五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發表關於中央組織局一九二六年三月至八月工作計劃和關於蘇維埃選舉的演說。

三月十六日

斯大林和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德國共產黨代表團及法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代表談話。

三月十七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斯大林和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德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代表談話。

三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致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祝詞在『真理報』第六十六號和『青年團真理報』第六十六號上發表。

四月三日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斯大林為政治局『關於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提綱起草委員會委員，這個提綱將提交聯共（布）中央四月全會討論。

四月五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上述提綱起草委員會會議上發言，說明『關於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的提綱。

四月六日至九日

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四月九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午會議上就『關於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的報告發表演說。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下午會議上做了『關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會一九二六年的工作計劃』的報告。

四月十二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列寧格勒省委員會全會上做了關於聯共（布）中央四月全會工作總結的

報告。

四月十三日

斯大林給聯共(布)列寧格勒組織的積極分子做了『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的報告。

四月二十日

斯大林和邀請他參加五一節慶祝大會的斯大林工廠(莫斯科省波爾舍沃站)的代表團談話。

四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答覆克拉拉·蔡特金關於國際支援革命戰士協會問題的來信。

斯大林的小冊子『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出版。

四月二十五日

『真理報』第九十五號發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席比雪夫所簽署的告一切黨組織、黨監察委員會以及在經濟機關、合作社、貿易機關和銀行等機關工作的黨員書，號召爲實行節約而鬥爭。

四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寫信給卡岡諾維奇和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

四月三十日

斯大林寫信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揭露季諾維也夫的派別活動。

五月一日

斯大林在紅場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莫斯科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五月五日

斯大林和報刊工作者談話。

五月七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聯共(布)代表團核心小組會議上就曼努伊里斯基的文章『論孟什維主義的另一面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發表講話。曼努伊里斯基的文章刊載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共產國際』雜誌第四期(總第五十三期)上。

五月八日

斯大林寫信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團員，揭露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中的派別活動。

年

表

五月十一日

斯大林把英國工聯總委員會拒絕接受蘇聯工人對英國罷工礦工的金錢援助一事通知駐巴黎和柏林的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代表。

五月十五日

斯大林再次寫信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團員，揭露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中的派別活動。

五月十六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報刊工作者談話。

斯大林與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和青年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人員談話。

六月一日

斯大林到達梯弗里斯。

六月二日

斯大林視察捷莫—阿夫恰里水力發電站。視察水電站後，在貴賓留言簿上用格魯吉亞文題詞：『我們的建設和參加這一建設工作的工人、技師、工程師萬歲！』這個題詞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東方曙光報』第一一九一號和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二日『真理報』第一三三號上發表。

六月三日

斯大林寫信給莫洛托夫，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分裂政策和投降政策，並確定聯共（布）中央在國際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線。

斯大林到梯弗里斯國家歌劇院觀劇。休息時，斯大林和作曲家巴蘭契瓦澤談話，談到他的歌劇『塔馬爾·茨比也利』和格魯吉亞的歌劇音樂，指出俄羅斯作曲家的作品，尤其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對格魯吉亞作曲家的影響。

六月八日

斯大林在梯弗里斯鐵路總工廠工人大會上做了『關於英國罷工和波蘭事件』的報告，並答謝該廠工人的歡迎。報告和答詞都發表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東方曙光報』第一一九七號和一九

二六年六月十六日『真理報』第一三六號上。

六月十三日

斯大林給邀請他到巴庫去的巴庫工人的覆信發表在『巴庫工人報』第一三五號上。

六月

斯大林被選爲共產主義科學院院士。

七月四日

斯大林由高加索啓程返莫斯科。

七月八日

斯大林祝賀格魯吉亞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梯弗里斯委員會、格魯吉亞工會委員會和梯弗里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報『工人真理報』第一〇〇〇號出版，祝詞發表在該號『工人真理報』上。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

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工作。

七月十四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就工資問題發言。

七月十五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就政治局報告該局所通過的關於英國、波蘭和中國事件的決議發表演說。

七月二十二日午夜一時

斯大林在工會大廈捷爾任斯基靈旁守靈。

斯大林爲弔捷爾任斯基而寫的悼詞在『真理報』第一六六號上發表。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午會議上就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關於拉舍維奇等人案件和黨內統一的報告發表演說。

十七時三十分

斯大林親自參加把捷爾任斯基靈柩昇出工會大廈。

七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因捷爾任斯基逝世和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作人員談話。

七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和波蘭共產黨代表談話。

七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和來到蘇聯的英國工黨代表談話。

斯大林和芬蘭共產黨代表談話。

八月六日

斯大林答覆印度共產黨代表的來信。

八月七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發表「關於英俄委員會」的演說。

八月十三日

斯大林寫信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在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七月聯席全會上的反黨行爲。

九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致電美國工人黨中央機關報「工人日報」編輯部。

十月八日

斯大林寫信給斯列普柯夫，對他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刊載在「真理報」上的文章提出意見。

十月十一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關於緩和黨內鬥爭的辦法」的演說。

十月十九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列寧格勒省委員會擴大全會上被選爲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的

代表。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
十五日之間

斯大林受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託起草「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提綱。

十月二十二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指定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做關於俄國

問題的報告。

十月二十三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指定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做『關於反對派和黨內狀況』的報告。

十月二十五日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斯大林起草的『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提綱，這個提綱將提交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十月聯席全會審查。

十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二四七號和『消息報』第二四七號上發表斯大林的『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提綱。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說，說明『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提綱。全會批准了此項提綱，這個提綱將提交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審查。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

斯大林主持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工作。

十一月一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做『關於反對派和黨內狀況』的報告。報告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 and 六日的『真理報』第二五六號和第二五七號與『消息報』第二五六號和第二五七號上發表。

十一月三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就『關於反對派和黨內狀況』的報告做結論。結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報』第二六二號和『消息報』第二六二號上發表。

十一月六日

斯大林答覆『列寧格勒真理報』編輯部，不同意發表『紐約美國人報』所發表的經過歪曲的他與耶魯大學(美國)教授哲爾·戴維斯的談話。

十一月七日

斯大林在紅場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莫斯科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十一月十五日

斯大林的小冊子『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和對這一報告所做的結論）出版。

十一月二十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報告他將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做的『關於聯共（布）黨內狀況』的報告的綱要。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
十二月十六日

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爲全會主席團委員及政治委員會委員。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
三十日

斯大林主持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聯共（布）代表團核心小組的會議。

十一月三十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